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22 年总第 14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19th 2003-2022 GUANGZHOU

国际金融论坛第19届全球年会

THE IFF ANNUAL MEETING 2022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9 届全球年会（F20 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22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世界大变局：共生与重构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9 届全球年会以“世界大变局：共生与重构”为主题，深入探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导致的通胀高企、能源危机、粮食安全风险加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全球挑战，共商如何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构新的全球竞争、变革与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如何共生共存。

国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IFF）从创立至今，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 第 19 届年全球年会，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特此说明。

国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22 年总第 14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Chair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联合主席 / Co-chair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陆克文 Kevin Rudd
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周小川 韩升洙 肖卡特·阿齐兹 赫尔曼·范龙佩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ZHOU Xiaochuan,Han Seung-soo,Shaukat Aziz,
Herman Van Rompuy,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让·克洛德·特里谢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Jean-Claude Trichet,Edmond Alphandéry,Domenico Siniscalco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周汉民 祝宪 林建海 梁锦松 梁维特 洛朗·法比尤斯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ZHOU Hanmin,ZHU Xian,LIN Jianhai,
Antony Leung,Leong Vai Tac,Laurent Fabius
珍妮·希普利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埃内斯托·塞迪略
Jenny Shipley,Gloria Macapagal Arroyo,Ernesto Zedillo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吉耶尔莫·奥特兹 布莱恩·佩斯科 戴青丽 李纪珠
Mehmet Simsek,Guillermo Ortiz,Bryan Pascoe,Deborah Lehr Dr. Jih-Chu Lee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安雅山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钮小鹏 方风雷 李梅
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Yasser Elnaggar
James Rothschild,Rick Niu,FANG Fenglei,LI Mei
史蒂芬·格罗夫 张红军 弗兰克·里斯伯曼 李彤
Stephen P. Groff,ZHANG Hongjun,Frank Rijsberma,LI Tong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SONG Min, NIE Qingpi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F22, Pearl Development Building, Hengli Tow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IFF）独家拥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9 届全球年会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本届年会以“世界大变局：共生与重构”为主题，邀请了来自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领导人，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尼、新加坡、新西兰、菲律宾、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近百位全球财经政要，以及高盛集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汇丰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数十位世界著名企业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届 IFF 全球年会探讨了在世界大变局中，面对疫情、经济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全球格局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国际社会可能采取的对策和战略调整，剖析全球新形势下竞争、变革和合作的关系，寻求全球格局共生与重构以及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2022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赋予南沙“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的新定位，提出“办好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等国际性主题活动”的新要求。为此，本届 IFF 全球年会专门设置了两场大湾区圆桌会议，从产业升级发展和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两个角度，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贡献智慧。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自 2003 年成立以来的近 20 年间，IFF 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和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组织的各类交流合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在不断贡献其智慧与真知灼见的同时，也打造了 IFF“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国际一流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我们特别将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9 届全球年会嘉宾发言精选汇编成刊，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IFF）

CONTENTS
目录

2022 年 总第 14 期

09 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在此紧要关头，政策不容失误。政策制定者应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宏观政策、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有效地应对我们如今面临的各种冲击。更重要的是，我们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遭遇的挫折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08 / 开幕致辞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09
何厚铧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 10
周小川 IFF 大会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11

12 / 新全球化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13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14
尚达曼 新加坡国务资政 16

17 / 国际合作

洛朗·法比尤斯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COP21 主席 18
珍妮·希普利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20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21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IFF 副理事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22
杜嘉祺 汇丰集团董事长 23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IFF 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副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24
于洪君 IFF 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26
祝宪 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28

30/ “一带一路”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 31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IFF 理事、土耳其前副总理 32
张慎峰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34
扎法尔·乌丁·马赫默德 IFF 执行委员、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助理、首任中巴经济走廊特使 36
斌德加 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 38
马建新 道琼斯风险合规中国总监 40

42/ 经济新形势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43
林建海 IFF 副理事长、IMF 原秘书长 44
中尾武彦 瑞穗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 46

13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需一揽子刺激方案

气候行动融资须与公正转型融资齐头并进，例如投资于全民社会保护、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以及开展为新经济培养新技能计划。我们必须提高透明度并强化问责制，以便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未来的进展，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洗绿”。

48 / 气候变化 / 碳中和

亨利·保尔森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49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51
李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53
柳磊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54
倪清 普华永道中国 ESG 可持续发展市场主管合伙人 56
赵健能 香港联合交易所碳市场及 ESG 产品发展部主管 58

60 / 绿色金融 / 可持续发展

冯慧兰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61
吴晓青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62
宋敏 IFF 学术委员、IFF 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64
王丹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66
赵永刚 中证指数公司 ESG 业务部总经理 68

70 / 数字经济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IFF 理事、SRIA 联合主席、菲律宾前总统 71
理查德·伯纳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波动研究所主任 73
徐立 商汤科技董事长兼 CEO 74
任妍 阿里云研究院高级战略总监 76

78 / 金融科技

悉达多·蒂瓦里 IFF 副理事长、国际清算银行 (BIS) 亚太区前首席代表 79
张礼卿 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81
魏晨阳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83
孙洪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总工程师 85

125 专家访谈

在 2022 年 IFF 第 19 届全球年会期间举办的“中国经济新形势：展望、挑战和政策应对”讨论会上，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主持人），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就 2023 年的房地产、人民币汇率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等问题，展开专题和聚焦式对话。

87 / 金融安全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88
周强武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90
周汉民 IFF 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91
周延礼 IFF 成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93
吉耶尔莫·奥特兹 IFF 理事，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国际清算银行 (BIS) 前总裁 95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97
朱隽 丝路基金董事长 99
周道许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101

103 / 国际贸易

约翰·利普斯基 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BWC）副主席、IMF 前第一副总裁 104
易小准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原副总干事 106
姜增伟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108
郝福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 110
屈宏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112
林桂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 114

116 / 大湾区

梁锦松 IFF 副理事长、香港财政司前司长 117
余利明 国新国际常务副总经理 119
沈明高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 121
林少礼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总经济师 123

125 / 专家访谈

2023 年中国房地产是否能企稳反弹 126
2023 年人民币汇率前瞻 129
中国 2035 年目标规划 131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 IFF ·

IFF 19th 2003-2022 GUANGZHOU

国际金融论坛第19届全球年会
THE IFF ANNUAL MEETING 2022

世界大变局：共生与重构
The Ever-changing World: Reshaping Our Shared Future

开幕致辞

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9

韩升洙，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加强国际金融战略对话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复苏 10

何厚铧，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

国际金融论坛（IFF）助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 11

周小川，IFF 大会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 韩升洙 / IFF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由此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随着各国央行持续加息，全球金融形势趋紧，在经济前景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正在放缓，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不断上升的利率都给消费和投资带来了下行压力。中国正在遭受疫情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房地产市场也日益低迷。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的削减也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使人们对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关切，超过了商品、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共同经济利益，给全球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

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央行持续加息，全球金融形势趋紧，在经济前景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在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正呈现出紧张局势，投资者更倾向于规避风险。高额的资本和充足的流动性缓冲为全球的银行业提供了支撑。但是，许多国家的房地产行业仍然深受影响，人们因此担心风险可能会继续扩大并波及银行业和宏观经济。

在此紧要关头，政策不容失误。政策制定者应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宏观政策、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有效应对我们如今面临的各种冲击。更重要的是，我们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遭遇的挫折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贸易开放和全球贸易体系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贸易限制、扭曲性补贴等产业政策层出不穷，地缘政治的分裂让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换句话说，贸易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碎片化的根源，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成为经济增长和一体化的关键驱动力。过去几年，主要经济体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技术和金融脱钩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是，各国应重启相互交流和对话，避免出现最坏的分裂局面。

韩升洙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担任韩国总理，因此得以亲眼见证全球领导人共同努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世界各国高度团结，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并最终创建了 G20。如果全球领导人更加开放并采取更多有利于全球福祉的行动，我们一定可以重演这段光辉的合作历史。

国际金融论坛（IFF）为大家提供了交流平台和丰富的议题。我衷心希望通过凝聚我们的智慧和知识，能够帮助世界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难题。

令人担忧的是，技术和金融脱钩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是，各国应重启相互交流和对话，避免出现最坏的分裂局面。

加强国际金融战略对话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复苏

■ 何厚铧 /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

何厚铧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近三年，影响深远。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经济衰退的威胁、全球性债务的攀升，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问题，令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增长乏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二十大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在 2022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构建国际交往新平台”，“办好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等国际性主题活动”，“推动在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对接，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打造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前沿”等具体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现代金融服务是对大湾区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最有力的支撑，凸显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竞争和治理格局的重构，以金融推动全球增长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际金融论坛（IFF）将在 2023 年迎来成立 20 周年志庆。近 20 年来，IFF 作为国际金融交流平台，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推动全面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 年，国际金融论坛（IFF）积极邀请了国内外专家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推动落实国务院《南沙方案》。

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立足南沙、协同港澳、面向世界，进一步地发挥作用，为全球经济和金融领袖参与对话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为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二十大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国际金融论坛（IFF）助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

■ 周小川 / IFF大会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结构重塑，以及通货膨胀、债务问题、能源和粮食危机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分化程度加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2%，2023 年将放缓至 2.7%，而过去 40 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约为 3.5%。因此如何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恢复和发展的正轨，实现更平衡、更有韧性的发展，成为当前世界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再一次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决心，以及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的愿望。

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全球年会期间发布的《IFF2022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对 2022 年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梳理，对 2023 年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并对正在全球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进行系统解读。

国际金融论坛（IFF）举办的第三届 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对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中做出突出成绩和提出创新解决方案的机构进行鼓励，以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该奖项的设立也受到了联合国和多个国际机构的高度评价。

2023 年国际金融论坛（IFF）将迎来成立 20 周年志庆，衷心希望 IFF 立足南沙、携手港澳、面向世界，进一步发挥好国际对话交流平台的作用，继续围绕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议题，为各方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23 年国际金融论坛（IFF）将迎来成立 20 周年志庆，衷心希望 IFF 立足南沙、携手港澳、面向世界，进一步发挥好国际对话交流平台的作用，继续围绕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议题，为各方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新全球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需一揽子刺激方案 13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

重建合作、共创未来，积极应对“世界大变局” 14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以长远眼光、全球性思维应对世界大变局 16
尚达曼，新加坡国务资政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需一揽子刺激方案

■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危急关头——预防气候灾难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各国正在努力应对生活成本和利率上升以及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正在溜走。在此情况下，最脆弱的群体可能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亟需我们推动一系列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我呼吁出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揽子刺激方案：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充足流动性，包括由多边开发银行增加资金供给以及更广泛地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确保向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融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主要中央银行扩大流动性的同时，建立有效的债务减免和结构重组机制。

每个人都必须发挥作用，使其业务模式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气候目标完全一致：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必须调整风险应对办法，以合理的成本系统化利用私人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须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到2030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两倍，达到每年4万亿美元。气候行动融资须与公正转型融资齐头并进，例如投资于全民社会保护、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以及开展为新经济培养新技能计划。我们必须提高透明度并强化问责制，以便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未来的进展，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洗绿”。

展望未来，我们须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以满足当今的需要，使之推动减少不平等，并重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信任。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共克时艰，建设可持续、公正和繁荣的未来。

气候行动融资须与公正转型融资齐头并进，例如投资于全民社会保护、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以及开展为新经济培养新技能计划。我们必须提高透明度并强化问责制，以便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未来的进展，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洗绿”。

重建合作、共创未来，积极应对“世界大变局”

■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在过去的 19 年间，国际金融论坛（IFF）已发展成为沟通探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平台。广州是共同讨论“共生与重构”主题最合适的地方。在贸易和投资的推动下，广州市及大湾区很早就开始与世界共生共存。这一地区与世界的深厚联系给千百万人带去了财富。

但正如今年 IFF 全球年会主题“世界大变局”所指出的，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三年的疫情冲击使食品和能源等各种物资的价格大幅上涨，并导致各国财政政策收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IMF 预测 2023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2.7%，但实际增长率有 25% 的概率会低于 2%。2023 年，预计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亚太地区的情况相对较好，但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

首先，由于很多国家会继续通过上调利率来对抗通胀，财政政策会继续收紧。同时，高利率将导致整个亚洲的收益率上升、货币贬值。其次，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也使欧洲对亚洲进口需求减弱。第三，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房地产危机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

此外，全球碎片化趋势使世界前景更加不明朗，它还将直接冲击亚洲开放的、依赖贸易的经济模式。政策制定者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世界大变局？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降低通胀将是重中之重。中国整体通胀水平不高，这给宽松的货币政策留出了发挥空间。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困难家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会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适时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以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保障及平衡经济复苏的关键。我们很欢迎近期出台的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政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进一步保障金融稳定。然而，仅靠国内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反对碎片化。假如世界分崩离析，彼此停止贸易，那么全球 GDP 势必将减少数万亿。试想，用这些钱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制造多少辆电动汽车、栽种多少棵树木？世界根本无法承受碎片化的后果。

我们如何重建合作，共创未来？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挑战，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应发挥主导作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发出的建设性信号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首先，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在过去几年中，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急剧增加。目前，全球超过 8 亿人没有充足的食物。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此外还需设立粮食专项资金和优惠贷款，并消除粮食和化肥的贸易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设立的“粮食冲击窗口”紧急贷款工具，也是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努力之一。

第二，采取行动降低债务危机风险。像中国这样的大债权方以及私营部门有责任带头。二十国集团的“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在乍得和赞比亚取得了进展，但债务处理须更快、更可预测。

第三，通过减少全球碳排放和增强应对气候冲击的韧性，加大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力度。中国在这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气候行动的融资规模，且公共机构要参与私有资本的运作。IMF 新设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旨在向脆弱国家提供长期融资，主要目标是为激励私营部门大规模增加融资开辟空间。

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开展建设性对话，包括参加多边论坛，这对避免出现最激烈、最有害的碎片化局面至关重要。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但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推动构建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最终让所有人受益的未来。

最后，我们需要积极对话以抵制碎片化。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开展建设性对话，包括参加多边论坛，这对避免出现最激烈、最有害的碎片化局面至关重要。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但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推动构建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最终让所有人受益的未来。

以长远眼光、全球性思维应对世界大变局

■ 尚达曼 / 新加坡国务资政

尚达曼

当下，世界在众多领域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我们的确已进入了极不确定的时代——经济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大流行病爆发和全球公共领域其他挑战的能力不确定，地缘政治也有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找到乐观的新基础。

我们必须创造机会，开展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找到稳定和增长的新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多边努力，巩固强化现有机构，以及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应对当今的挑战。

我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且已知全球经济将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即使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磨砺，2023 年依然充满考验。 通胀将在一段时期高出正常水平，甚至可能是相当长的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疲软，财政状况也将更加紧张。 除了央行需要控制通胀、全球许多地区需要努力避免陷入深度衰退之外，我们还需要适应这样一个事实：超低利率的时代已经结束。实际上，全球很多地区已进入实际负利率，并且流动性过剩。基于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的经济体和商业模式现在需要纠正，这将带来一系列动荡、痛苦和损失，我们必须处理好。

以上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最大的挑战与全球共同利益有关。我们必须加快行动，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迅速逼近。我们也得抓紧时间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下次的病毒可能比我们已经经历过和仍在抗击的新冠病毒更加危险。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在本国内，而应该以国际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而是应把目光放长远。任何不作为，都会导致我们为气候变化和未来的大流行病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预防未来的危机和流行病，才能减少未来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思维模式——要目光长远，不能只顾眼前。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个方法适应世界多极化，维持多极化世界的稳定，并减少各方之间的摩擦。我们必须避免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这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成就，正是通过这个体系，全球经济才得以形成新的极点。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多极化世界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多边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这些多边机构的力量，为其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和最初创立这些机构时的世界大不相同。这些机构的改革是可行的，我们也有能力支持这些改革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提供支持所面临的制约不在于经济条件，而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能否从只顾眼前转变为目光长远，以及能否从小国思维转向全球思维。我们可以实现这些转变，也能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为乐观心态创造新的条件。相信只要大家携手合作，就能解决问题。

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亟需国际合作 18
洛朗 · 法比尤斯，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COP21 主席

积极适应当前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20
珍妮 · 希普利，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高效配置资源，应对全球挑战 21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解决全球通胀需要适度全球化和各国协作 22
多梅尼科 · 西尼斯卡尔科，IFF 副理事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深入推进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23
杜嘉祺，汇丰集团董事长

绿色转型、通胀和失业是全球性问题 24
亚历山德罗 · 特谢拉，IFF 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副部长、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共话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发展 26
于洪君，IFF 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未来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28
祝宪，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亟需国际合作

■ 洛朗·法比尤斯 / IFF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COP21主席

洛朗·法比尤斯

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最具关键意义的议题之一。作为巴黎 COP21 大会的主席，我相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必须进行国际合作。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监测，过去 8 年是世界气象史上气温最高的 8 年。2022 年夏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受到了火灾、热浪、旱灾以及暴雨的袭击，比如中国经历了热浪；巴基斯坦遭受洪灾，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倍受其害，这样的形势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不是 10 年或 30 年后，而是今天就必须共同面对的。

2022 年 11 月召开的 COP27 大会首次设立了 “损失损害基金”，为贫穷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损失与损害买单，这是迈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但是具体的措施如何、具体有多少钱、谁来出资以及哪些国家能够拿到这些钱，仍有待商榷。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 COP27 大会在治理碳排放方面，没有达成新的实质性决议，令人十分担忧。可以说，COP27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治标到治本的行动没有太大的作为。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减少极端气候灾难，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减排降碳行动。现在的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已经上升了 1.1℃～ 1.2℃，而且有 50% 的可能到 2030 年前，全球气温上升 1.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行动，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 2.8℃。所以，实现既定的《巴黎协定》温控目标至关重要，绝不能动摇。而且我们要采取更快、更明智的减排行动，涵盖人类活动方方面面，不仅要有长期的减排承诺，而且要有短期可验收评估的减排目标。

第二，气候变化的融资需求是巨大的。 CPO27 设立了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是一件好事，但是仍然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2009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 COP15 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出资 1000 亿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和气候适应的资金，这些资金仅占全球 GDP 的 0.1%，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沧海一粟，却仍然没有得到兑现。最近英国和埃及政府的研究报告显示，到 2030 年，每年对发展中国家碳减排和气候适应的投资大约需要 2 万亿美元。

实现既定的《巴黎协定》温控目标至关重要，绝不能动摇。而且我们要采取更快、更明智的减排行动，涵盖人类活动方方面面，不仅要有长期的减排承诺，而且要有短期可验收评估的减排目标。

碳减排努力应该建立在每个国家公正转型的基础上，我们要对低碳转型投资，同时也要减少向排污行业投资。然而，直到今天，一些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仍然能获得大量资助。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界最大的 60 家银行已经为化石燃料公司提供了超过 4 万亿美元的资金。金融体系问题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而当时的形势与现在早已迥异，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在低碳转型不可或缺的投资中，为创新提供资金是关键，特别是应加大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方面的投资。

第三，高效的气候行动离不开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由于俄乌冲突、国际关系恶化、能源危机等原因，导致许多国家增加了对煤炭的使用。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因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搁置分歧、缓和紧张关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言，我们面临着“气候团结”与“集体自杀”的选择。在筹备将于 2023 年在迪拜举行的 COP28 会议时，我们应该牢记联合国秘书长的这句话，尤其是中国、美国、印度这些主要碳排放国家。其他跨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是如此，比如 2022 年 12 月 7 日将在蒙特利尔召开的 COP15 第二阶段生物多样性会议。科学表明，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COP15 生物多样性会议是一个向前推进的机会，其取得成功将是应对气候问题的关键。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成因何在，却至今没能采取有效行动阻止它的危害。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更紧迫、更有效的气候行动，进一步加强国际气候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与此同时，应注意避免两个陷阱——瘫痪的悲观主义和天真的乐观主义。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讨论和解决有关气候变化的所有问题。

积极适应当前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 珍妮·希普利 / 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我们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俄乌冲突重创了全球供应链，也削弱了国际信心。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变化，给国际社会造成了焦虑，也影响了此前长期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和对国际合作的信心。

国际金融环境也面临着重重挑战，过去三年，全球货币政策总体而言是有所收紧的，而且各国既要抗疫又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得不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来推进经济发展。这两项措施既造成了当今世界范围的通胀问题，也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和不平等。

在前几年的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上，我们提出F20（Finance 20）倡议，把大中小型企业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F20 致力于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决策人汇聚在一起，吸取疫情的经验教训，围绕货币、财政政策以及通胀造成的影响进行讨论，以便未来面临类似形势时可以更好应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就是疫情造成的大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在世界很多经济体当中，我们看到由于疫情冲击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损失还有精神健康问题。新冠肺炎这个突发的、未知的、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疫情，不仅对劳动生产力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人们的心理（包括对未来的看法）也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尤为严重。疫情期间，学生的学习和教育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不能正常去学校上课，这样的学习教育是有缺陷的，将来这批年轻人走入社会，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在社会投资和心理健康方面采取行动，从而抵消已经产生损失和缺陷。

国际金融论坛（IFF）也可以讨论此类问题，不仅从人道主义角度讨论，还应讨论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企业界、教育界、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应思考这些挑战已经产生和将会产生的影响。

最后，希望我们能重新回归我们已享受了 20 年的跨国界知识共享的时代，在那 20 年，一切好像皆有可能，世界充满合作共享的氛围，互联网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开启了创新与发展新的机遇。现在，我们发现此前认为可以实现的很多设想受到了严峻挑战和质疑，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才能实现我们之前的设想，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此外，我们需要明辨国际社会中是否存在反竞争的行为，即妨碍、扭曲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这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碰到的问题不同，但同样会造成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并让人们充满了焦虑和担忧——全球化是不是还能像此前 30 年那样惠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我希望本届 IFF 全球年会不仅讨论地缘政治和发展机遇问题，也要凝聚与会领导者的智慧和力量，设计出新的框架、带来真正的改变、重建经济发展的信心。

高效配置资源，应对全球挑战

■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金立群

对于亚投行这种多边发展银行来讲，首先就是要促进全球可持续经济发展或者说国别经济发展；其次是要有效地推动净零排放的转型，此外是要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讲比较脆弱，加上俄乌冲突对全球生产链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也都不能忽视。目前还有部分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反复，当然因为疫苗接种、新药开发以及不同国家采取的相应抗疫行动，使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是一个问题，但其影响程度已不像三年前那么严重了。

对于亚投行来说，目前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时期，世界面临多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比较脆弱的宏观经济展望，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胀，数百万人重返贫困。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全球经济向净零转型的重任，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频发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

在亚洲，很多像孟买、新加坡这些人口众多、经济活动集聚的沿海地区，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2022 年 6-10 月洪灾肆虐巴基斯坦，淹没了该国 1/3 的国土面积，并导致约 1700 多人死亡。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巴黎协定》达成的 1.5℃之内，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每年需要 4.5 ~ 5 万亿美元资金支持。据估计，到 2030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资 1.3 亿 ~ 1.6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解决气候变化危机问题。这些投资可能来自公共部门，更为重要的是来自私营部门。

一直以来人们非常关注如何调动各种资源，却没有足够关注如何更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传统的融资方式就让我们觉得比较满足了，其实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去使用资源，现在的方式与二三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觉得这种多边发展银行的工作方式要做一些调整。总之，我们调动这么多资源以后，应该以最高效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主要股东或主要利益相关方来讲，确实面对很多的挑战，对于亚投行而言现在其实不缺资金，但是还有很多开发银行他们会因为资金方面的限制而举步维艰。考虑到现在资金需求的增长速度，我估计很快亚投行也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亚投行在筹措资金方面开发了不同类型的工具，为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为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应该采用新的方法，因为旧的方法已不能让我们从中获得更多益处。我们要打破常规，并且在打破常规之后使用新的方式才行，因为如果只是思想到位了，行动不到位，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解决全球通胀需要适度全球化和各国协作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 IFF副理事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我认为零通胀、零利率的时代已经终结了，通胀已经成为全球实实在在的现实风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和欧洲通胀形势就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各主要经济体采取的政策和应对措施不同。

美国的通胀是需求侧驱动的通胀，是此前扩张性经济政策和经济过热导致供应侧吃紧带来的结果。所以对于美国来说，通过加息是能够应对通胀的。但是欧洲的通胀主要是供给侧驱动的（比如能源供应因俄乌冲突受到影响），所以不能够单纯靠加息来解决欧洲通胀问题，而是需要从根源即供给侧方面来解决（比如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然而欧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是欧洲 27 个成员国的联盟。有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应对能源危机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法国有很多核电，是世界核电第一大国；德国有很大的能源储备（储能）能力，所以他们相比较欧盟其他国家受能源危机影响较小，而其他国家受能源冲击的影响较大。欧洲的通胀主要是供给侧驱动的通胀，所以能源供给直接影响欧盟的通胀情况。而欧盟各国因能源供给侧情况不同，通胀情况也不同。我对欧元区通胀实现软着陆的信心不是特别大。

从流动性和资本缓冲来看，欧洲的银行业做得还不错，虽然资本充足率不及美国和中国，但是欧洲银行在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缓冲方面做得更好。而且欧洲的实体经济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所以欧盟整个经济体系比以前更加强大。

现在金融的紧缩是无序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各国央行进行更加紧密地协调。另外，顺周期紧缩，即量化紧缩（QT），如果实体经济和货币市场之间缺乏足够的协调，肯定会出现金融风险，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很多央行在积极做相关协调工作。

另外，现在全球供应链受损严重，导致区域化发展或封闭区域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严重。区域化的发展会导致资金增速的降低，而且会影响到通胀率，比如，如果一些产品不得不在本地高成本生产，随着成本和售价升高，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通胀率。通胀率最高会达到多少，我说不出来，但通胀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肯定很大。我希望适度的全球化，希望各主要央行协调合作，这必将有利于通胀问题的解决。

深入推进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 杜嘉祺 / 汇丰集团董事长

杜嘉祺

我主要想讲一讲国际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要应对共同的挑战，要创造共享的繁荣，需要领导力与合作，否则就不会有国际和区域性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将这些解决方案落地实施。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包括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讨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是近期以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进展。

中美欧三个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而且影响着数以亿计人们的生活、贸易、教育、艺术等方方面面。过去 40 年，我的工作一直和中国息息相关，我们持续推进合作，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和联系能够帮助我们共同克服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能够让我们的人民、企业都更加强大。

当今全球的制造业供应链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冲击，都会对整个供应链进而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也是制造业产成品最大的消费国之一。欧美的制造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中国市场，因而他们在亚洲的供应链中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东西方的联系绝不仅限于汽车和手机的生产，也包括金融服务，所以确保开放的投融资渠道会让所有参与方都从中受益。比如在过去几年，西方的制药公司在中国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直接就业机会，每一个直接就业机会又能再创造 4 个间接就业机会。以服务为导向的西方经济模式如果能够把更多的像消费者贷款、保险这些金融产品带到中国，让储蓄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居民获得多元化的投资渠道，那么这些企业就能够在中国找到更大的市场，这既有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向内看，只期待增加自己的利润份额，则不利于我们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气候变化。各行各业都要建设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可再生能源电力，这样才能够通过全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大环境，让我们更加有必要像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打造全球铁路网那样，投入资金，努力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现在有 1500 万辆电动汽车，电动汽车保有量居世界第一，到 2040 年可能将达到 2 亿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迅速发展的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帮助很多国家实现了汽车行业的脱碳化，伦敦已出现中国生产的电动巴士和出租车。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坚实合作是促进共同经济增长和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唯一有效方式。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对话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舒尔茨总理不久前也访问了中国，我们对于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一系列与亚洲和 G20 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上的密切接触表示欢迎。我真诚地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的国际对话，无论是双边的还是通过 20 国集团或其他形式。东西方经济体之间应进一步加强联系，并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允许货物、服务、创新、投资等在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的国际体系。世界各国应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和交流，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并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

绿色转型、通胀和失业是全球性问题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IFF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副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我们常说“世界变了”，实际上现在才是真的变了。现在全球出现的很多新经济增长点，不是来自发达经济体，而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这说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22 年 11 月中旬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峰会比 G7 峰会的议题更重要、更具影响力，这也再次验证了包括贸易格局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当前，全球面临很多挑战，包括不确定是否已进入尾声的新冠肺炎疫情。另外，全球经济治理亟需合作和全球领导力。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绿色转型，但我认为从某种角度而言，不是应该加快绿色转型，而是应该开始绿色转型。在 2021 年 9 月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17 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世界各国签署《京都协定书》《巴黎协定》时做出的承诺也都没有兑现。所以，我们在全球合作与领导力方面存在巨大问题。现在我们面对的诸多挑战，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是全球的共同挑战。

全球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需要深究一下，推高失业率的具体是哪类人群？

全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决定和行动，将影响全球未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由此，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我们正处于一个扁平化的世界中，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还有贫富分化带来的巨大不平等以及贫困饥饿等问题。当然，全球化在解决上述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停止贸易战，各经济体应在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体系当中合作，应充分发挥多边机制解决危机的作用。否则，人们将对多边机制丧失信心，比如欧美出现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都有此类现象。尽管全球面对重重危机，但危机中也蕴藏着机遇。现在的机遇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善现状？如何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需要尽快了解世界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并让更多的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世贸组织一直在努力推动这项工作。我们亟需更多的自由贸易，包括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也进入世界贸易市场。

第二，有关可持续、包容性的金融。包容性金融于 2005 年由联合国提出，它强调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目前世界上还有不少地区和人群没有被金融服务覆盖。如何让这部分地区和人群享受到金融服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我们在全球合作与领导力方面存在巨大问题。现在我们面对的诸多挑战，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是全球的共同挑战。

现在美国和欧盟都呈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甚至全球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此时，应推动本地货币体系健康发展，不能单一依赖美元，尤其是在已经迈入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当下。全球目前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发达经济体需要通过加息解决通

胀高企问题，但是谁来为加息的溢出效应买单？尤其是谁来给发展中国家由此受到的冲击买单？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要格外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我们很清楚美元经济的信用和权威跟三四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从经济总量来说，亚洲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然而在 IMF 特别提款权当中，亚洲的比重为什么并没有提高？为什么在联合国的话语权也没有提升？我认为，应该按照经济体量进行再平衡。

最后，要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债务、通胀等，应在全球范围进行协调决策，应该聆听和尊重中、印、巴、墨西哥、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话语权，各国应该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共同提出解决方案。因为包括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大多数全球共同挑战，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是由发达经济体造成的。我并不是在这里挑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互相对抗，我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就必须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也是我在 COP27 大会以及 G20 峰会上听到的呼声，这同样也是我希望在本次 IFF 全球年会听到的声音。

共话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发展

■ 于洪君 / IFF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

人类社会是既充满矛盾和冲突，又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共同体，这是大家的共识。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借鉴，对人类进步发展的影响是各有千秋。我们观察思考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大势，如果过分强调矛盾冲突、联合对立，并且以此为基础来处理对外关系、国际事务，那势必会加剧人类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让文明互鉴成为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当然，倡导文明互鉴，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实践再实践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文明互鉴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为世界各国联动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强大动因。

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政策沟通，不仅要在国家和政府这个高级别层面上积极推进，同时也要在地方领导和相关企业这个层面持续展开。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核心任务，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实践证明，这“五通”作为当今时代文明互鉴的五把钥匙，成功地开启了拥有不同文明色彩、呈现不同发展状态的国家共同进步的“五大通道”。这五把钥匙中政策沟通的作用和意义尤为突出，政策沟通的实质就是不同发展理念、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成长方式彼此认同、相互对接。没有积极有效持续的政策沟通，就没有“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就没有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就没有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全面展开，政策沟通的过程就是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的文明互鉴过程。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政策沟通，不仅要在国家和政府这个高级别层面上积极推进，同时也要在地方领导和相关企业这个层面持续展开。

这些年，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坚持把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当作系统工程来抓，努力实现民心相通的本土化、大众化，使合作伙伴之间人文交流合作与共同开展的民生工程相互融合，增进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夯实了务实合作的社会基础。

如今，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是世界第一货物大国，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已经遍布全球，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这个大好格局的形成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出现了发展思路广泛对接、安全利益彼此契合、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各国人民共克时艰的一种文明交融的新格局。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故事就是文明互鉴的典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企业承建的高速路、高架桥、高楼大厦随处可见，除了十年前中国援建的非洲最现代化建筑——非盟会议中心之外，高达 209 米的东非最高建筑物——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新总部大楼也已拔地而起。埃塞俄比亚石油公司总部大厦，以及高达 265 米的 Abyssinia 银行大楼也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中。

埃塞俄比亚方面邀请中国企业投标建设这些重大项目，原因在于他们信任中国企业、中国的质量、中国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文明互鉴。

这些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无形之桥越来越多，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齐头并进，经贸网络与文化交流相辅相成，科技合作与文明互鉴相得益彰。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以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有了更广泛的认知和认同，这是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融合发展、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兼收并蓄走向更高阶段的重要表现。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改变，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急剧变革，人类社会的基本诉求集中表现为发展和安全，每个国家必须把自身发展与安全同世界共同的安全与发展协调起来。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两大倡议对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发展与安全问题具有特别现实的引领作用。

总之，在当前国际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各国都应当秉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扩大交往、优化合作的理念和原则，持续推进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世界发展安全、企业稳定运行的前提和保障，高水平的发展与安全协调有助于人类文明进入新的更高阶段。

未来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 祝宪 / 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祝宪

所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或者是风险，都被笼罩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对峙带来的阴影之下。因此，我和很多人既担忧又感到困惑的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全球化在接下来 5 ~ 10 年当中将何去何从？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轮全球化的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占了上风，大部分主流的经济学家和决策部门的官员都讲要消除贸易障碍，要推动各种各样经济政策的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当中。这个时期，全球经济具备强大活力，而且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之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电信、航运的成本和价格都有所下降，使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配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中国也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非常重要的一环。

全球化也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全球化也带来了很多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以及全球层面。上一轮全球化更多的是以效率为导向，特别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工商界、企业界更加高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跨国企业的各种举措。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平，进而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最近几年，很多人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有一些政客也利用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大肆推行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

展望未来，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未来？是去全球化后来居上，还是全球化度过目前难关后仍然能够继续大步向前？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现状让我们倍感困扰。

全球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同时，民族主义抬头、区域的固化以及贸易和投资的集团化也日益凸显。一些人说全球化并未死亡；另一些人说全球化已经不能再按照过去 30 年的模式向前发展了。我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是，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去反对目前的区域化合作或者区域团体。我们应该达成这样一个新的共识——把上一轮全球化中好的价值观，以及常态和架构加以维持。这样各种区域化的合作就能够和全球化并肩而行，而不会让所谓“国家利益”这样的狭隘说法阻碍全球化的整体发展。

我们应该达成这样一个新的共识——把上一轮全球化中好的价值观，以及常态和架构加以维持。这样各种区域化的合作就能够和全球化并肩而行，而不会让所谓“国家利益”这样的狭隘说法阻碍全球化的整体发展。

如果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肩发展，彼此互联，全球化的原则就能够继续存活，同时区域一体化也能够进一步深化，而且在深化的过程当中，能够奉行全球化的原则，这样就不会让我们过于担忧。

根据研究和观察，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决策部门，当时都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产业政策，他们认为出台产业政策是浪费资源，是反对市场化的原则。但是现在这种形势已经发生逆转，针对产业政策的态度已经逆转。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主要的经济体比如美国，也在出台综合全面的产业政策进行国家干预。其实美国的做法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产业政策做法差不多，只是我觉得这个 180 度的转弯好像很快很突然。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产业政策。

在中国，我看到产业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失败的案例，也就是说，产业政策的实施、实践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果看到越来越多的干预，不会让我们吃惊，但是要注意这些相应的干预靠的是纳税人交的钱。如果希望进一步推进产业政策，比如说政府的干预以及贸易投资的限制，就不能再指望着上一轮全球化所取得的高效发展能够在这一轮继续实现。

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的群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的成本比较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现在如果有国家的干预、限制，一方面会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再去期待全球层面的经济发展会像之前那样高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必须要做出权衡才行。此外，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开展讨论，好好看一看国家干预在国家层面上会带来哪些好处或弊端。

现在的世界面对这么多不确定性和困难，我们不应简单地推进全球化，而是要深度分析；也不应简单地反对去全球化，而是要仔细观察全球化背后的原理和主张。去全球化也不一定那么糟，有一些政策，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或者这种类型的区域化发展，可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像所设想的那么糟。

概括而言，有些短期问题，像对地缘政治冲突和通胀的担心，肯定不能忽视，但是如果在全球化方面无法达成共识，在未来 5 ~ 10 年内，全球经济都将不太可能处于比较好的发展状态。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 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31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

全球长短期问题的区分和治理 32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IFF 理事、土耳其前副总理

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确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顺畅 34
张慎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中巴经济走廊发展展望 36
扎法尔 · 乌丁 · 马赫默德，IFF 执行委员、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助理、首任中巴经济走廊特使

印度尼西亚在促进贸易投资合作中具有关键作用 38
斌德加，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

2023 年“一带一路”10 周年的展望与探讨 40
马建新，道琼斯风险合规中国总监

“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 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 /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

2022 年是中国 - 哈萨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 30 周年，2023 年是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哈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了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

2021 年，哈萨克斯坦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达 187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50%。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翻了接近三倍——这证明了中哈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尽管 2020 年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但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是带来了实际的商业和经济成果。例如，2022 年前 7 个月，中哈贸易额不断增长，超过 130 亿美元，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下设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完成的 20 个项目之一，是一个提供高科技交易平台的世界级证券交易所，由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高盛集团、上海证券交易所、丝路基金和纳斯达克共同投资建成。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作为一个合作项目，为建立联系紧密的共同市场提供了机遇。目前已启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进程，将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与中国的金融市场连接起来，为双方进行交易活动创造条件。2022 年初习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也提到了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这座特殊的桥梁。

土耳其发起的“中间走廊”计划将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桥梁。中国、哈萨克斯坦、南高加索国家、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共同连成了一条重要的经济走廊，与古代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中间走廊”和跨里海航线将成为哈萨克斯坦发展的基石之一。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公认的“一带一路”枢纽，将帮助各方共同为“中间走廊”添砖加瓦，实现价值共享。

我们需要推动形成政府间多边和商业协议，建立完善的市场以及资本市场，创造新的工具，特别是金融科技。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立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利用创新型工具来推动共同市场的发展。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也同样致力于绿色金融发展。2019 年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与绿色投资原则（GIP）秘书处以及其他签署方建立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我们将有效结合哈萨克斯坦的新经济政策，以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为导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讨共同原则。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将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资金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大的价值。

全球长短期问题的区分和治理

■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 IFF理事、土耳其前副总理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问题。我认为应该把突发性问题和长期结构性问题区分开来，因为周期循环性问题会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突发性问题产生的是临时性影响。我们清晰地知道，气候、地缘政治的问题以及人口问题是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全球货币的紧缩是目前通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之一，相对来讲，这可能是短期的周期性问题。我觉得其严峻后果包含疫情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口已经陷入极端贫困，每天赖以为生的资金仅有两美元五美分，这已经是极端的贫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世界减贫工作已卓有成效，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是现在全球经济下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全球返贫人口增多。

首先我想讲一下全球货币紧缩政策和它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应对。现在全球的通胀水平很高，而且已持续了较长时间，影响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实施过度宽松财政货币政策造成的，进而推高了粮食、能源等产品的价格。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大的政策空间来刺激他们的经济，没有办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大幅度加息，所以发展中国家控制通胀的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快速有效，甚至只进行货币政策调整不能解决问题。

要帮助那些最脆弱的、最有可能贫困的人群，面对多重风险，国家应该有一系列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的目标是控制通胀，帮助央行把工作做得更好。大家知道，这次波及全球的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货币紧缩政策，但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其溢出效应的影响。发达国家的融资冲击，有可能会造成全球整体经济发展放缓，而发展中国家会首当其冲。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它们提供帮助和援助工具，助力发展中国家稳定财政货币政策，稳定国家经济。总之，我们必须要注意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要避免财政政策的过分扩张，也要稳定货币政策避免出现长期通货膨胀，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

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冲突，这主要是由地缘政治等矛盾、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冲突。我担心的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有的、运作良好的多边贸易体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当中，各国或各公司企业不用选择团体或者是集团；而在一个两极的世界当中，各国或各公司企业不得不选边站，选中国还是选美国，要做一个选择。现在由于技术出口领域有限制，影响到制造业的一些工厂，也就是外包业务，从长期来说是会影响 AI、能源等工业。

一定要给它们提供帮助和援助工具，助力发展中国家稳定财政货币政策，稳定国家经济。总之，我们必须要注意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要避免财政政策的过分扩张，也要稳定货币政策避免出现长期通货膨胀。

非洲可能不像亚洲那么幸运，亚洲受益于全球化很快脱离贫困。在未来十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非洲有 290 万亿的外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对于非洲来说，一个逆全球化的世界大背景对其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也是如此，逆全球化的世界大背景肯定会带来更多挑战。

第三是关于气候变化，从短期来说，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融资缺口，既要有价格低廉的能源，又要进行清洁能源的转型。我建议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也要继续关注能效，我们必须要生产更多的产值，但是能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补贴不是最好的方案，哪怕能源一定要做补贴，也是要有针对性的、精准的。清洁能源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以带来高质量的就业，推动全球整体经济发展，避免世界受到气候变化的更大影响。

最后一点，是美联储的加息过分激进让人担心。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曾因此造成拉美经济危机，千禧年的时候又带来网络泡沫的破裂，然后 2008 年出现了房地产的崩盘。所以，如果货币政策收紧太过激进，必将导致某一个经济部门出现崩盘，况且现在全球经济处于放缓的阶段，风险的偏好应选择避险目的。发达国家如果激进收紧货币政策，将可能导致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外流。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做好准备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会更容易受到冲击。

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确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顺畅

■ 张慎峰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张慎峰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9 年来，中国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瓜达尔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硕果累累，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 12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 1400 亿美元。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畅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连环大考”中，共建“一带一路”展现出了强大韧性与活力。

我就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确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顺畅，分享四点意见：

第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形成全球性的集群化、系统化、平衡化和效益最大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出台一系列税收和补贴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一定程度改变了原有国际分工体系。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经贸摩擦愈演愈烈，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行出口限制，对关键零部件和产品“断供”，甚至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也频繁挑起经贸摩擦，严重影响跨国企业正常经营，许多产业链因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而受到冲击。随着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和多边贸易谈判日益艰难，越来越多国家将目光转向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通过商签自贸协定来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关税减免，推动全球产业链不断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球生产和供应链运转遭遇严重阻碍，大量医疗、半导体等产品供应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某些领域关键供应链显现出脆弱性。纽约联储发布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显示，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压力持续上升并于 2021 年底达到峰值 4.38，其后有所下降，预计全球供应链瓶颈有可能持续至 2023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能源、粮食、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全球日益呈现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多元化、产业分工区域化的趋势。

第二，中国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是联合国标准下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配套最完整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已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到第 12 位，智能制造取得长足进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走在全球前列，5G 移动通信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全球市场驱动型、效率驱动型、资源驱动型资本更加看好中国。

中国依靠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韧性和弹性，经受住了疫情考验。2020 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经济增长 8.1%，GDP 连续两年超过百万亿元，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5 年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不仅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注入了宝贵信心与坚实力量。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第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既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当务之急，也是后疫情时代有效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全球抗击疫情的事实再次表明，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同舟共济、坚定信心、相互扶持，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所以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深化国际经贸往来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各国应当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持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增加大宗商品、关键零部件生产供应，提升重要商品供给能力，推动国际物流畅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同做大国际经贸合作蛋糕，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作用，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第四，工商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的重要力量

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也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与关键。我们要支持企业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合自身技术、资源禀赋主动构建“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鼓励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实现价值链优化升级、整合延伸和互利共赢发展。

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形成全方位、可持续的产业链合作网络与合作格局，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利共赢的重要纽带。我们要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高质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海外生产基地、供应链与国内产业链全面联动，进一步联通区域和全球大市场。要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优势互补企业组建“走出去”战略合作联盟，实现大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全产业链走出去。实践“两国双园”“多国多园”等合作新路径，将境外产业园区打造为承接国际产能合作、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同时，要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体系，帮助企业提升风险及时识别发现、精准有效处置能力，强化疫情期间“一带一路”项目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切实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

扩大科技创新合作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坚实支撑。我们要合力挖掘创新增长潜力，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各方普遍接受、行之有效的规则，为科技发展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更多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合作，深化“一带一路”数字产业链和绿色产业链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中巴经济走廊发展展望

■ 扎法尔·乌丁·马赫默德 / IFF执行委员、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助理、首任中巴经济走廊特使

扎法尔·乌丁·马赫默德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和政治话语界的热门词。一般来讲，它用来表明世界上的地理边境和分界不再那么重要，而不断流动的资本、想法、人员、货物、标准以及价值观越来越多地融合交汇。多边协议是二战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它推动了全球贸易，越来越多的货币区、贸易区以及像东盟、欧元区之类的多边合作区相继出现。

但是我们在发展全球化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比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社会经济危机，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都令全球化的政策受到严峻挑战。而现在全球化有演变成去全球化的趋势，去全球化就是这个世界减少相互之间的联系。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的一些去全球化政策和措施，使货品、服务、劳动力及资金流动不再那么顺畅。它们制定的政策保护本国的就业，打压其他国家的竞争，增加了配额和关税，严重影响了二战后原本的金融和经济秩序。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现在选择了向内看的去全球化行动，而中方提出了相应的对抗性主张，主张自由贸易、经济联系以及共同富裕。面对现在逆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建立相互联系的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跨国公司以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将从中获得益处。

中亚一直以来都是连接东方和西方市场的重要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主要融汇之地。中国的玉器以及香料从中亚销向西方，象牙、玻璃产品以及贵重金属从中亚运往中国。罗马帝国或是拜占庭帝国都是通过中亚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积极投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让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目前前景暗淡的世界分裂情况以及去全球化势头，中国政府积极打造铁路网络、能源网络、管道网络、高速网络，希望能够跨越边界，无论是向东、向西都能够实现连接。这样的网络也能够让国际社会更多地受益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科技、货币等方面的优势。

面对目前前景暗淡的世界分裂情况以及去全球化势头，中国政府积极打造铁路网络、能源网络、管道网络、高速网络，希望能够跨越边界，无论是向东、向西都能够实现连接。这样的网络也能够让国际社会更多地受益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科技、货币等方面的优势。

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受益国，中巴经济走廊是 2014 年开始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启动的时候，巴基斯坦正面临电力短缺等一系列严重挑战，而且是全国性缺电，道路和铁路网的互联互通也非常欠缺。从那时起，中巴企业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之下，开展了遍及巴基斯坦各地的发电站和电力网络的建设工作。经过共同努力，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巴基斯坦的电力短缺得到了缓解，而且实现了从南到北的互联互通。这些建设和发展不光为巴基斯坦带来了繁荣，也为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带来了经济繁荣，而且也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且加速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电子商务是它们必须抓住的机会。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技术，打造自己的电商平台，中国也推出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来更好地规范电子商务行业，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还能够促进通讯、能源、网络以及跨境多币种的联通，使人民币能够用于更多的贸易结算。总之，目前全球化存在着一系列的挑战，但是通过“一带一路”能够抵消去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建设互联互通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发展机会。

印度尼西亚在促进贸易投资合作中具有关键作用

■ 斌德加 / 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

斌德加

印尼与中国的合作

印度尼西亚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2013 年两国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积极促进印尼 “全球海上支点”（GMF）战略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对接，在 GMF 和 BRI 这两个框架之下，加速推进“四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印尼四大经济走廊是：1. 北苏门答腊岛，是东盟的经贸枢纽；2. 巴厘岛，是高科技及创意经济枢纽；3. 北苏拉威西，是环太平洋经济带；4. 北加里曼丹岛，是采矿工业带。

印度尼西亚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2 年 11 月份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峰会会晤，提出要共同加强 GMF 和 BRI 的发展。目前两国已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很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将于 2023 年 6 月投入运营的雅万铁路。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 年双向贸易达到 1234 亿美元，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也达到了 32 亿美元。2022 年 1-9 月，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 1102 亿美元，中国给印度尼西亚的投资，2022 年 1-9 月达到了 16 亿美元。

印尼积极推动 RCEP 签署

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过八年的谈判最终在 2020 年 11 月签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涵盖了世界 1/3 的 GDP 和 1/3 的人口，RCEP 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5 个国家。RCEP 的签署表明这些地区的国家、政府和企业对未来的区域合作充满期望，希望通过深化加强经济一体化，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印尼是最早提出 RCEP 设想的国家。印尼是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在东盟排名第一。印度尼西亚为积极促成 RCEP 协定的达成，做了很多努力，因为 RCEP 也符合印尼的利益。当前，多边主义举步维艰，全球价值链及全球贸易遭受重重挫折。 通过 RCEP，东盟能够充分利用区域的价值链，更好地与全球价值链相连接。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想和中国一起，通过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调整，提升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印度尼西亚结构性政策调整，主要通过《就业法》体现出来，这也是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能够帮助印尼获取来自不同国家的新投资，包括中国。

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

2022 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在巴厘岛举办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会后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巴厘岛领导人宣言》。印尼总统在 G20 峰会致辞里讲，合作让 G20 国家更走近民众，他强调 G20 成员的合作，包括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地保证世界的安全。因为这个世界正面对着人道主义危机，如能源、金融以及石油、食品、供应链等等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二十国集团每年举办很多活动，比如部长级会议、工作小组会议以及其他活动，都是由轮值主席国组织和召集，2022 年是印度尼西亚，2023 年是印度。印度尼西亚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在财经系列活动里讨论了金融、财政以及税收的安排，印尼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代表各自部门参加了活动。财政板块主要讨论了六大议题：1. 通过疫情管控放开政策实现经济复苏；2. 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3. 加强数字领域的支付系统；4. 开发系统性的金融工具；5. 积极开展普惠金融；6. 国际税收议程。印度尼西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证明了二十国集团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绝佳平台。

东盟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非常出色的地理优势，有多个机场以及多个重要港口。粤（广东）是中国大陆发展最快的省份，港、澳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强大的发展活力，也与东盟国家保持着全面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是大湾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印度尼西亚公司在大湾区落户、发展， 大湾区企业也希望与全球的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包括东盟国家。我们希望跨境投资贸易活动能够在疫情后快速反弹，希望产业参与者抓住时机，重新与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2023 年“一带一路”10 周年的展望与探讨

■ 马建新 / 道琼斯风险合规中国总监

马建新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家共同展望并探讨 2023 年的新变化、新理念。

一、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将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结合国际政策，需要坚持一些原则和理念。

（一）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

这是基础，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多边主义，各方只有在自愿参与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政策的对接、项目的合作、责任的共担、成果的共享。各国不论大小、贫富都是平等的，一起协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打造惠及各方的务实成果。

（二）秉承开放、绿色和廉洁的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要建一个小圈子，也没有排他性，所有感兴趣的伙伴都可以参与。在包容、合作的贸易环境下，通过促进国际经贸合作、跨境贸易投资、打造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绿色技术、绿色金融，应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挑战，鼓励各方加大建设廉洁文化、打击腐败、对腐败零容忍，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目标。

（三）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要尊重各国的法律法规，鼓励不同规则和标准加强衔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注重可持续。在这一过程之中，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表现出相通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上指出，“一带一路”所聚焦的各方面的政策，比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目标，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质是相通的，实现这些目标，就可以让全球受益。

二、从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共商“一带一路”

共商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来，强调平等参与、充分协商、平等自愿，通过合作来共同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体现全球共识。打造共商国际化的平台和合作机制，比如说“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已经成为各国促进互信、密切往来的重要平台。再比如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大公司、小企业都踊跃参与其中，从亚洲的腹地到非洲的国家，各个都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一带一路”国际化合作平台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中国 - 阿拉伯国家峰会、丝绸之路博览会、中国 - 东盟博览会等，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

（二）要强化多边机制在共商之中的作用。平等、协商、开放、包容，需要各国共同来参与，共商“一带一路”。比如各国参与“一带一路”，要遵循多边合作机制，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协同发展。比如说遵守 ESG 规则，从环境、社会、治理三个层面展开相关的合作。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提升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反腐败、透明度等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加强对股东、员工、消费者及社区等一些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这也是“一带一路”惠及民生的根本，实现从硬联通、软联通到心相通的转型，也是“一带一路”可以造福于民的机制。

（三）要建立二轨制的对话机制。要倡导“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智库，包括民间团体、工商界、媒体、高校形成二轨外交。围绕共商共建，坚持多种多样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国际金融论坛（IFF）就是一个很好的二轨对话平台。还可以鼓励各大高校开设“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合作发展学院或者联合培训中心，培养“一带一路”国际化的人才。另外媒体也要加强合作沟通，比如举办媒体论坛、合作联合采访，提高“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能力，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一带一路”的相关信息。

三、从竞争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

现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展望 2023 年，“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但是更多的是充满机遇和发展。

（一）“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和则兴，战则衰，共赢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离不开和平发展的环境。各国应就重大关切问题互相支持，坚持对话解决争端，协商化解分歧，增加互信，减少猜疑。在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方面，相互协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争端解决机制，共建安全风险预防的机制，共同制定应急处置的工作机制，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二）“一带一路”是繁荣之路。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各方凝聚共识，把共识转化为行动，在关键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形成透明度，办好相关的新业态、新动能，保障经济活力。还要加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平台，通过建立双方和多方的货币直接交换机制，让经贸往来不用通过第三方货币作为中介，可以节省外汇成本。比如使用人民币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发展，很多金融创新的工作都可以助力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是所有人的共识。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开放，不搞地缘政治小圈子，不是关起门来或者友岸外包。共商共建共享，大家才能够更好地去发展。面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要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让大家有共同、均等的发展机会，让发展成果由各国的人民共享。

总之，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我们进入新的发展征程。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共商“一带一路”；从竞争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共同携手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经济新形势

中国经济新形势 43

韩升洙，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国际经济环境挑战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44

林建海，IFF 副理事长、IMF 原秘书长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动态 46

中尾武彦，瑞穗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

中国经济新形势

■ 韩升洙 / IFF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

持续的疫情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放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最低的卫生成本度过了新冠疫情危机。然而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毒株导致更频繁和持续的封控，并随着时间推移导致了更高的经济成本，特别是推迟了私人消费的可持续复苏。

中国从2020年年初疫情早期阶段就开始显著复苏，能够满足世界各地从接触密集型服务转移到耐用品而突然增加的家庭消费需求。然而随着疫情特有因素的消退和全球经济减速，这些外部利好因素正在消散。 随着中国私营投资的大幅下降，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也给经济复苏增加了压力。

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疲软问题，所以通胀仍然处于低位。中国政府需要为均衡复苏提供宏观政策支持，并重点支持弱势群体、支持消费，采取更多行动遏制房地产行业持续出现的风险，从而确保整个金融行业的稳定。在这个方面必须努力确保未完成的房地产预售项目尽快交付，并且使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重组，中国政府也应该通过提供额外的政策支持和完善风险监测等手段来防范房地产行业风险外溢的影响。

中国经济中期增长的前景，因地缘政治分化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适龄劳动力人口的萎缩蒙上了阴影。所以为实现中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过去十年，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例如，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了金融业，对外资准入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知识产权保护得到了加强，从而促进了市场竞争。户口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也改善了资源的配置。然而，疫情阻碍了这些进程，所以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劳动力群体萎缩和生产力放缓，应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加快以市场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例如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改革国有企业，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政府在中间保持中立的地位，以及促进绿色投资的同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这些都有助于重振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提高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

高质量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与跟气候相关，中国应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提交了最新的减排承诺，就是中国国家自主贡献（NDCs），其中包括在 2030 年之前达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不得不实施一系列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这个体系还可以变得更加有效，比如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电力行业以外，使电力部门更加一体化，更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的改革有助于激励能源的有效利用。

从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并且支持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扩张，继续努力实现经济再平衡，这将降低能源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亚洲也非常关心，因为亚洲是全球价值链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枢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多边合作依然至关重要，期待中国持续发挥作用，构建更加开放、稳定、透明的贸易体系。

IFF2022 全球年会对于引导中国经济的未来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国际经济环境挑战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 林建海 / IFF副理事长、IMF原秘书长

林建海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离不开对全球经济大环境的思考。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多、不确定性高；短期来看，有以下几方面挑战需要考虑。

第一，全球经济在短期内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2023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大幅度、大面积、大范围的下跌，其中占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二的经济体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将对中国的短期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居高不下，引发全球主要央行采取比较剧烈的货币紧缩政策，加息力度和速度都远超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也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影响。此外，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降低，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以及金融市场收紧，加重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难度，提高了融资的成本。能源、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危机，甚至发生社会动乱。

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我觉得低增长、高物价、高债务和能源粮食短缺这四大问题，是它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增长长期停滞、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等问题，如果再加上劳动人口下降、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以及收入不平等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面临的困难会更多，难度也会更大。

在全球层面上，逆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给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给世界所有经济体和大多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新老产业更新、知识技术信息的传播分享，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IMF 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平稳的物价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全球化的便利降低了高收入家庭 1/3 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低收入家庭 2/3 的生活成本。可以说，前十年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比较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

过去的教科书或实践让我们相信雇佣劳务、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现在有人提出，要加强在盟友间的生意往来，减少对非盟友国家的依赖，以确保关键货物供应的可靠性。这种思路的转变将对未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活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和后果。

此外，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也是很大的挑战。在今后的若干年中，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可能进一步加剧。IMF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关系十分紧密，其受地缘政治风险和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影响也更为突出。比如美国近一半、欧盟近 1/3 的进口货物都来自亚洲国家。另外，亚洲国家对关键商品的需求也占全球总需求的一半以上。该报告的场景分析显示，如果世界两大贸易集团之间发生能源、技术脱钩，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长久的损害，并可能降低世界 GDP 的 1.5%，亚洲 GDP 的 3% 。

另外，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绿色转型不仅涉及资金和投资问题，也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全球数字技术的研发，特别是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广阔前景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稳定风险，以及对金融监管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和新挑战，我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质和量同步发展，两者缺一不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逐渐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基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高质量增长是个长期目标，达到该目标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避免主要经济变量出现过度波动，并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政府应采取合适的财政、货币、金融等政策组合，并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效率等促进经济转型。

第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研究发现，在贸易快速发展的 20 年间，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全球人口的百分比，脱贫人口都超过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不仅是贸易交流还包括金融、投资、人文交流，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和决策。

第三，转变发展动力，提高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较快，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一是思考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GDP 的年增长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假如要在 4.5% ~ 5% 之间，那么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中国要跨入中等高收入国家行列，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必须有很大的发展。二是可以通过分析民企和国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思考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涉及民企和国企的关系，涉及所谓“竞争中性”原则。三是思考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比如，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认真考虑如何延长退休年龄。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发展服务业，这是高质量增长的桥梁。中国金融在国际金融的占比较低，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全球平均来看大约占 GDP 的 2/3，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高达 80% 左右，中国近几年发展比较快，服务业在 GDP 的占比超过了 50%。

第五，推进普惠、包容、绿色增长、提高人民福祉，是高质量增长的最终目的。这方面包括很多内容，绿色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安全、加强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等。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认识到加强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药品疫苗的研发、老人康养等，都是今后投资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动态

■ 中尾武彦 / 瑞穗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

中尾武彦

我主要简单讲一讲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情况，我们不能够让今天的世界像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陷入几个集团的划分当中。

中美日欧，曾有过一段非常友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货物、服务、技术等自由贸易的往来，各国从中获益良多，我们要确保这样的贸易往来能得到保持。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怨念或者意识形态的差异，我们都应把共同的繁荣、和平放在第一位，没有人应该因为冲突丧失自己的生命，就像在乌克兰那样。虽然要想回到过去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向好的方向努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通胀和加息。当然我们想要保持通胀稳定，并且是偏低的，这样的需求市场是有共识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曾经出现过高通胀，甚至是超高通胀。特别是在当时的拉丁美洲，为了应对通胀，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快速大幅加息，因而扰动了市场，造成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有一些新兴经济体也不得不跟着加息。接下来美国可能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这是基于通胀的延续，其他因素还有待观察。而且美国的通胀走势和成因也是值得商榷的，有很多微妙之处，我认为美联储应注意他们采取的措施对于新兴经济体债务问题带来的影响。

日本已经连续 30 年经济下滑，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泡沫，泡沫破灭之后是“失去的 30 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又经历了资产负债平衡表型的衰退，也就是通过收入侧、资产侧不断的萎缩来降低负债，从而导致了不利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当出现商品价格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它会产生不利的财富效应。

另外，日本的人口结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呈现出负增长，现在 65 岁以上日本人的占比已经达到 29%，是美国的两倍。所以在日本不光有供给侧的问题，也有需求侧的问题。日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养老，投入到对老年人的照护和医疗当中，而不是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对年轻人的支持和研发工作当中，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日本还面临着韩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竞争，韩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对日本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关系，在日本曾经有竞争力的领域他们在不断地取代日本企业，比如三星。目前，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继续领跑。总之，日本经济相对来说是比较虚弱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

日本的物价很低，过去 30 年当中通缩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购买力平价来看，日元是应该升值的，通过升值来抵消低通胀。但是过去 30 年，由于通缩因素，使日元的汇率保持了稳定，没有升值，也使日本整体物价水平偏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日本生产的产品很难卖出高价，从生产环境来说，日本的环境并不差，但是对于价格、价值来说，情况并不是那么理想。

简而言之，日本的通缩已经持续了 30 年。日本希望能达到 2% 的通胀率，如果想要摆脱通缩，日本就必须进行量宽。但是日本已经保持了长时间的低利率，10 年期国债也已经接近零利率。日本希望通过低利率刺激经济，但是好像这样的低利率政策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还产生了副作用，导致量化宽松政策难以为继。而且现在银行利差太小了，对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现在日元

在贬值，当然贬值使得日本的资产和出口变得更加便宜。总之，现在和日本有关的一切都是便宜的，有些方面日本已经像新兴经济体了。

最后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即日本必须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但是我现在也难以回答应该由谁来出面进行这样的调整，是不是需要日本财政部出手干预汇率机制。日元曾经升值到 75 日元兑换 1 美元，当时日本的有关部门也出手干预过，这一类的干预措施如果得当的话会相当有效。如果日本的货币政策还是低利率，需要出手干预汇率，防止日元进一步贬值。当然每一个政策都要精准，要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目标，要确保这些政策之间不会彼此抵触。

气候变化 / 碳中和

通过事先避免举措应对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与气候变化 49
亨利 · 保尔森，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 51
解振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几个重点 53
李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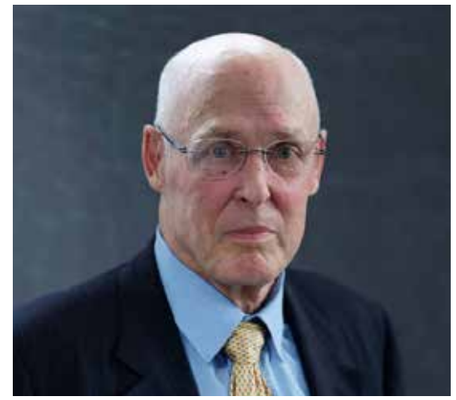
企业经营应与“双碳”目标深度融合 54
柳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与挑战 56
倪清，普华永道中国 ESG 可持续发展市场主管合伙人

香港积极开展碳实践，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58
赵健能，香港联合交易所碳市场及 ESG 产品发展部主管

通过事先避免举措应对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与气候变化

■ 亨利·保尔森 /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亨利·保尔森

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与气候变化关系非常直接。与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冲突相比，环境的相关风险被淹没在众多问题之中，并不令人关注。但是环境风险问题对于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生存至关重要，而要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亟需中美携手紧密合作。2022 年 11 月，各国领导人齐聚 COP27，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12 月，在蒙特利尔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简而言之，应对全球性气候危机并制定相应国际性解决方案的需求日渐强烈。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并加剧了生物多样性危机——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加剧了气候变化危机。全球性珊瑚礁消亡就是一个例子。科学家预测，由于海水升温、酸化和污染，在未来 20 年内，70% ~ 90% 的珊瑚礁会死亡。这将危及 4000 种鱼类，并影响全球约 5 亿人的福祉，这 5 亿人依赖珊瑚礁生态系统获取食物、保护海岸和实现就业。尽管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变化相互关联，但前者更令人担忧。一旦错综复杂的大自然系统失去平衡，我们将面临许多未知的危机。

我们没有技术手段恢复已经灭绝的物种，也没有成本低廉的人工系统可以替代自然生态系统，例如湿地能蓄水防洪、补充地下水储备及过滤水流。归根结底，事先避免环境破坏比事后修复更具成本效益。而且许多措施成本并不高昂。首先，改革对农、林、渔业有害的农业补贴，其成本很低甚至零成本。而改变这些不合适的补贴，可以在刺激生产的同时减少对自然的损害。其次，应改进基础设施规划。鉴于基础设施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让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成为主流相当重要，这样可以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同时，还应要求金融投资者和贷款人进一步披露其融资和贷款决策对环境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总之，在我们能够最有作为的领域采取行动，并不需要花费很多资金，而只需要政治决心。政治领导人想要保住乌纱帽，因此很难采取短期内会造成牺牲和痛苦但能实现长期繁荣的政策。长期既定的经济模式和做法基于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改变这些模式和做法尤为艰难。政治领导人会倾向于将眼前的经济收益放在首位。但是，合理评估大自然的价值理应是未来十年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保护自然能带来明确的经济、健康和气候效益。但同样重要的是，保护自然应当是为了大自然本身。大自然是生活中许多美好事物的来源，包括美丽、灵感、创新和求知欲。

但是，合理评估大自然的价值理应是未来十年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保护自然能带来明确的经济、健康和气候效益。但同样重要的是，保护自然应当是为了大自然本身。

我始终坚信，一个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企业界仅有少数人与我持同样观点。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自然

保护的问题上，各方开始产生紧迫感，对绿色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兴趣迅速增长，并再次认识到各方共同努力可以改变世界。保尔森基金会和我本人倡议建立了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这些年我们拯救了多种濒临灭绝的湿地鸟类，也保护了湿地，为鸟类提供了繁育的场地，并有效防治了生物固态以及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气候灾害，比如风暴和海潮。因此我乐观地认为，保护和投资自然将融入未来金融界的主流趋势，保尔森基金会和我本人都十分期待大家携手合作，在未来取得新的成果。

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

■ 解振华 /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

当前，世界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粮食短缺、经济增长迟缓、气候变化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在此时此刻需要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能。以绿色低碳为抓手，加速转型和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安全、能源、粮食、健康、环境、气候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对于有效应对多重挑战显得格外重要。

在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危机与挑战中，气候变化已经从未来的挑战变成眼前的危机，而且日益严峻和紧迫。2022 年以来，热浪、干旱、洪涝、台风等极端天气出现在世界各大洲，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子孙后代的福祉。

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唯一的选择。因此，必须推动各方将当前发展与长期转型结合起来，同舟共济、各尽所能，采取切实的行动落实各自 2030 年自主贡献和中长期碳中和目标，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落实，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因受到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有所回摆，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有所增加。我们希望这只是应对眼前困难的权宜之计。《巴黎协定》和《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创新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世界已经迎来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希望各主要国家不要因眼前的困难而改变，请继续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增进政治互信，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外交环境和开放的贸易金融秩序。

中国始终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努力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还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领导机构，已经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积极推进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

过去十年来，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成效显著。2012 年至 2021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2 年下降了约 34.4%，单位 GDP 能耗比 2012 年下降了 26.3%，累计节能约 14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 37 亿吨。新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1.2 亿千瓦以上。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达到和超过 3 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规划建设 4.5 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第一批 9500 万千瓦已经开工建设。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全球 50% 的风电、80% 的光伏设备组件都来自中国。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连续七年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099 万辆，占全球一半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力争十年内植树 700 亿棵。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再次彰显了中国推动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定决心。也表明中国不论面临多大困难，都将继续坚定采取行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实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在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曲折和困难的关键时刻，呼吁各方共同坚守《巴黎协定》，不能轻言放弃。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振了信心，注入了强劲动力。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持续取得积极进展，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为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创新、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做出积极贡献。

长期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绿色发展领域工作，创立了丝路国际联盟、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与高盛集团等 20 家跨国企业合作成立了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与保尔森基金会、欧洲碳定价工作小组，组建了全球碳定价会议机制；与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办公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45 家国际机构和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全球共同倡议》，为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继续努力，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打造国际交往新平台。为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几个重点

■ 李波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李波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有三个重中之重：

第一个重点就是碳定价。全球碳价格现在过低，我们的研究显示，要想实现《巴黎协定》既定目标，到 2030 年须实现碳减排 25% ~ 50%。要实现这一减排幅度，全球平均碳价格必须达到每吨 75 美元，而现在的全球平均碳价是每吨 6 美元，差距非常巨大。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2021 年全球碳排放的 22%，2022 年全球碳排放的 30% 已经被涵盖在碳定价机制当中，所以只要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就能够取得进步，进而填补这个差距。为了填补这个差距需要出台政策的组合拳，包括开征碳税、碳交易排放和监管政策，这是应对气候变化当中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气候融资。为了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全球每年绿色和气候变化项目投资约需 3 ~ 5 万亿美元，实际上这个领域每年能够得到的投资还不到所需资金的一半，所以每年都面临着 1 ~ 2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我觉得要填补这个资金缺口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应当更加行之有效地利用好已有的资源，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动员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

气候变化资金缺口如此之大，只依靠公共资金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撬动私人资本大规模参与，就必须打造一个合适的政策环境，比方说碳价。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公共财政、公共投资管理，以及环境和社会标准方面的能力。另外，为了撬动私人资本的参与，需要利用混合型融资模式来建立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希望公共部门承担第一批可能产生的亏损，并起到增强信用的作用，而且要推出去除风险的金融工具。有了这些举措之后，私人投资者才更加愿意投资气候变化，他们的风险汇报分析才会更加有利于气候变化投资。

第三个重点是公平公正转型。各国推出的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都是为了帮助本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严重的地区和居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气候变化行动融入到工作中的每一个方面，并积极与政策研究部门进行密切合作。IMF 也对主要的碳排放国最低碳价给予建议，到 2030 年全球的平均碳价应该达到 75 美元每吨。IMF 把气候变化融入其双边和多边监测计划以及磋商机制当中。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特别重视气候风险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把气候变化融入 IMF 能力建设的项目当中，并积极推出绿色投资公共评估工具 PFMCD、绿色投资债券管理工具等。IMF 不久前刚刚发行了第一个子类长期性的工具及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融资安排，用来帮助成员国应对像气候变化和疫情这类长期性的挑战。

IMF 非常高兴、非常愿意和多边开发银行等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以支持帮助成员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企业经营应与“双碳”目标深度融合

■ 柳磊 /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柳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市公司具有资本市场的基石和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器”的功能优势，为企业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新途径提供了一些启发。

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目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立足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并助力上市公司践行“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责任，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下面我分享几个观点：

一、上市公司在发展中加深绿色转型理念，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

企业的绿色发展是经济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近两年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仍保持增长的态势，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突破了 5000 家，总市值约为 80 万亿元。根据中上协三季度业绩快报显示，2022 年前三个季度，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52.37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8.51%；实现净利润 4.75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2.46%。作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上市公司践行“双碳”目标，既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转型的自觉行动，也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担当。

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已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加快技术研发革新、产品低碳转型、绿色模式创新等抢抓历史机遇。同时，上市公司多措并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多家上市公司打造内部碳排放管理平台，监测管理碳排放情况，量化评估碳足迹。有的公司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减碳承诺，明确碳排放强度下降比例。上市公司低碳绿色转型的步伐不断提速，助力“双碳”目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必选项”。

二、“双碳”目标下上市公司 ESG 实践和信息披露水平明显提高

加强 ESG 信息披露被普遍认为是推动上市公司主动践行“双碳”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ESG 整合了环境、社会、治理多维的因素，将投资决策标准和关注要素从传统的财务绩效为主扩展到可持续发展、公共利益和良好公司治理等领域，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双碳”目标愿景以及全球发展观密切吻合，为上市公司落实“双碳”战略提供了具有共识的标准框架。

中国的“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也为 ESG 责任投资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优渥的政策土壤。近年来，全球 ESG 基金的资管规模从 2019 年末的 1.28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末的 2.74 万亿美元，中国 ESG 相关基金规模也超过了 3 千亿元人民币。提高 ESG 表现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得到境内外投资者认可，在深入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获得资本市场支持，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加快做优做强的步伐。

上市公司正在通过完善并强化 ESG 管理水平，提高社会各界对 ESG 理念及国家“双碳”目标的理解。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群体不断建立健全 ESG 管理架构与制度体系，加强对外交流，推动实践和工作落地。特别是在 ESG 信息披露方面，从 2011 年到 2022 年，披露 ESG 相关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从 565 家增至超过 1400 家，ESG 信息披露的主动性逐年上升。多家上市公司连续 10 年及以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积累了丰富的 ESG 信披经验。

同时，ESG 信息披露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国际化、电子化趋势，有效扩大了 ESG 信息披露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在 ESG 评级提升方面，随着国内外 ESG 指数及数据评级机构逐渐加强对 A 股的覆盖，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正努力提升评级表现，与境内外主要评级机构深入沟通，以 ESG 评级提升为导向形成改进项，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或积极参与问卷等方式，了解其核心关注点并获取改进建议，评级结构持续向好。比如：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的 ESG 评级分布不断上升，评级落后者比例从 2019 年的 59% 下降至 2021 年的 46%。部分优秀公司评级表现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在标普、道琼斯、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指数中，其评级甚至超越国际优秀的同行公司，不断提升了中国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度。

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充分发挥自律服务组织的作用，引导上市公司落实“双碳”愿景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积极引导上市公司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引导上市公司关注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积极承担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责任。IFF 全球年会上，平安银行、建设银行、申万宏源、北京银行、中国石化、隆基绿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国电电力、中信银行等中上协职务会员单位，在第三届“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的评选中脱颖而出，分获年度奖和创新奖。

2022 年以来，中上协具体举措有：一是举办特色活动，搭建沟通平台。成立了 ESG 专业委员会，成员以上市公司为主，还包括监管和专业机构人士，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通过举办 ESG 主题沙龙、开展调查研究、倡导最佳实践等，搭建起了监管机构、上市公司、投资机构、国内外评级机构等 ESG 各方主体的沟通交流平台，引导和支持上市公司 ESG 相关工作，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 ESG 管理体系。二是充分利用贴近上市公司的优势，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上市公司 ESG 故事，加强境内外投资机构、评级机构对上市公司的了解。汇编出版了《上市公司 ESG 优秀实践案例》，提升各方市场主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引导上市公司对标，不断提升 ESG 能力建设。三是开展相关调研，发布相关研究成果。中上协将继续编写发布年度《中国上市公司 ESG 发展白皮书》《上市公司 ESG 分行业报告》等，为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上市公司 ESG 发展情况提供参考；同时探索编写相关自律指南，为上市公司提供参考。

我们要坚持将资本市场一般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中国上市公司 ESG 工作还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未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将继续发挥好平台、阵地、桥梁、窗口的作用，集众智、聚群力，积极落实国家战略，与广大上市公司群体一道，更好肩负起“双碳”战略的历史使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与挑战

■ 倪清 / 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市场主管合伙人

倪清

正如大家所知，气候相关风险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主要中长期风险，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损失在近年来显著增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未来 10 年全球前十大风险中有五项与气候和环境相关。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近 20 年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次数与造成的经济损失，较之前 20 年几乎翻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趋势，目前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国家 GDP 总和已经占全球 GDP 的 90% 以上。

虽然各国作出了碳中和承诺，但实际脱碳进展远远不够。根据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2022 净零排放经济发展指数”，2000-2021 年，全球年平均脱碳率仅为 1.4%。而要实现《巴黎协定》1.5℃的温控目标， 2030 年前全球年均脱碳率需要达到 15.2%。

世界各国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加强协调合作，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加速推进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最新趋势值得关注：1. 绿色可持续金融框架进一步完善。例如，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推动成立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出的框架建议已经成为国际广泛认可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已经明确要求金融机构，甚至上市公司按照 TCFD 框架进行披露。目前，TCFD 支持机构已超过 4000 家，涉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推动披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根据《2022 年排放差距报告》，要实现全球低碳转型，每年预计至少需要 4 万 ~ 6 万亿美元的投资。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光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私营部门的力量，发挥市场的作用。当然，建立框架也很重要，中国通过建立绿色金融框架，用 6 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信贷余额超过 20 万亿。当然，在纯绿色项目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属于棕色或者不符合绿色定义的项目，以及企业整体脱碳转型的金融需求，这都需要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近 20 年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次数与造成的经济损失，较之前 20 年几乎翻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趋势，目前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国家 GDP 总和已经占全球 GDP 的 90% 以上。

2022 年 11 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批准通过了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提交的《2022 年 G20 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就包括《G20 转型金融框架》。以该框架作为指导，G20 成员将能够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转型金融的具体政策，包括转型金融标准、信息披露要求等。相信不久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 G20 成员国都将适时推出各自的转型金融框架和指引，加快推动实体经济存量企业的转型，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在 2021 年 11 月的 COP26 会议上正式宣布成立。该机构旨在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与气候及其他可持续问题相关的高质量披露标准。目前来看，ISSB 发布的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ISDS）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得到了很多积极反馈，它具有成为全球统一 ESG 可持续披露标准的趋势。因为 ISSB 的姐妹机构——IASB，在全球金融会计准则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IASB 推出的会计准则体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执行。未来 ESG 可持续发展报告将会与财务报告一样举足轻重，非财务信息和财务信息互为补充，全面满足投资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

目前一些经济体已经开始逐步建立法律法规，提出强制披露要求。在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立法上，欧盟走在了国际前列。2021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提案。2022 年 11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先后审议通过了这个提案。随后再经过欧洲议会议长和理事会主席签署，《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将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并在发布 20 天后正式生效。CSRD 将取代现行的非财务报告指令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NFRD) 规则，CSRD 的适用范围规模将在 NFRD 基础上扩大 5 倍，预计将有超过 5 万家企业受到 CSRD 的影响，涵盖了所有在欧盟市场监管上市的企业、符合定义的大型企业，以及在欧盟有重要业务的非欧盟企业。 CSRD 对可持续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企业定期披露有关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具有可靠性、可量化性的信息，还要求对报告内容作出强制性审计，其监管和质量要求等同于企业财务报表要求。

为了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转型发展，各国政府和市场需要共同推动可持续金融框架、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可持续监管立法的发展。其中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立法，建立框架性要求，建立金融支持的体系，并通过严格的执法来防范“漂绿”风险；市场主体则可以通过更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来不断提升 ESG 管理水平，更好地向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展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价值。

香港积极开展碳实践，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 赵健能 / 香港联合交易所碳市场及ESG产品发展部主管

赵健能

全球越来越关注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各国也承诺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气候变化，并为将温度控制在相对工业化之前上升 1.5℃以内做出积极的贡献。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首先，我介绍一下碳市场的背景和现状。碳市场主要分为强制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强制性市场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总量管理。通过管理特定控排行业及企业的温室气体配额，达到管理总体排放量的效果。第二，配额再分配。为控排企业之间的配额转售提供便捷的途径。第三，价格发现。通过配额的无偿或有偿分配以及市场的买卖，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碳权定价机制。随着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全球碳市场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增加，亚洲也不例外。根据 MSCI 的数据，全球强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 2700 亿美元。欧盟 ETS 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最发达的 ETS 之一，2021 年欧盟 ETS 市场约占碳配额交易的 90%。中国在 2021 年 7 月启动了首个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叫“全国市场”，目前全国市场与另外8个已运行多年的试点碳市场并行。全国市场最终将覆盖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行业、造纸、石化、航空等 8 个领域，中国的 ETS 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之一。

其次，介绍一下自愿性减排市场。自愿减排市场旨在把全球不同的资源包括资金引导并投放于加强环境保护的项目，比方说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US），而这个市场的有效和公平运作跟相关的国际标准制定和标准执行密不可分。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可持续发展举措例如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的贡献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具备的。比方说跨国企业要求他们的供应链企业达到碳中和，更多机构因而需要寻求工具、技术和资金以支持他们的业务成功减碳，或向碳中和转型。因此自愿减排市场是个国际性的市场，并能正面影响私营部门投入资源减碳。根据国际倡议 EcoMarketplace 于 2022 年 8 月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对比 2020 年，2021 年全球自愿减排市场的价值翻了 4 倍，达到 20 亿元美金。自愿减排市场的快速增长可以归因于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以及制定碳中和目标的公司和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市场机制设计，使得他们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以及要求，有序、有效的正常运作，包括强制市场与自愿减排市场的互动，自愿减排市场相关碳权核发标准制定，相关市场运作对跨境调节机制及 NDC 的影响，规避风险等有效机制。

通过了解投融资的决策和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ESG 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根据路透 Reuters 的数据，香港特区 2021 年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较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5 倍，达到 320 亿美元。在背靠祖国，面向国际以及有利的政策驱动之下，香港特区有条件扩容香港的碳市场，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以及香港特区的 2050 年碳中和目标。

基于香港特区比较独特的定位，香港特区为促进国内和国际碳市场健康快速发展，推动人民币在国际碳市场的使用乃至协助不同企业机构实现碳中和，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香港特区在 2022 年最新的施政报告中提到，大力发展绿色可持续金融，其中特别指出需要发展香港的国际性碳市场。

二、香港特区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很多国际性的金融机构一直扎根于此，并拥有大量的人才储备以及不同行业领域范畴的丰富专业知识，同时香港特区拥有与国际标准接轨、完善和值得信赖的监管环境。

三、香港特区熟悉国内及国际碳市场核证标准，拥有良好的绿色认证和金融服务，可为推动国家相关机制，如中国核证自愿减排产品CCER国际化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香港特区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之一，可通过在香港特区积极发挥国际性碳市场作用，推动国际碳权以人民币计价，侧面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另外，香港国际碳市场发展还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香港特区并没有强制减排市场，也没有碳税的相关安排，因此首先打造自愿减排市场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目前香港国际碳市场是中国首家，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国际性碳市场，该市场能成为当前全国性及地方性试点碳市场的有效补充。

二、香港国际碳市场是全球唯一一个以人民币及港币双币作为国际性碳权计价及结算币种的碳交易所。

三、香港国际碳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碳市场一直存在的痛点，包括之前一些企业面临的交易相关风险，并能寻求有信用及高质量的自愿减排额度。

四、香港国际碳市场的推出能满足当前实体经济对国际性碳权的需求，包括满足其他国家对相关产业链企业的碳中和要求，以及上市公司 ESG 碳足迹披露的相关要求。

绿色金融 / 可持续发展

世界银行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61
冯慧兰，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62
吴晓青，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顶层设计 + 试点探索”助力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 64
宋敏，IFF 学术委员、IFF 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加速绿色投融资建设，助力中国绿色转型 66
王丹，恒生银行 (中国) 首席经济学家

践行 ESG 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68
赵永刚，中证指数公司 ESG 业务部总经理

世界银行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 冯慧兰 /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冯慧兰

世界银行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在世界面临多重危机，发展中国家也面对着非常大的挑战。世界银行近期主要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应对眼前比较严峻的危机；二是推动包容性、有韧性的增长，从而实现全球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复苏。

当今的世界环境多重危机叠加，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有出现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另外，强势美元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溢出效应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总之，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经济大环境。

关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发展危机，可以看以下数据：第一，2020 年世界赤贫人口约有 7000 万，另外全球约有 7.93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1.9 美元。而且不仅是在低收入国家，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的部分人口也面对这样的问题。第二，受疫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阅读能力已经从百分之五十几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几。

面对全球出现经济下滑的形势，亟需调整、出台积极有效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短期工作用来应对多重危机。世界银行、IMF、区域开发性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过去三年做了大量应急的工作，比如世界银行划拨了 1300 亿美元疫情应对资金，以及 1700 亿美元全球危机应对资金和 300 亿美元粮食安全资金，这些资金都是为了应对短期的危机。世界银行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协调其宏观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充满挑战性的世界形势。

其次是长期性的问题。过去几个月中，召开了几个重要会议，包括 COP27 大会，达成了不少共识，比如长远眼光、长期增长，以及如何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危机，如何解决社会存在的薄弱环节，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国际性问题，并不是哪个国家单打独斗能够解决的，对于全球发展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

各国的决策者和国际金融机构要优先推动经济复苏，要投资所有类型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实体资本等等，而且要大力支持科技的普及和创新。要助力实现全球经济复苏，首先需要提供多边融资和优惠贷款给予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然后撬动其他资金来源也加入进来，这些都需要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并且要找到富有创新意义的资金动员方式。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利益相关方都在积极加强与信用评级机构的商谈力度，商讨如何在现有资产负债评分表的基础上加大借贷的力度，如何推出富有创新意义的金融工具。积极思考多边开发银行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当中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比如，应该提供更大规模的优惠贷款，每年至少要由多边开发银行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到两万亿美元的融资。多边开发银行要给需求方提供优惠条件的融资，要在政策以及机制建设方面加大投资和支持力度，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重点工作。

世界银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在优惠融资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加大机构建设和政策协调，这样才能够撬动金融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慈善基金的捐款、赠款等其他来源的资金。我认为应打造一个绿色金融的架构，这是绿色转型的组成部分，希望我们能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的平台上围绕此类话题进行更多的合作和探讨。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 吴晓青 /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吴晓青

当前，经济衰退的危机犹如高悬的利剑，气候变化也成为金融稳定的新威胁。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重申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开展合作的承诺，其中可持续的能源转型被列为此次峰会三大优先议题之一，这进一步说明破解全球发展困境依然需要关注环境和生态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优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为中国的绿色发展确立了方向，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的智慧。

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梯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中国已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两份文件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2022 年前三季度，中国各银行机构纷纷加大了绿色信贷投资的力度，整体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高达 20.9 万亿，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项目的贷款分别为 8.3 万和 5.56 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 66.4%，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不断提高。

取得进步和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困难和挑战。对金融行业来说，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依托新的技术孵化新的融资模式，这不仅需要金融界内部的对话与合作，更需要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机构，还有众多专家集思广益、共同应对，增加更多元化、多样性的产品，以满足实现生产的需求。与之相适应，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也迫切需要提质升级。首先，要积极参与碳定价机制和国际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宏观协调，与有关各方共同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其次，应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合作开发，设立有效对接中外的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大力发展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引导各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跨境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第三，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拓展全球绿色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第四，研究设立国家间低碳转型基金，支持重点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鼓励各国社会资本联合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优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2022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出，一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加强风险防范化解，确保广州南沙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欧盟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推动在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对接，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将南沙打造成为国际合作的前沿地。我们要在南沙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推动创新发展，要充分发挥金融的关键作用，要始终坚持国际化的正确方向。

国际金融论坛(IFF)将在 2023 年迎来成立 20 周年庆。20 年来，IFF 发挥新型国际交往平台作用，积极推动全球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为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做了许多具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国际金融论坛（IFF）积极邀请国际国内专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实践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积极落实国务院《南沙方案》，做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国际金融论坛 (IFF) 立足南沙、协同港澳、面向世界，进一步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对话提供一个高端国际化平台，为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顶层设计 + 试点探索”助力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

■ 宋敏 / IFF学术委员、IFF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中国绿色金融虽起步晚，但凭借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2022 年上半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整体规模已突破 20 万亿元。如此迅猛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在绿色金融政策方面的绝佳设计与不断完善。中国是全球率先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之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整体框架。

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

中央政府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指明了发展方向，地方政府为持续探索各类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顶层设计 + 试点探索”模式助力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此外，考虑到绿色金融支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的局限性，中国进一步鼓励转型金融发展。

（一）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出发，对绿色金融发展进行全面、统一的部署，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促进绿色金融创新。2016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架构。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了“三大功能”（即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五大支柱”（即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进一步构建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目前，绿色金融三大功能正在显现，五大支柱也初步形成，在支持中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构建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第二，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取得重要进展；第三，激励约束机制在绿色金融方面逐步完善；第四，中国的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第五，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不断深化。

（二）通过改革试点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利于因地制宜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绿色金融，为全国绿色金融发展积累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中国是全球唯一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国家。2017 年以来，国务院批准了在六省 (区) 九市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验区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桥头堡”，可以促进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和应用，激发创新，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新动能。除试验区之外，2021 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 23 个地方入选气候投融资试点，积极培育具有显著气候效益的重点项目，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探索一批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大力发展转型金融

转型金融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是进一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路径。传统的绿色金融注重支持“纯绿”或“接近纯绿”的项目，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的经济活动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这种金融“减碳”对整个社会低碳转型十分不利。为帮助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中国大力鼓励转型金融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发改委正在研究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相关政策与指导性文件。

二、进一步激励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综合、全面的政策支持，既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协调好中央与地方政策、经济政策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又要激发市场活力、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

第一，完善制度基础与数据基础建设。例如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及信息披露准则、优化绿色金融考核标准、发挥信息技术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还可以在环保法律法规制定中加入鼓励绿色金融发展的条款，对相关机构从事金融活动的环保责任进行明确要求。

第二，增强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激励。在货币与监管政策方面，可进一步拓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相关政策适用的范围和期限，推动将绿色金融业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提高高标准绿色债券货币政策合格抵押品的比例，降低银行投资绿色公司信用类债券风险资本占用，进一步激发绿色领域投资活力。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关部门可为积极参与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提供财税优惠措施，包括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给予适当奖励等，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发行与投资，探索建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以应对当下绿色金融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使用市场准入政策限制高碳行业扩张，利用政府产业基金支持高碳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最后，进一步激励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可利用碳市场的力量，使碳中和的投资具有可预期、可测算的合理回报率，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

第三，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各国应从大局思维出发，摒弃恶性竞争，在竞争合作中推动绿色金融共同发展，加强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协调、推动绿色金融国际标准体系建设、积极构建绿色金融全球数据共享平台。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相结合，再以转型金融作为重要补充，中国在绿色金融政策方面的绝佳设计与不断完善，必将为碳达峰、碳中和之路创造光明的未来。

加速绿色投融资建设，助力中国绿色转型

■ 王丹 /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转型和绿色转型上的投资是世界最高的，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这其中有传统经济结构的原因，也有经济转型之中遇到一些不可避免困难的原因。中国的绿色转型中有很大一块是通过产业政策进行的，国家制定计划并通过最终目标来限制企业在某些传统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希望能够通过一定的市场方式引导资本进入绿色低碳的新兴行业。

中国绿色投资主要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内，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新能源，尤其是光伏和风电。 2005 年之后，光伏和风电的投资都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这既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优胜劣汰、残酷竞争的过程。在个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批有世界竞争力的光伏企业，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决心。推动气候转型、贯彻 ESG 理念，不仅涉及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绿色金融问题，也涉及未来 20 年中国发展经济的方式。

从 2000 年开始，发达国家在绿色投资上一直领先，但是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因能源危机等原因，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绿色投资方面的增速下降；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积极落实气候变化承诺，在绿色投资方面则加速上升。

为什么中国在绿色投资领域下这么大决心、花这么大力气？首先，中国承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这是一个硬性指标，需要分解体现在每年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中。刚开始提出碳中和目标时，国内实行了一阵类似运动式的碳减排，很快就发现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过快的去碳、过快的关闭煤电和过快的煤炭减产，对中国的能源供给造成了很大冲击，以至于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出现了能源短缺问题。此后，进行了很大调整，中国政府提出从国情实际出发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制油、煤制气在清洁煤上的投资重新得到重视。另外，中国特别需要发展清洁能源，进行绿色转型，这也是由于国内对电的需求决定的。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前主要是靠投资、靠消费拉动，未来 20 年，一定是要靠自动化、高科技拉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意味着对于电力的需求将呈指数级上升，只通过传统煤电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

中国在光伏发电方面的投资，截至 2022 年底，差不多已经是 2021 年投资的 3 倍。照此趋势，中国在 2030 年之前，将会把煤电在中国用电中的比例降低到 40% 以下，而光伏发电的比例将会大大提升。

在对外投资方面，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上，2021 年 9 月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退出煤电的总体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煤电项目最主要的资金和技术提供方，是煤电建设最重要的国家。从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一年以来，中国的政策、金融机构、能源企业都有巨大改变。2021 年 9 月之后，至少有 15 个煤炭项目被直接取消。

融资方面主要信贷支持来自于中国的国开行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煤电退出。从 2016 年开始，在海外的“一带一路”能源项目里面，化石能源占比已经开始下降。海外项目绿色转型要求融资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因为过去中国的煤炭和水利项目，主要依赖海外承包工程，用当地国的主权担保作为贷款条件提供融资。在过去 20 年，这样做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独立的项目融资才是主流，中国不但需要引进私营资本，而且需要和第三方合作来加速缩短这个学习过程。

在融资方面绿色债权是最大的亮点，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权市场，2021 年差不多有 90% 的绿色债权在国内用于可再生资源、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上面，而最大的金融支持来自国开行、国家电网和国家电投。但是，目前中国的绿色债权市场和欧美相比差别依然很大。欧洲绿色债权市场的人力、融资成本与其他债权相比更低，因为有很多投资者出于经济或企业自身的需求，愿意投资绿债；但是在中国，市场的买家基本上都是银行，绿债的溢价比较低而成本比较高，而且与其他一般债券的成本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虽然中国与欧洲的绿色债权都是政策导向型，但欧洲有更多的市场推动力。

另外，中国的绿债尽管发行量大，但按国际标准来看，因为 ESG 还在早期，中国对绿债的定义没有那么严格。国外绿债的标准就是碳中和，中国绿债的范围非常广，包括降低污染或者保护环境，甚至生物多样性，让投资者难以区分绿债和一般债。在运用绿债融资方面中国的定义也非常宽泛，发行绿债得到的额外资金应该用于碳减排相关活动，但中国发行的绿债也可以用于修机场、修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这对于瞄准碳中和目标的债券来说是有一定争议的。当然，中国现在对于绿债市场非常重视，有了很多可喜的进步，但是央行也认识到，有一些高风险借款人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寻租，在绿债上面有违约的可能。所以，在绿色转型方面，尤其是金融支持方面任重道远。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绿色转型，在未来的 20 年定会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企业层面、银行层面都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恒生中国在 ESG 方面期望达到行业领先，为此我们是目标结果导向型的。在不同的产品结构上，银行机构包括恒生中国也有一些不同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仍处于早期的实践阶段，想要更大规模的推广，仍然依赖于最终市场的选择。要让金融市场在绿色债权和绿色金融方面流动性更强，需要大家方方面面的努力和合作。

践行 ESG 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 赵永刚 / 中证指数公司ESG业务部总经理

赵永刚

第一，如何从更多维的视角来看待上市公司践行 ESG 理念。

首先，上市公司践行 ESG 理念，它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点，一个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两个点其实与 ESG 里面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是非常契合的。二十大报告里面还提到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内涵也是相契合相适应的。所以，上市公司，尤其是央企、国企践行 ESG 理念，不仅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要求，也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其次，上市公司践行 ESG 理念，也是其谋求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服务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建设很重要的要求。

ESG 代表了一类非财务信息，就是从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来揭示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市场上对于 ESG 理念有一些误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也碰到过。比如说 ESG 到底是不是拼凑？为什么只有三个字母？多一个或者少一个行不行？其实 ESG 理念它不是一个拼凑的概念。世界经济协会得出结论，根据风险发生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大部分的风险都可以归结为环境、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所以 ESG 是当前企业在未来运营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要素。从投资理论上讲，ESG 与现有的投资理论是不是不相契合？其实我们在投资上会发现有一个效用函数的概念，以前我们简化一些分析，完全是为了建设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实际上，在效用函数的作用下，企业是有更多目标的，它可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从这一点来看，ESG 与传统投资理念只追求经济效益不同，它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最大化的目标，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要从更多维度的视角来看待上市公司践行 ESG 理念。

第二，当前上市公司在践行 ESG 理念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市场各方对于 ESG 理念稍稍有一些误解，比如说可能有部分的上市公司认为践行 ESG 理念可能会损失经济利益，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影响公司的利润水平，当然这些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企业在践行 ESG 理念时，它可以给企业带来品牌护城河或者新竞争力的形成，尤其是一些绿色产业的转型过程当中可以抓住新的机遇。部分投资者认为 ESG 不是一个短跑健将，投资 ESG 的产品短期效果不太好的话可能就很焦虑。其实这可能是没有很好地理解 ESG，它倡导的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投资理念。所以在面对 ESG 时要理清一个关键，就是 ESG 不是强迫投资人扮演慈善家进行不理性的投资，反而它是希望引导投资人更理性更合理地进行资产配置，这是一个对 ESG 理念误解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现在市场上 ESG 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尤其国内的 ESG 数据质量不高，规范性弱，可比性差，这样一些问题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缺少权威的、共识的且契合国情的 ESG 标准，这可能也会让企业比较困扰，企业不是不想披露 ESG 信息，但是它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到底要披露哪些信息。哪些算是 ESG 的关键信息，尤其对于一些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具体执行的信息口径、披露的标准可能都不太统一，定性信息比较多，定量信息比较少，这也会导致我们一些企业在国内外的评级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占优。

最后，就是 ESG 的投资生态不健全。确实存在一些“漂绿”的情况，这种“漂绿”的行为会影响社会资源、社会资金向 ESG 表现优异的上市公司有效流入。基金“漂绿”的本质，是希望通过夸大或者虚假宣传它的投资产品来蹭热度，希望募集一些资金来诱导客户投资，但是实际上这种“漂绿”的行为确实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相对于主动的投资产品，ESG 指数产品公开透明的规则，明确指出这个指数应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评价方法，可以使投资者了解他所投资公司的 ESG 属性。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市公司践行 ESG 面临的问题。

第三，展望一下未来上市公司践行 ESG 的前景，有三个方面可能会成为未来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1. ESG 数据和 ESG 评价标准。在 ESG 生态当中，它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因为上市公司践行 ESG 不只是出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它需要完整的 ESG 生态。在这个生态里面，比如说 ESG 评价标准，它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有一个信息披露的参照，它可以对标同行改善它的 ESG 治理水平。ESG 指数和 ETF 这种产品，可以为投资者践行 ESG 理念提供重要的工具，引导资源向好的、高水平上市公司流入。ESG 的数据产品，也可以为资管机构管理组合信用风险提供支持，这是一个很完整的 ESG 生态。

2. 在国际共识框架下，建立契合国情的 ESG 信披标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最近两年全球的 ESG 信披标准逐渐向权威共识的方向发展，虽然标准会趋同、会兼容，但是并不代表是统一的。因为各国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尤其是新兴市场，它的差异化，还有发展的不均衡性，上市公司的规模大小、行业属性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所以 ESG 信披标准要与当前的企业发展阶段，与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相适应。

3. 机构投资者在 ESG 的投资领域将会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从国际上来看，在 ESG 投资领域，机构投资者是重要的引领者。近期中国的社保基金 ESG 投资组合开始向公募招标，相信未来社保基金在 ESG 投资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带动整个国内 ESG 投资领域的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

新货币体系崛起的转折点 71
格罗丽亚 · 马卡帕加尔 · 阿罗约，IFF 理事、SRIA 联合主席、菲律宾前总统

数字货币需解决公众信任与监管的问题 73
理查德 · 伯纳，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波动研究所主任

人工智能规模化发展将降低传统行业生产成本，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 74
徐立，商汤科技董事长兼 CEO

云计算需软硬件协同方能发挥算力优势 76
任妍，阿里云研究院高级战略总监

新货币体系崛起的转折点

■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 IFF理事、SRIA联合主席、菲律宾前总统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金融的转折点——那些持续推进和影响世界的某些国际因素和力量，也可能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货币交易、决策和制度。

首先是美国及其欧洲、亚洲盟友，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这些大国和经济集团之间的公开竞争不可能不影响全世界的贸易、金融和投资。西方对莫斯科的经济、金融制裁改变了能源贸易流动，并推动俄罗斯发展自己的支付机制，避开已经禁止俄银行交易的 SWIFT 系统。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成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代美国成为大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如果中国南海地区出现冲突，中国可能遭受如同目前西方经济体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

当然，聪明的经济学家及其数据科学专家伙伴，可能正在为即将崛起的另一种国际支付体系制定一些紧急预案。这个国际支付体系可能由金砖国家建立，也可能由“欧佩克 +”建立。因为后者在石油出口国决定每天减产 200 万桶后，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威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数字货币的兴起与推广。新冠肺炎疫情封控期间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对加密货币的狂热投机，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崛起。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和加密货币的崩溃，这一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是，电子支付的便利性、快捷性和安全性（尽管有一些网络犯罪），以及人们对金融保密和自由的需求，可能将推进数字货币取代现在的纸币。即使没有地缘政治摩擦，替代性的支付系统也已经出现，尤其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些中央银行以及高盛等主要国际银行采用，国际清算银行也一直为其在主流金融中的使用制定标准。

精通科技的年轻人数量、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不断上升，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从企业到街角商店，各种形式的卖家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渠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和任何人进行即时和安全的交易。虚拟商品是增长最快的产品，它们不仅需要数字支付，而且还可以成为同样需要数字金融来存储、评估、保障和交易的金融资产。虚拟商品的市场有多大？ Adroit 市场研究公司五年前对全球市场的估值为 320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将达到近 190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2%。投资者认为亚太地区是目前最大的市场，到 2030 年可能会以更大的增长幅度保持领先的地位。

谈及年轻一代，人口结构决定了金融，因为年轻人不仅更热衷于探索和使用新技术，而且更愿意投资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太成熟的资产，比如加密货币、新兴市场与货币，以及 NFT 等虚拟项目。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比贵金属更安全的投资。6% 的美国人拥有或使用过虚拟货币，而在印度和尼日利亚，这一数字分别约为 10% 和 32%。此外，数字货币为通常得不到大银行服务的穷人和年轻人提供了通过电子现金进入银行系统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央行一直在推广包括在线小额贷款在内的数字金融。令人惊讶的是，迅速扩大电子货币使用的人群是菲律宾的女性。目前她们在网上和电话交易方面于亚洲遥遥领先。随着拥有年轻人口的新兴经济体的扩大，电子金融的使用也将扩大。

推动另一种货币体系发展的第四个因素是绿色投资。我将在绿色投资会议上对可再生能源的绿色投资和融资问题进行更全面的讨论。

最后一个主导因素是供应链的增强。疫情对工业和

物流运输的干扰使全球主要行业，如汽车、家电、农业和建筑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地缘政治冲突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因此，买方、供应商和货运方都希望能够找到更加稳定、可靠、不受干扰的供应链。这意味着大家希望拥有替代性的金融渠道，以确保整个供应链中的所有交易都能顺利完成，包括与买方、卖方、融资方、交通运输方、物流方的交易。考虑到生产和建造各种各样的商品、设备、设施和基础设施需要跨境的全球生产和物流网络，金融界必须设计出新的货币机制，以便在战争、制裁、疫情和其他破坏性力量的情况下为企业提供资金。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供应链支付也会带来挑战。据 pymnts.com 网站援引 Visa 领导的 B2B 论坛报道，一个 B2B 支付论坛估计，每天有超过 3.1 万亿美元的应收账款缺口，因为“供应商在制定支付条款时仍然没有太多的影响力，甚至不能让买家用供应商喜欢的支付方式按时付款”。发票核对和缺乏供应商门户网站是两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支付问题。到了国外，支付问题会因为跨境控制和协议、反洗钱法规、技术不兼容、其他故障以及欺诈而变得更加复杂。以上所述还是在西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香港事态而对中国实施制裁之前。显然，在纠正供应链中断的全球斗争中，替代的货币金融机制必将越来越多地发挥关键作用。

11 月 22 日的 InternationalBanker.com 引用了“2022 年的三大重要支付趋势”。第一种是“数字钱包的正常化”，如美国的苹果支付和亚洲的支付宝，预计 2023 年将有 44 亿消费者使用数字钱包——超过了地球上 78 亿人口的一半，并且将覆盖所有交易的一半以上。第二种是“先买后付市场的持续成熟”，数字金融将促使越来越多无银行账户的低收入人群和青年人进入银行系统，正如在菲律宾所见到的那样。第三种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全球接受度和发展程度不断提高”，这为公民提供了一种由中央银行资产支持的无风险法定数字货币形式，也是数字支付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进步。

数字支付、可替代的全球货币、虚拟资产——欢迎大家来到这样一个新兴的、崛起的新金融世界！在这里，货币将拥有全新的意义。

数字货币需解决公众信任与监管的问题

■ 理查德·伯纳 /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波动研究所主任

理查德·伯纳

数字货币的发展，包括央行数字货币（CBDC）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加高效、更加具有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创新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并且得到监管允许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能真正有效推动金融发展。

很多新技术应用在金融行业已经有几十年了，高科技的确能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并给用户带来方便体验。人们对于传统金融的效率和缺乏创新感到失望，特别是支付体系已经滞后于技术发展的潜力。数字货币能充分利用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来解决问题，更好地管理操作风险，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透明度和可及性。

现在出现了去中心化的金融（以比特币和以太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产物），简称 DeFi。批评者认为 DeFi 的承诺并没有实现，而且对传统金融构成了挑战。因为 DeFi 会存在于监管的框架之外，并且不具备货币的特征。很多用户并不信任数字货币，特别是比特币，认为它是靠一些算法或者资金根据配比来解决问题。而且用户也质疑 DeFi 背后的资产是否稳定，认为在缺乏透明性的时候，这些虚拟货币的资产会出现一些非法行为。如果我们依赖技术替代那些受到监管的中介机构，有好的一面，也有一些漏洞。

我们所讲的加密货币和数字货币，现在其规模不够大、互联互通性也不够强，还不足以影响金融的稳定性，而且最近其价格在降低，但是将来数字货币是否会重新掀起波澜，值得我们关注。其实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解决这些缺陷，CBDC 是公共货币，它把对官方货币的信任与新技术有效结合在一起。

有效的央行数字货币应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不会影响货币或者金融稳定性；第二，必须和其他现行的货币共存，而且相互补充；第三，能促进创新和效率的提高。要同时符合这些原则确实很不容易，归根到底人们信赖这些私人数字货币，是因为它们能够很方便地被兑换为公共货币。中国积极开发 CBDC，就是要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货币资产，助力中国提升在全球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导力，较小受美元的影响。因而那些支持美国建立 CBDC 的人认为，必须建立一个 CBDC 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金融影响力。

现在加密货币进入了寒冬，因为部分加密货币的公司以及交易所出现了不当的行为甚至是诈骗行为，一些人认为应该加强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和立法；另一些人却认为不必对其监管或立法，应让它自生自灭，坏的监管还不如没有。我认为，应该适当加强对于数字资产的监管，因为通过监管可以保护消费者、投资者，稳定公平有效市场，避免金融犯罪的出现。

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金融要有监管，其原则主要包括如下几点：负责任的创新、同样的风险同样的监管、结果独立于技术的目标。监管很有必要，但只有监管是不够的，其实我们缺乏对于加密货币以及数字资产发行人、交易所的治理，而且其相互之间的信任也非常重要。

金融服务行业需要合适的监管和行为准则以及文化，应把这些内容融入我们的最佳实践和行为准则里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监管，但是可以推进以上这些目标的实现。

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健康发展需要负责任的创新，从而使之能够满足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要求。我个人觉得，数字货币要成功推广和发展，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上文所提到一些监管原则，进而使数字货币获得用户的信任。

人工智能规模化发展将降低传统行业生产成本，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

■ 徐立 / 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

徐立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现在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到底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什么样新的活力和变化?

首先，每过几十年，世界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这些周期往往都由新的技术带动新的资源分配方式，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有意思的是，我们过去所处的那么多的时代，大部分都是以科技来命名的，例如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技术时代，包括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这中间往往是新的生产力让整个经济有一个非连续式的变化。变化不是储蓄和劳动力增强，而是一种新的自然配置的方式以及新的技术带来的创新。

根据埃森哲的报告，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在汽车、物流、工业、能源以及医疗等垂直领域产业中的价值。我们也看到在这些产业中，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可能每年带来 6000 亿美金的经济价值，以这样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将有更多的垂直领域进入到人工智能建设当中。

经过商汤科技自己八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有三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 2014 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人工智能要进入行业使用，首先要跨过工业红线，我们把它称之为单点突破。就是能否突破工业使用的标准——垂直领域的图灵测试，也就是它的水平能够让人无法分辨它是机器做的还是人做的。

但单点突破往往在进行产业数字化推广的时候遇到难题，最大的难题是单点突破解决不了客户端的价值闭环问题。现实的问题是整体上提升效率非常难。比如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有诸多的长尾应用场景，这些在行业当中被应用的长尾场景，往往要一个一个地联系起来，一起解决之后，最后才能形成价值的闭环，实际上瓶颈还是在真正意义上用人的那个部分。

所以以往单点突破了，但是价值闭环的形成还取决于如何解决长尾的问题。那些长尾的问题通常是一些细分、细小的问题，其实解决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比较难形成价值闭环，因此需要人工智能带来新的生产管线。在很多的垂直领域，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越过解决长尾问题，形成价值闭环的点。

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的全面数字化，要去做推广，要从顶天立地走向铺天盖地使用。这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它的成本是否足够低到完成整个行业的覆盖度。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工业的生产线，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相对完整地解决某些生产线上的价值闭环问题，但是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和部署成本相对偏高，在一个高成本的约束下，投入产出比也很难降下来。

第三阶段，涉及到怎么样把人工智能模块化、标准化且降低成本，高质量、大规模地提供人工智能技术。这才是真正地从我们讲的小作坊式的、单点突破的生产走到大规模的量产，这也是工业革命开始后所有技术推广的核心标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也带来很多标准化的模块，包括数据标注、模型的生产，也包括一些很庞大的基础设施使得成本能够规模化的下降。

今天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标准化的流程分类。就像木工要做到伐、锯、刨、雕，一系列的工艺完全是标准的流程。人工智能包括基础的算力设施、中期的数据标注、预训练的大模型、行业微调的模型，我们听到的这几个部分其实几乎是每一家数字化人工智能企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并且以标准化的 AI 模型的生产来完成。正是基于此，产业的精细化分工、产业的规模化制造，统一的降本增效才能够完成，使得人工智能开发有一个真正的工具链式发展的逻辑。

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超级工厂在进行这样的产能爬坡。在 2020 年的时候，生产人工智能的模型也就只有一万多个左右，但是经过两年的时间，它的迭代已经到了五万多个。这些模型看似属于完全不同的垂直领域行业，如城市、商业、生活、汽车，但它们模型的流程标准化，背后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使得模型能够复用，研发的效率整体上升。我们看这几年的效率提升，累积起来带来的成本下降可能是几个数量级别的成本下降。

结合简单的例子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制造行业里面赋能了一些龙头的锂电企业，覆盖一些场景和大型的产业基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建设起 80 条产线。首先在垂直方向上，必须在单点突破。比如说缺陷检测等一系列的单点上，都必须得突破超越人的肉眼可辨识的能力。其次，它不光是解决头部的高频缺陷，其实对于低频、小数据甚至是全量的长尾问题，也都会形成一个长尾的解决方案。之后它的部署要达到一个成本优化的过程，使得整个生产线的数字化变得更加现实。我们在未来会出现大量的这种新型的工业产业，因为它们的发展超出了传统工业发展的节奏，这些新兴工业在未来全面数字化的发展步伐会优于现有的工业制造。

讲到智能汽车和运输，其实和很多产业比起来，它还处于我们讲的第二个阶段，还在完善解决价值闭环的问题。它在单点突破上，比如车内的感知上已经做到比人的效果要好。但是真正的无人驾驶还要解决非常多的长尾问题。目前大部分自动驾驶还是以人为主，人工智能做辅助，但我相信它可以从单点突破走向完整的价值链构建。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智能启动的数字经济可能让我们会比较快地看到未来发生很大的变革。一个产业的价值在于整体的市场容量 × 市场渗透率 × 市场占有率。

市场容量，就要做大做优做强整个数字经济。从整体的大趋势上看，虽然目前面临着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但是危机育先机，变局开新局，总有一些新兴的投入方向使得整体的市场容量会变得更大。

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能够通过解决长尾问题实现行业的价值闭环，因此一旦商业的价值闭环能够完成，市场的渗透率就能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才做了第一步的数据化，但是从数据化到智能化，关键还在于整个价值闭环的打通，因此渗透率还会进一步的增强。

对单个企业来说，因为有了标准化、模块化，生产成本能够进一步降低，所以单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会逐步提升，头部企业也会享受价格、生产要素、成本降低的红利。当这三个要素相乘的时候，对整个数字经济来说，智能时代可能就为期不远。

在整个数字经济的建设当中，人工智能会起到核心的作用，我们要一起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规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云计算需软硬件协同 方能发挥算力优势

■ 任妍 / 阿里云研究院高级战略总监

任妍

怎么样从云计算的角度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次的技术革命。从经济周期以及工业革命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来，每一次革命都分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主要是技术的涌现和创新场景的应用，技术的价值逐步得到提升，有点像单点突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配套的技术，它的产业环境逐步就绪了，在过程中逐渐开始量产，成本下降，进入到下半场。在下半场，主流技术可以与更多、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传统领域相结合，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

云计算像计算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了电场模式，后来又经过了网格计算、并行计算，然后在 2006 年正式推出了云计算概念，中国是在 2009 年进入云计算领域的。之后，又经过多年发展，云的产业链逐渐展开。无论是上游的数据中心、核心的设备、部件生产研发环节，中游各种 PaaS、SaaS 服务以及丰富的配套服务，还是下游的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领域，云计算都在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核心部分的研发过程，以往是硬件为核心、软件来适配。现在随着云计算的大规模使用，逐步变成了软件来定义，软硬件协同的模式。只有通过充分的软硬件协同，算力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并且可以逐渐控制成本，有利于云技术的普惠推广，为更多领域提供服务。

在上云的过程中，有上云前的咨询，有上云过程中的牵引等服务，还有上云后的一些长期运营、调优等各种各样的服务，其实有很多新增的市场服务门类。云计算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以生物制药的基因测序为例，像单细胞的基因文件有可能要达到 100GB 以上，这么大的计算量，在常规模式和算力下要跑好几天。如果基于云的超计算支撑，可以将几天的任务缩减到两个小时，把成本降低到原来的 65%，这个过程就使得基因测序的技术更加普惠。

比如智慧农业，很多金融机构在利用遥感技术甚至卫星云图察看农田的种植情况。而要把卫星云图的历史数据分析好，需要有云计算来支撑。再比如绿色发展领域，传统垃圾焚烧的几个过程很难协调，可能因为燃料的投放不太均匀，造成炉温不可控。而在基于云的智能化垃圾焚烧系统推进的过程中，垃圾焚烧的整体自动运行效率有显著提高，可以把热量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能够二次利用。阿里云支持的 30 个城市大概有 100 个垃圾焚烧炉，每年可以新增 3.2 亿度的绿电，这对中国的绿色发展有比较大的助力。

整体来看，一方面云计算给产业链上中下游提供了更多的支撑；另一方面，各个产业链也对云计算提出了更多需求，从而促进了云计算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其实，云计算不仅仅是传统的 Saas 或者 PaaS 平台，它更多地承载了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是一个融合协同的过程。主要在两个方向发挥作用，一个方向是网络上的协同，可以使更多链接进入，形成资源共享和更高效率的联通；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数据智能。

因此，基于国内和国外的云计算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无论是通过统计几千家云上客户的投入和营收的过程，还是用云的数据、采购云的数据来跟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做回归分析，都能看到云计算对于个体客户、区域经济和整体经济 GDP 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聚焦到金融领域，阿里云大概有七八年服务金融领域的经验，从众安保险和南京银行这些客户开始，见证了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全力全面拥抱云计算、数字技术的过程，我们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一些很显著的变化。比如从支持的业务类型来看，一开始主要是一些零售类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像互联网金融业务逐步从管理类、办公类，延展到核心类业务，无论是银行卡核心还是信贷的核心都有。

当我们支持金融机构完成了“大型机”下移，完成了它的核心数据库的国产化替代，我们备受鼓舞。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交付，更多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此外，在服务的深度上也能够看出来，一方面通过不断增强技术基础，让云计算更加高效、更加经济、更加安全；另一方面与金融客户共同来构建新型的架构体系，包括技术、业务和数据的架构，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架构的转型和业务的创新。

我们把这几年的经历进行总结归纳，发现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式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路径。有的银行是从提升客户体验的角度来上云的，比如在疫情期间，有的银行在 48 小时之内就上线了卖菜的小程序，金融服务跑出了互联网的速度。2022 年我们与金融机构一起探索音视频虚拟场景的互动，希望能通过借鉴小红书、抖音这些灵活的模式，让金融服务以更生动、更活跃的方式走进我们的客户，能让我们的低频交易链接变得更加高频一些。

还有一个典型的路径是数据的维度。对金融机构而言，每一家都存储了海量的数据，包括一些客户的行为数据，以及外面进来的政务数据。怎样把这些数据资产做沉淀，怎样逐层萃取并把它加工成数据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跟客户共同探索，努力打造一套管理体系、运营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同时通过数据中台的构建，更好地支持前台的创新。

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着怎样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我们在开放生态的构建方向上，也在大力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引进来，自己构建一个产业云，为医疗、教育或者是某个特定的产业服务。或者也可以把自己的金融服务输送出去，让它链接到更广泛的、由其他参与方构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上。

很多的应用场景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套分布式的架构支撑，也就是全景式的数字金融，帮助金融机构实现高质量增长，它的路径就是全场景、全链接、全数据和全架构。阿里云研究院希望能跟我们的管理部门、研究者、实践者来共同探索科技趋势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方式和方法。

金融科技

新时代货币政策应着力于韧性、可持续发展及效率 79
悉达多 · 蒂瓦里，IFF 副理事长、国际清算银行 (BIS) 亚太区前首席代表

美元主导地位或将动摇 储备货币多元化是未来趋势 81
张礼卿，IFF 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科技发展需完善退出机制 加强生态建设 83
魏晨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科技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关键支撑 85
孙洪，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总工程师

新时代货币政策应着力于韧性、可持续发展及效率

■ 悉达多·蒂瓦里 / IFF副理事长、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区前首席代表

悉达多·蒂瓦里

过去 20 年，我们的挑战不是高通胀，而是低通胀。我们看到央行和整个金融体系在反复尝试，也没有办法把通胀拉到合理的位置。2021 年，让所有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官方领域和国际清算银行提供了一些意见，学术界也对此做了很多的研究。我想结合我所研究的内容，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展望一下未来，看看未来我们到底怎么样往下走。

按照现在的发展形势，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我们要接受新的多边主义。什么是新的多边主义？在过去的 20 年，我们之所以能让整体的供应非常积极地响应整体的需求，主要有四大原因——全球化、地缘政治、人口组成和经济发展。稳定的地缘政治，才会产生自由的市场，自由市场会产生重要的贸易机制，进而会有更多的国家进入贸易机制。从国内来讲，自由市场能够减少监管，带来劳动力市场和法律的改进、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更发达的全球市场。另外，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分享的最佳实践，包括通胀目标的设定以及金融监管、货币政策框架，也给金融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过去 20 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建立了国际支付体系，更好的产品以及人员流动，让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多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者市场。国际化的专业知识，能够实现专业化生产，而金融的全球化有效地减少了金融方面的限制。这些做法使全球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成本有效降低。

因此，那个时代经济不断增长，而且通胀很低，主要源于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之间的关系相对宽松。

第二，公司定价能力和员工议价能力之间的博弈在减弱。

第三，针对通胀制定的约束款力度较小。

那时候我们面对的商业环境和现在也不一样。首先，那时候属于扩张式的经济发展，所以没有收紧经济政策。另外，面临经济衰退，央行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随着我们所讲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处于历史最低，财政政策的调整空间也比较大。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些优势。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生产效率提升受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创新速度放缓，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的脚步也放慢了。全球供应链的很多问题，之前因为通胀把成本的问题掩盖了。我们推动经济增长需要从源头做起，也就是说由债务驱动的金融市场的增长带来了金融危机，而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在主权债务以及私营债务方面表现得更加脆弱，它的资产价值越来越低，而政策制定者被迫要提供更多的刺激政策来让经济重回正轨。

近几年，地缘政治冲突和疫情蔓延影响了世界发展。过去 20 年里面的顺境，现在变成了逆风，需求方的政策比较难以把握。回顾过往，我们之所以反复地调整需求方，而鲜少考虑到供应方的需求。因为我们想当然觉得好像有一个稳定的供应，因为那时全球供应链一直非常顺畅，能够满足生产的需求，但是突发的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封控措施，导致供应链不能像以往那样满足生产的需求。

此外，过去通胀率能够保持低位的一些有利因素，现在也变成了不利因素。比如说通胀因为俄乌冲突而失控，并且导致对全球化的支持进一步减弱。原来的人口

红利因素也正在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消失，很多人退休导致适龄劳动力在减少；很多人没办法接受教育导致生产率下降。另外还需要有很多资金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我们再来看看美元的情况。如果货币政策没有办法在市场有效实施，国家就没有办法获得资金来支持发展。相对来讲，就会出现更多债务。而且因为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和强势地位，会导致新兴市场更加依赖于它，进而减少贸易、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公信力，它们服务的成本也会更高，所以我觉得强势美元肯定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然而，亚洲有些地方和过去是不一样的。第一，亚洲目前没有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且即使有赤字，其水平也和过去不一样；第二，因为财政政策空间的限制，所以财政扩张政策在亚洲的执行空间相比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大；第三，亚洲金库的储备量比以前明显增大。此外，虽然亚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出现贬值，但贬值的幅度不会特别大，而且现在的货币政策也能够让银行有更多的资本金储备。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从 20 年前关注于效率，到现在关注韧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效率。而想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韧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效率的组合发展，亟需国际领导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美元主导地位或将动摇 储备货币多元化是未来趋势

■ 张礼卿 / IFF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礼卿

美元作为一种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在过去 10 年中，它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当中，美元现在的占比大概不到 60%，相较于 10 年前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 70% 的占比，已经大幅度下降。展望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美元的地位会继续下降，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继续下降的幅度还有多大。

对美国来说，第一个好消息是接下来的几年，美国仍将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到哪一年，中国经济的体量能够超越美国，有人说是 10 年，也有人说 10 年还不够。我没有答案，但是中国经济的排名在未来肯定会发生变化。第二个好消息是美国金融市场会继续保持全球流动性最高、开放度最高的状态。美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会继续发展完善，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会继续居于世界最成熟的监管体制之列。

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当中，仍然具有主导作用和影响力，当然这样的影响力是在逐步下降的。

对美国来说，第一个坏消息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占比会逐步上升。第二个坏消息是，因为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采取的激进量化宽松政策导致高通胀，为了让通胀率达到 2% 的目标，美联储连续大幅度加息，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有可能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历史新高。经常项目赤字加上财政赤字形成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会导致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走弱。最终，这些措施会损害美元在世界的公信力。第三个坏消息是，虽然现在还不确定地缘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美元的地位、美元的公信力，但是如果美国继续把美元武器化，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受到其他货币的竞争和挑战。这里讲的其他货币不仅指欧元和人民币，也有其他一些非传统的储备货币，比如特别提款权 SDR。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地缘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美元的地位、美元的公信力，但是如果美国继续把美元武器化，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受到其他货币的竞争和挑战。这里讲的其他货币不仅指欧元和人民币，也有其他一些非传统的储备货币，比如特别提款权 SDR。

毫无疑问，对于其他货币来说，欧元和人民币将会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竞争者。未来欧元和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的占比会进一步上升，对于欧盟和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根本意义上为货币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包括保持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和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要让它们各自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机制和环境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对于欧盟来说，必须改革其劳动力市场，使之变得更加灵活，而且欧盟各国之间在财政政策和银行业的监管规则方面需要更加趋同和协调。对于中国而言，则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加快金融开放，积极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除了欧元和人民币之外，一些其他非传统的储备货币也在陆续加入国际储备货币的大家庭，比如澳元、加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韩元等。根据最新的研究，在 2010 年到 2020 年之间，一方面，在国际储备货币的组合当中，美元从原来的 70% 下降到现在的 60%，占比下降了 10%；另一方面，非传统的储备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当中的占比增长到了 7.5%。这一此消彼长的变化反映了各国央行在储备货币方面进行多元化分散的趋势，从而降低单一币种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样的趋势将会继续深化。

最后一点，我认为美元也会面临来自特别提款权（SDR）的竞争，SDR 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当中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 SDR 并不是一种主权货币，但是在 2021 年 SDR 大幅度的调整之后，其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占比已经到了 8%，因此 SDR 在未来国际储备货币组合中的占比很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金融科技发展需完善退出机制 加强生态建设

■ 魏晨阳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魏晨阳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曾讲到两个观点。一是他长期看好全球数字化。一方面因为产业本身走到了发展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刚刚经历的全球疫情对其发展进程起到了极大加速作用，带来了很多改进和创新机遇，而且这些改变已不可逆转。二是他多次提到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应用很多已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在金融领域做出的一些先进、前沿的突破，有力印证了斯宾塞教授的观点。

创新离不开资金和投融资，在创新的主体方面，中国有大型的金融机构也有大量的初创公司，因此我从三个角度讲一点我们的思考。

一、重视金融推进创新的“退出”机制

从投融资角度能比较深刻地感受到金融行业发展的势头，可以看到全球金融科技赛道投融资的整体趋势。按照不同的投资机构对应的不同投资周期来看，斯宾塞的报告给出非常好的解读。一些中后期投资主体，比如说大公司的风投，像 PE 资本机构， 2022 年明显下降，但是天使投资或者早期的 VC 投资实际上和 2021 年还是可比的。这说明什么？一方面是 2022 年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加上升息的预期、股市估值过高，所以在上市的后期环节，投资者变得越来越谨慎。但是另一方面，在早期阶段投资没有减少，其活跃度也没有减少，这对于科技创新来说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这个现象从资本的维度来说，金融科技即金融业的数字化还是呈现一个非常正向和积极的趋势。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在于投资者的退出机制。为什么和二级市场接近的这些投资机构变得如此谨慎？实际上 IPO 这种公开市场上市的机制，在 2022 年有显著减少。同时非上市公司的另外一种退出机制，即被大的公司兼并或卖掉，这种方式也降低了，但是从比例来看，它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凸显。历史上，并购对于金融科技、创业企业来说，一直是全球资本最主要的退出机制。当前，上市的机制变得越发保守、缩减的时候，其实非上市机制的重要性在上升。

中国科创公司大多主要目的是上市，但纵观全球市场，非上市机制对金融科技、科创公司来说，反而是更重要的能够让资本退出的机制。这也说明中国积极探索金融助力创新、助力实体经济的优势。我们可以从监管、政策的角度思考怎么样鼓励这种非上市机制，以提升它的重要性。

二、重视创新与应用场景落地

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它的实体机构载体无外乎是大型机构和初创公司。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都呈现比较相似的特点，我把它总结为“自上而下、内外兼顾”。

首先，通过分析现在的各个金融板块，可以看出市场已经把金融科技分成七个主要赛道，从支付到银行是比较传统的，现在每年支付的投融资还是投资量最大的。数字信贷是一个新兴领域，基于现在对于信贷更敏捷、准确、定制化的触达。加上财富科技、保险科技，以及资本市场科技、中小企业金融科技共七个赛道。这些赛道在 2022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缓，但是在初创阶段，各个赛道还是非常活跃的。

从大型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是自上而下内外兼顾的，因为它涉及每一个环节。一个大型的保险公司从最早的设计到最终的理赔是全流程的覆盖。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顶层战略要放在公司的首要位置。中国所有大型保

险公司，包括平安、国寿、人寿在内，都在数字化维度上设置了首席数字官、首席信息官，有专门的数字化委员会。我曾在美国工作过四年多，这种架构和全球大的保险公司是一致的，只不过海外的保险公司稍微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则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公司在战略层面重视的基础上，要投入大量的资源，通过内部化 IT 的架构或者是内部的研发、自有云平台的建设，包括在数据能力、计算能力方面、AI 技术的使用方面等，在这一系列领域进行资金投入。与此同时，还设立科技子公司打造数字化生态圈，赋能全链条业务环节。这个特点是全球比较统一的趋势。

科技公司要非常重视创新与应用场景落地的结合。还是以保险科技为例，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强的科技赋能空间。在板块具体环节的覆盖上，能够看到从产品的分销到服务、流程的优化，再到数据分析等各个环节，实际上保险科技公司、科创公司都认为自己有很强的赋能潜力。在此基础上，不管是保险还是其他金融领域的哪一个环节，底层的核心技术考量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库以及区块链的重要性，也是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积极探索的。

很多的科技公司都在运用一种或者多种技术体现自身在技术赋能方面的优势，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业务场景端。但在实际业务场景下真正能够实现赋能这件事上，其技术力量往往是使不上的。需要把这些技术应用到现有的业务环节里，真正能够去赋能、去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场景，要能产生价值。所以科创公司应该从政策、从国家整个的生态建设上更多地支持和推动科技创新和业务场景的落地。

三、小结

一是从金融、投融资的角度来看退出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不管是通过上市还是并购的退出。其实它要求企业和投资人要有一种以终为始的思想，以最终的退出为终点反过来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路径，使它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过程。特别是对企业的战略投资，大型的企业内部战略投资部门，怎么样把外部的创新和整个企业内部的业务增长做到一个好的适配，这是企业战略投资要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是大型机构与科创公司的协同，特别要注重能够为技术找到落地的场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生态的建设，这个生态建设里面涉及政府、交易所等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包括退出机制，机构投资者孵化加速的机制，还有科研机构与智库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态建设，能够推动创新更接近业务的实际落地场景。

科技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关键支撑

■ 孙洪 /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总工程师

孙洪

科技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关键支撑。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中国 21 世纪议程》，到 2000 年联合国制定千年发展目标（MDGs），再到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同阶段都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而且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科技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策提供相应的支撑。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面非常广，《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涉及 17 个项目，169 个具体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在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实施方面提出具体的做法，既要体现它的系统性、协调性，同时还要体现可操作性，所以有很多方面需要进行研究。

在不同的阶段，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也不同。1994 年，中国制定了国际上第一个国家级的 21 世纪议程，当时的标准称谓是《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可见当时的重点是放在人口、环境和发展上。现在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效的社会治理，所有这些方面都离不开战略软科学的研究，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科技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关键的支撑。这些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如在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粮食安全方面，主要需要农业技术来解决品种、养殖、加工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这几年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环境、健康、社会治理、公共安全、减灾防灾和产业等领域的发展。目前有 100 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个国家采用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但都需要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碳汇等方面开展研究，进行颠覆性技术的开发。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在低碳、零碳、负碳，在源头的替代、过程的消减、末端的普及，以及在零碳便利、零碳分解能源、燃料替代、温室气体的消减、CCUS 碳汇与负碳方面加大技术的研发，通过技术研发解决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三，科技创新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方案和发展的模式。有了技术突破以后，还需要通过一些政策、金融等多方面的措施来共同治理，才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特别是通过试验、示范来验证技术可行性、政策和措施的可操作性。

在这方面，早在 1986 年，中国就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开展了科技引导社会发展的综合试点工作。到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 170 多个以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 多个国家农业高技术园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20 多个促进新兴产业、创新产业、知识产业保护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还有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国家低碳试点省、试点城市等。

为了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开展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工作。经过国务院的批准，目前已经有 11 个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

示范区，包括深圳、太原、桂林、郴州、临沧、承德、徐州、湖州、鄂尔多斯、枣庄、海南藏族自治州等。这些创新示范区就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所预见到的不同瓶颈问题，在技术、政策、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创新，积极探索技术的路线和系统的解决方案，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

科技应该在以上三个方面，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相应的支撑。当前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各项目标的实现步伐也在放缓。我就目前的情况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持续加大科技的投入，构建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技术体系。特别是在当前针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构建碳中和的技术体系。第二，加大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产业化。第三，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金融安全

防范债务危机是当务之急 *88*
韩升洙，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新开发银行：新背景、新使命 *90*
周强武，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中国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工作 *91*
周汉民，IFF 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的步伐 *93*
周延礼，IFF 成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流动性不平衡加剧债务危机 债务减免多边协调框架进展迟缓 *95*
吉耶尔莫 · 奥特兹，IFF 理事，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国际清算银行 (BIS) 前总裁

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97*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在偿债安排或债务重组中的做法与作用 *99*
朱隽，丝路基金董事长

构建国家金融安全指数 防范金融安全风险 *101*
周道许，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防范债务危机是当务之急

■ 韩升洙 / IFF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

2021 年和 2022 年，通胀的飙升令人吃惊，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大部分 G20 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已经超出了各自央行的目标。随着这些经济体在疫情之后重新实现开放，供应链瓶颈、运费上涨，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被抑制都推升了通胀。随着需求反弹和食品价格上涨，能源价格飙升。俄乌冲突只是强化了上述趋势。

上述压力在 2023-2024 年有望降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通货膨胀率可能从 2021 的 4.7% 上升至 2022 年的 8.8%，但 2023 年将降至 6.5%，2024 年将降至 4.1%。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外债目前处于创纪录的水平。其中大部分是私有债权人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涉及可能突然飙升的可变利率。随着全球融资状况好转和货币贬值，以前仅限于低收入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蔓延。此外，本币债券市场的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反映出对宏观经济前景和债务水平上升的担忧。

在企业债务方面，自 2022 年 4 月至今，各部门的信贷利差已大幅扩大。由于成本上涨，大公司的利润率已经收缩。就小型企业而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小企业破产正在增加，因为借贷成本上升和财政支持下降对这些企业的打击更大，而依赖杠杆融资市场的企业则面临更严格的贷款条件和标准。

紧缩的货币政策、飙升的借贷成本和更严格的贷款标准可能会损害房地产市场。最坏的情况是，在住房购买力下降和经济前景恶化的情况下，实际房价可能会大幅下降。特别是，住房市场仍然是宏观金融风险的潜在来源；当局应该通过严格的压力测试来评估房价调整的系统性影响。

在中国，由于房屋销售急剧下降，加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压力，引发了对更广泛偿付能力风险的担忧和房地产行业低迷的加剧。房地产开发商的破产还可能波及银行业，影响脆弱的小型银行和国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因为它们的资本缓冲较低，与房地产相关的集中风险较高。

在当前形势下，毫无疑问决策者现在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兴市场综合政策框架提出了一个经过仔细调整的工具组合，包括利率政策、宏观审慎行动、外汇干预和资本流动措施。同样，考虑到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更高利率生效以及其他国家限制性政策的潜在溢出效应，国内政策措施也需要谨慎校准。

主权债务人应加强以下措施，包括通过与债权人的早期协调、多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遏制高债务脆弱性风险。对于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的国家，双边和私营部门债权人应设法协调先发制人的重组，以避免代价高昂的硬违约和市场准入的长期丧失。

如何防止发展中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主权债务人应加强以下措施，包括通过与债权人的早期协调、多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遏制高债务脆弱性风险。对于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的国家，双边和私营部门债权人应设法协调先发制人的重组，以避免代价高昂的硬违约和市场准入的长期丧失。

只要能够适用 G20 的共同框架，那么就应该根据符合条件债务国的要求，逐案考虑债务处理。颁布可信的中期财政整合计划也有助于控制借贷和再融资成本，缓解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此外，全球协调的债务减免措施，包括 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对于帮助债务可持续性急剧恶化的国家至关重要。此外，债务减免需要迅速、全面和大规模实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增长前景的风险。

最后一点同样重要，我们需要加强国内资源调动能力和政策能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加上促进区域和全球合作，以及经济体系中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共同努力，必将能够应对债务危机风险。

新开发银行：新背景、新使命

■ 周强武 /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周强武

新开发银行，实际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它的名字里面有“新”这个字眼的国际金融机构。新开发银行在一个新的全球背景里全新创立，用新的使命来敦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在这个新的机构里面，我们的运作面对着一个新的全球背景。

面对硬通货币，我们的融资成本肯定会越来越高，在中期和短期肯定会对资金获取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现在货币政策紧缩，主要发达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并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波动和溢出效应。全球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动荡的地缘政治秩序让融资面对更多复杂情况。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不理想，中国的国家财政空间被压缩，所以新开发银行需要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保障包容性的增长。

新开发银行和同行一样，须勇于直面挑战，并积极需求新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想强调新开发银行与同行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能够调动足够的、成本也相对比较合理的金融资源。因为现在的时代里，传统的价格比较低廉的融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新开发银行希望能够利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因为现在欧元和美元的利率增长，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更为稳定，并且这时候在融资方面可以实现零融资成本。如果能够很好地管理，新开发银行可以使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行有效分配，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硬通货币在外汇利率的敞口以及在汇率方面的一些弊端。

更好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就可以有效利用其大量存款，比如说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债务方面的问题。新开发银行自创始以来非常关注本币的使用，并积极探索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利用自身发展优势，到 2022 年，已有南非货币和中国人民币设立相关定价项目。此外，新开发银行整个借款里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币定价，以人民币为例，我们有一个 330 亿人民币的证券产品在中国人民银行间市场提供。2022 年，我们项目里有超过五分之一是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定价。新开发银行 2022-2026 年整体发展战略的目标是 30% 的借贷使用本币定价。此外，我们也会不断在新兴市场国家利用其本币实现融资，而且在不同解决方案里将我们的资金借给使用不同基准利率的同行以及其他资金需求方。

中国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工作

■ 周汉民 / IFF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中国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2013-2021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到 38.6%，超过美国 20% 以上，甚至超过七国集团（G7）在这 9 年当中对全球经济贡献率的总合。

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和法令，总是把美国放在最优先地位，但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政策的影响不可能仅限于其本土范围，肯定会对全球带来影响。所以美国在政策制定方面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考虑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和合作。

现在有三个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第一，很多国家的本币在贬值，而且贬值的幅度相当大。第二，一些国家资本外流，特别是热钱外流，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进一步承压。第三，日益攀升的全球通胀。

2022 年 1-9 月份，中国的平均通胀率是 2%。中国低通胀率的原因是：第一，得益于 2022 年农业丰收，特别是猪肉价格的稳定。第二，得益于能源价格的稳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价格），以及绿色能源发展。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发展潜力，但是 2022 年的消费增长并不理想，2022 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增长率只有 0.9%。所以中国 2022 年的 GDP 增长率也只能够勉强达到 3%，和 2021 年同期 8.3% 相比，确实很小。确保供应链跟得上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

首先，我们希望不同的经济驱动力量能充分发挥作用。长三角、珠三角和中国北部的很多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能够保证供应链不被切断，做得很不错。以国际贸易为例，2022 年 1-9 月，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 22%。中国贸易出口行业对于就业领域以及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进一步开放，尽可能开展更多的国际贸易。例如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以及与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的贸易发展，从增长来讲，RCEP 起到了引领中国国际贸易发展步伐的作用，因为中国目前 36% 的国际贸易都是与 RCEP 国家开展的。

中国要起到稳定世界经济、解决全球通胀问题的主力军作用，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件事。第一，要提高经济增长率。3% 的经济增长率，绝不是中国理想的增长速度。第二，要稳定就业率。这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要让年轻人，特别是应届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第三，要稳定货币政策。首先市场的利率要降下来；其次货币政策要支持农业、中小微企业发展，要有效地促进整体经济发展；最后要加大对天然气、石油、矿业以及可再生绿色能源领域的投资。

中国积极促进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发展。目前，中国绿色能源投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以 2021 年为例，绿色贷款余额 15.9 万亿人民币，其中基础设施占比 46%，12% 用于帮助企业生产绿色相关产品。一方面，通过绿色贷款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发行了多只绿色债券，目前已达到 4000 多亿的规模，2022 年上半年绿色债券的发行额已经接近 140 亿美元。

保险行业无论是从企业层面，还是从整个市场层面都对绿色经济给予了大力支持。所有这些努力都可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经过中国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可供其他国家参考。

中国在大规模快速进行绿色转型，目标是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定得还是很高的。因为现阶段

中国的碳排放还处于世界最高行列，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幅度减排，有赖于三个因素：第一，高科技的发展；第二，人们脱碳化的意愿；第三，国际合作。前两点中国靠自身努力可以做到，第三点中国单靠自己不可能完成。从 2018 年开始，上海每年都召开进博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眼见为实，通过亲身参加进博会，我至少看到有 4 个行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首先是汽车行业，现在进博会上展示的汽车产品基本上都是清洁能源、新能源；第二是建筑材料市场；第三是日常用品清洁化变得越来越普及；第四是清洁能源开发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迫切希望在这些领域展开国际合作，进一步开发绿色技术。国际合作并不是只有利于中国或某一些国家，绿色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的步伐

■ 周延礼 / IFF成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周延礼

养老保险和金融密切相关。近期，银保监会、证监会先后发布了很多关于支持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归集庞大的金融资金，发展理财业务，做好商业保险，做好金融服务，都非常有价值。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指出， 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其中 65 岁以上的人口 2.01 亿，占 14%。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 岁以上人口超过 10%、65 岁以上人口超过 7% 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当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现象，但我们要高度关注它和经济的关系。有很多人预测，到 2035 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突破 20%；2050 年，中国老龄人口预计将达到 4.87 亿，约占总人口的 35%。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金融业来讲，也将面临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条件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到 2026 年左右，人均 GDP 将达到 2 万美元左右，2030 年人均 GDP 将达到 2.5 万美元左右。这样的经济规模、这个发展阶段正是金融业、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期。预计完善养老第三支柱之后，可能会形成数十万亿的金融规模，老百姓购买保险、购买理财产品的风口期已经到来了。中国陆续出台了经济、金融、财税政策，支持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企业、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基本养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了社会的基础。

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角度来看，2013 年，中国就开始做这方面的顶层设计研究。2019 年专门制定了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的制度总体方案，在中发 <2019>35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努力构建以基本养老为基础，以企业和职业年金为补充，以个人基本养老、储蓄性养老、商业养老相衔接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国从制度入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商业保险不仅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聚焦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目标。做好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养老保险，不断丰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需求。

第二，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的步伐。

2022 年 4 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措施，也是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指导方针，目前可能影响《意见》落实和实施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期待税收优惠政策更加精准。因为全国对于养老税收和优惠政策较为关注，这是购买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考量。主要的需求是免税或低税率，以及简便抵扣的流程。2. 要提高养老金融产品的适应性，应兼备养老保障性功能和长期保值、增值功能，要研究如何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把庞大的家庭储蓄

合理地引导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里面来，这是决定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3. 期待政府部门能够协调。因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政策制定和监督实施涉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税务、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的职责较多，在宏观政策把握和具体政策制定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税收优惠、信息平台、监管职责等方面要确保《意见》能够落实好。4. 期待政府部门监管的有效性。要区别于普通的金融产品、养老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个人养老金产品，绿色机构等方面也都要统筹考虑，要守护好用户的每一分钱，这是养老钱、保命钱。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百姓购买养老金的一个期待。

根据上述情况，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多措并举推动中国养老第三支柱规范发展。未来，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应该形成多元化主体参与、多类型金融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全面发展的格局。

1. 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在个人养老金试点过程当中要探索纳税安排，令不同的收入群体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比如说在证券投资收益免税的条件下领取，阶段性征税的模式。

2. 适当的时候，政府每年在财政安排时，对一些弱势群体，尤其是灵活就业、新业态人员，比如说骑手、快递小哥等，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以减少他们的缴费压力，可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养老保险当中来。另外，财政、税务部门对于参与的金融机构要制定专门的个人养老金会计标准，包括增值税的政策，对于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交易环节，应该适当地给予税收优惠。

第二，提供适当的金融产品。1. 提高产品收益率。2. 提高养老产品的适配性，要名副其实地针对不同客户，具备不同风险特征，真正把投资者保护工作和适当性的问题能够前置，嵌入产品设计的各个环节当中。3. 要设立默认资产配置的制度规则，针对养老金产品持有人的投资知识储备参差不齐的特点，在保证持有人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可以设立一些默认的资产配置规则，引导持有人科学地配置养老资产，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的相对平衡。

第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和引导作用。应该成立专门项目的工作领导小组，健全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把资金投资方向、投资范围、投资额度的上限限制政策，设置为差异化的鼓励政策，引导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投入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战略性产业，包括新基建、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投资收益的水平，保障投资收益的安全。

第四，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要各自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明确整体的监管信息平台管理，银行账户专用与产品管理等方面分工合作。要把充分保护个人养老金参加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重点关注养老产品的合法性、运行的规范性、披露的完整性和适度的流动性。要警示老人防范理财陷阱，使养老储蓄能够转化为增值保值的观念深入人心。

流动性不平衡加剧债务危机 债务减免多边协调框架进展迟缓

■ 吉耶尔莫·奥特兹 / IFF理事，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国际清算银行(BIS)前总裁

吉耶尔莫·奥特兹

目前国际金融以及货币体系波动性大、利率高，影响了新兴市场资金的流动，这与美国的加息周期相关，导致借贷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研究文献讲到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出现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明显地看到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和各经济体是如此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国家里的冲击都有可能很快扩散到整个系统的其他角落。

另外还有一些是结构性问题，比如监管方、中介以及金融机构等等，如果它们出现风险对经济体系而言则更加危险。例如在监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严重的、易被忽视的问题，这个危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政策方面的协调以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二十国集团议程中的议题。我们可以通过交流讨论促进协调合作，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协商，加强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

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倒逼、推动了全球在财政经济以及金融政策方面的合作。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改革议程对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合作机制以及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管都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曾经名为“金融稳定论坛”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有类似的议程，强调资本金的需求、减少风险等等，但是这些议程中有一些不了了之，只有一部分被落实。比如资本交易时，我们会考虑如果提供的资金有一些是海外资金，那么谁有权对该资金进行监管？这是签署协议时需要达成共识的，也要根据各国的管辖权做相应的调整。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做研究，实践证明更多地使用多边治理体系和多边架构进行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讲到流动性不平衡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工作指引里，央行相当于最后一道防线，是最后应急救援的。在危急关头需要央行援助，这不仅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美国一开始主要关注的是本国市场，针对全球对美元的强大需求，美联储采取了一些相应政策，但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像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这类金融机构就成为国际社会最后的借款方。因此央行尤其是美联储成为能干预国际社会的借贷者，甚至还可以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思考。

俄乌冲突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因此损失了接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经济刚有起色一下子又被打了下去，国家被政治及社会动荡不安所影响。现在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也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发展，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武装冲突加速了危机的发展，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危机。这些问题在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蔓延得非常快，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方法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疫情三年，全球抗击疫情协调合作不理想、抗疫资金也不足，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 6.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且这 6.5 亿美元资金支持也进展缓慢。实际情况是，这笔抗疫支持资金有超过一半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账户里，根本没有发放出去。此外，国际其他一些应对疫情的措施，包括暂缓偿债协议以及二十国

集团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它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小。

而且，在全球抗击疫情中，私有债权人的参与度非常低，并没有实现共同承担。而且因为缺乏私营部门的参与，很多债务人无法及时偿债，进而影响了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效果。

全球约有 144 个国家适用于 DSSI（G20 暂停偿债倡议），但只有 73 个国家提出申请，还不到一半。DSSI 主要涉及一些长期的债务，因为疫情加剧了偿债的难度。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乍得三个非洲国家申请减债，但是因为协调工作难度大，涉及不同政府部门、不同机构以及债权国各方，所以进展比较缓慢。

拉丁美洲也遭受了疫情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 20 个债务最高的国家里面有 8 个来自拉丁美洲，而且债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当然也有积极的信号，比如拉丁美洲国家普遍采取了逆周期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展望未来，拉美的前景确实不是太好。疫情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拉美财政可以斡旋的空间已比较小，而且疫情给教育、技能培养等领域带来了挑战。

加快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 刘世锦 /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我想谈一下关于扩大需求的一些问题，包括需求的一些新特点。

第一，最近中国国内一直在讨论怎么增加消费需求，提振国内消费。我认为应更多地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当然从一般的逻辑来讲，增加消费的基础是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尤其是现在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比较低，疫情三年，有些人生活比较困难，消费水平下降。所以要提振国内消费首先需要增加人们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中国已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对大多数人尤其是相当多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消费增长越来越多地与消费结构升级有关。从 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一些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领域有：教育、医疗、保险、金融、通讯等。而政府消费中增长比较快的，首先也是教育，其次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

现在的消费结构与过去有很大区别，过去主要是衣食住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现在拓展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新的组成部分开始涵盖金融等领域后，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和公共服务直接相关，比如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近 3 亿农民工进城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们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上文讲的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领域——教育、医疗、保险等，农民工群体实际上分享得不多，而他们对这部分的需求完全存在，只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滞后，限制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消费。

现在很多人讲的消费，仍是初级的和恩格尔系数直接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但是大多数人的消费现在已经覆盖了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消费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所以，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改革不到位，严重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第二，关于投资的增长。房地产投资从 2021 年 7 月份以后一直持续负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的减速，从长期历史过程来看是符合规律的。十年前，就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房地产投资需求的历史峰值已经出现。但是此后几年，房地产的发展还不错，甚至疫情开始的 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房地产依然表现出了很强的增长韧性，对那一段时间的稳增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房地产投资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主要是在都市圈、城市群，房价大都是在这些地方上涨。但是房地产的投资需求是有节律性的需求，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峰值已经出现了。因此房地产持续负增长，有政策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需求基本面，特别是都市圈、城市群的结构性需求在峰值出现后下降所导致。

当然，我赞成通过政策对房地产做相应调整，因为现在房地产行业下行过快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现在房地产如果以不变价同比来看，下跌达到了近 20%，这样肯定不正常，至少应保持在增长 5% ~ 6%。房地产行业目前的局面需要改观，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

基建也是现在比较看重的领域，但是基建在过去几年增速也在下降，而且这是符合规律的。2022 年以来，基建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从结构上看，增长比较快的是和环境保护、信息传输等相关的基建部分，这也反

映了现在基建的结构性变化。即便如此，最近拉动基建增速的主要还是一些政策性因素，而且这种增速恐怕不具有可持续性。

制造业投资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电气、机械制造、仪器仪表以及汽车制造等领域。总的来讲，技术含量较高领域的制造业投资增长比较快。

基建以外的服务业投资领域，最近几年增长较快，而且很稳定，尤其是最近两年，在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服务业投资基本稳定，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仔细分析一下它涵盖的内容，发现也是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

在中国投资排序里，过去比重最大的是制造业，其次是基建，再次是房地产，也就是所谓的“投资三驾马车”。但是经过这一两年的演变，顺序变了，第一位仍然是制造业，第二位是基建，第三位是除基建以外的服务业，房地产已经排到了第四位。这个趋势短期内已很难改变，所以今后谈投资问题，应意识到房地产已经排不到前三位了。

刚才讲了消费和投资方面的特点，下面需要厘清一下它们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关系。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领域如教育、医疗、保险等，实际上都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密切相关，即它们是消费但同时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我想强调一个观点，消费也是投资，而且是比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投资。过去包括地方政府一讲投资好像就是基建、房地产领域，下一步更多的应该是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投资结构看，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含量提高、数字化、绿色转型有关的投资增长较快，而服务业投资很大程度上也和人力资本直接相关。因此我们会看到两条线，一条线是我国整个产业在提升，在转型升级中，技术含量在提升，包括物质性的投资。另外一条线，包括消费、服务业投资，其实更多是人力资本的建设。这两条线的提升，无论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还是从服务业投资者的角度，都是高度相关的。

今后怎么样看待消费？我认为消费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都是现在消费和投资出现的新特点，在人均 GDP 过 1 万美元以后，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即房地产、基建这些物质性的、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的增长领域逐步退出。大家应更加重视技术含量比较高、与人力资本建设相关的投资，更加关注投资结构上的变化。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首先是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件事已经讲了很多年，不能再等了、不能再拖了，这关系到消费的增长、服务业投资的增长，与需求直接相关。另外，创新驱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等方面的改革也亟需加快。

中国在偿债安排或债务重组中的做法与作用

■ 朱隽 / 丝路基金董事长

朱隽

关于国际社会对于债务重组，特别是主权债务重组的担忧，我想讲以下几点：

一、关于“中国债务陷阱”说法的谬误

“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是 2017 年由印度的一位学者提出来的，说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过度借贷从而帮助中国获得战略性的优势。我个人反对这个 “债务陷阱”的说法，因为从 24 个借款国、债务国和中国的安排来看，中国很少通过债务重组去获取资产。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债权的增加，是因为相关国家需要更大的发展力度，而且从 2017 年以来，中国对非洲借贷的余额是在下降的通道当中。国际上包括像波士顿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的蒂文·盖勒可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海外发展融资能够真正帮助到接受国，而且融资额从现在到 2030 年是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中。而且，同样的分析表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CPTTP）能够帮助相关成员国到 2030 年之前提升 1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得到中国融资支持国家的 GDP，到 2030 年将增长 3% ~ 4%，而且这些国家有 3200 万人脱贫，增加世界贸易 6.2%。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支持推动全球收入增长 2.9%。这些都是中国对外援助和资金支持带来的结果。

二、中国金融机构在债务重组当中发挥的作用

有人说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没有参与到 G20 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和共同框架的安排之中。大部分外方人士认为这些银行是国有企业，他们获得了政府的优待，而且他们认为这些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应该被当做官方债权人来对待。但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基于市场机制的银行，是实现了竞争中立的。中国的开发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是提供发展融资的，中国的发展性融资实际上是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的，而且是以商业准则为基础的，没有任何政府的补贴。所以这两类机构不应该被视为官方债权人。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它实际上是在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的主要贷款方，而且它已经加入了 G20 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共同框架。我想随着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参加到债务中止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肯定会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三、中国的主权债务与优惠贷款

有些人批评中国提供主权债务的时候提供一些优惠贷款。现在中国提供的一些优惠主权贷款，一般都是官方认证的，还有一些出口贷款，是我们讲的绅士协定。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讲的绅士协定是自愿的行为，也就是发达国家自愿给中国提供资金，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属于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的借贷需求非常多样化，不只局限于纯商业贷款或优惠贷款，所以中国也希望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

四、中国关于偿债安排或债务重组的做法

中国在偿债安排或者债务重组方面，无论是多边还是单边，有没有一些新的做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巴黎俱乐部确实在保证一些国家偿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是对这些债务进行重组。但是中国考虑的是双边的做法，因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债权国，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最大的一个债权人，双边的债务谈判能让我们的机构具有更高的独立性，从而能设定债务重组的节奏。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意识到采用双边方式也

有一些劣势，比如债务人可能会不断讨价还价，希望有更好的处理待遇，而债权国没有办法去要求债务国采取合适的、必要的改革，从而改变它的国内经济。所以债务国未来出现风险的概率可能会很大。现在中国也在讨论可能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目前在 G20 框架之下，以及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作协调之下，中国选择将多边债权安排、债务安排和双边安排结合在一起，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债务重组方法，关键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都可以得到保护。如果说债务重组的条件和其他的相关方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的话，我们就会进行适时的财务重组。

五、三点额外补充

首先，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双边官方债权人的俱乐部，而且也可以邀请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加入其中。2016 年，中国任 G20 轮值主席国时，就开展了关于中国是否要加入巴黎俱乐部的讨论，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加入巴黎俱乐部。人们可能会担心作为最大的、新兴债权国，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是否会做出债务减免的决定。目前的债务减免幅度比较大，不应拿了中国的钱之后还想当然要求中国减免债务，理所当然受惠于中国的大方慷慨。

其次，关于 DSSI 和共同框架。中国其实比较关注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的早期参与，尤其是对于私营部门的参与而言。我们不希望私营部门像搭便车一样，直接享受公共部门之前所做工作的成果。除非私营部门按照可比性条件参加谈判、参加磋商，中国肯定会对于这个流程表示极大的关切。

第三，关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包括巴黎俱乐部、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协调、协作。其实 IMF 主要是协调私营部门以及商业部门，如果我们有一些关于债务重组方面的想法和建议，应该如何与这些私营部门、公共部门以及 IMF 尽早地开始接触，这也是我们所关心、关注的。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巴黎俱乐部在决策的时候采取的是大家必须完全达成一致的原则。假如有一个小的债权国它的立场和中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大债权国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发言权，但是巴黎俱乐部的决策原则并非如此。

关于 G20 的《暂停偿债协议》（DSSI）是否还具有其必要性，我觉得它很重要，很必要。当然如果我们看有哪些特定指标的话，大家会有异议，会有争论，但是它整体框架还是非常可行、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于债权国还是债务国而言都是如此，我也知道 IMF 在整个债务重组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构建国家金融安全指数 防范金融安全风险

■ 周道许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周道许

我分享的是我们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即我们创建的国家金融安全指数。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制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或地区）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干扰和冲击具有足够抵御与抗衡的能力，并保持正常运行和发展的一种稳定状态。

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安全在新时代的动态变化，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秉持“反映金融安全本质、突出金融风险导向、注重风险识别计量、提供前瞻预警价值”的思路，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通过对全球典型经济体的国家金融安全进行多层次剖析，研究创建了国家金融安全指数。

指数是直观可靠、先行的信号系统，指数值直接反映金融安全变化的走势。国家金融安全指数能够显示出国家金融安全所处的状态、经历历程、发展趋势，以及在全球中的参考位置。

下面是我们对全球 15 个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安全指数情况的汇总。2017 年 10 月，指数为 100，指数越高，安全状况越好；指数在 40 以下，金融安全情况极差；如果指数在 200 以上，说明金融安全处于极好的等级。15 个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韩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南非、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我们看一下趋势，近几年是一个波动向下的趋势，即全球的金融安全状况出现系统性下降。

从指数的运行结果来看，各国的金融安全呈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全球金融安全稳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从国家安全指数 2017 年的基数年来看，各国的金融安全程度受全球环境共同影响，相互之间的金融安全的扰动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例如，当 2020 年以来发生疫情冲击时，欧洲及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安全指数均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当前全球各国的金融安全彼此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确实是个“命运共同体”。

另外，从近三年来看，中国的金融安全程度较高，而且波动幅度比较小。相比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金融安全显得更加稳健，指数值都在 100 左右。尽管 2021 年以来，中国也与全球同步出现了一定的下行态势，但 2022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的相对排名有稳定向好的苗头。

为什么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出现向好的苗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人民币的汇率总体保持稳定，波动率较其他国家货币而言比较小，比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幅度小于日元和韩元。

二是从经济晴雨表的综合股票指数来看，中国的股票综合指数尽管处于下行状态，但是波动也比较小，表现相对稳定。

三是代表无风险回报水平的国债利率整体维持在 2.45% ~ 3.35% 之间，国家债券信用等级比较高。

四是在核心资产方面，主要是房价不同于欧美的上行态势，中国呈现下行态势，但下浮的程度比较低。

总体而言，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仅进入 -1% 的下跌区间。

五是从外债规模的变化来看，中国的外债规模有所上升，但是我们外汇储备同步增加，说明外债规模的质量较好。中国能够持续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外国直接投资金额比较大，为中国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中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

六是从支撑金融安全的条件来看，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内充足的保障和自给能力，避免了美欧的输入型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幅度也比较稳定，物价整体处在 1.6% ~ 3% 之间，没有出现物价暴涨的态势，这说明中央货币管理部门实施的跨周期、逆周期和跨市场、逆市场调控，有效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指数对比表明，中国当前有较强的保障金融安全的能力。从未来看，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资源支撑上，还有较大的应对空间。

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准备金率还有继续下调 5% 以上的空间，降息空间也还比较大，相比于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及零利率，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除此之外，中国在外汇储备的规模方面，远超日本等国，可以有效地应对汇率的波动和冲击。中国的 IMF 特别提款权等储备资产也比较大，均对国家金融安全形成了有效的支撑。

二是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赤字率较低，实施开发性金融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同时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对维持资本积累的稳定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相比欧美的财富不均，中国较为均衡的财富状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有利于形成较高的金融安全程度。

三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深化的程度尚有巨大的空间。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和估值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中国在多个方面具有维持金融安全的资源优势，也具备较多应对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空间。当然，中国的金融安全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提升金融安全水平。

国际贸易

加强 G20 框架下的多方协调 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104
约翰·利普斯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BWC）副主席、IMF 前第一副总裁

世界经济面临衰退与去全球化风险 贸易保护主义是市场经济之灾 106
易小准，世界贸易组织 (WTO) 原副总干事

国际贸易数字化、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108
姜增伟，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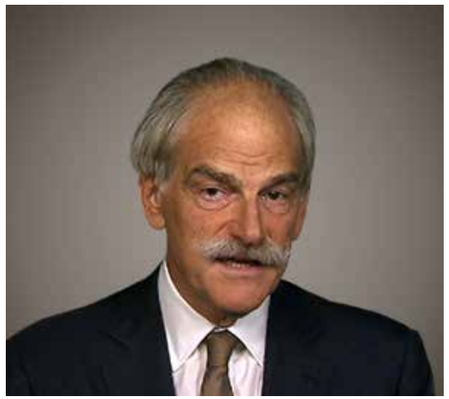
全球贸易面临挑战 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其效不彰 110
郝福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

稳出口，保就业，发挥中高端制造业人力成本优势 112
屈宏斌，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技术转让限制 114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

加强 G20 框架下的多方协调 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 约翰·利普斯基 / 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BWC）副主席、IMF前第一副总裁



约翰·利普斯基

国际体系正面临挑战，要想实现真正的进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变，才能避免发展中的危机？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国际金融体系，也影响了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我的主要结论是，我们需要更加一致的多边合作模式，设立宏观的金融政策，进而实现共享的经济成功。

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创立的初衷就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政策环境方面要有一个稳定而且灵活的系统，成员协议也讲到要支持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治理方面，要打造新的国际多边机构，能够反映出成员的相应经济力量，它有相应的投票权，每五年对此重新审议一下。这就建立了一个多边体系，促进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支持方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我们要减少过去对贸易的限制，成立关贸总协定，要更多地实现国际贸易方面的合作，开放国际贸易。二是重新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是在金本位基础之上诞生的，要通过改革让它更加持久、更加可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章程规定，IMF 成员达成协议之后，就可以在允许支付的条件下，解除对于其他所有相关外币使用的限制，但是现在几乎 100% 的 IMF 成员都保持对外币使用的限制。所以我觉得 IMF 成员实际上给全球金融的流动带来了一些障碍，虽然他们一开始的初衷和主要做法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促进国际贸易。IMF 成员协议当中也讲到要通过建立多边支付体系助力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并且消除外汇管制，因为外汇管制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通过 IMF 成立以来数十年的努力，外汇管制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大幅度削减。与此同时，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也下降了，而且国际贸易正在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全球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增长率超过了全球 GDP 的增长率。

二战结束以后，全球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是重建国际贸易体系，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渠道来支持贸易，但是当时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因为二战结束初期还不存在规模化的跨境资本流动。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跨境资本的流动，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危机，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打造一套高效的、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和规则得到了有力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很多成员都大力推进这一进展，世界贸易组织（WTO）也积极推进这一进展。此后，全球体系进一步扩大，不仅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大幅度扩大，而且资本账户的流动也大幅度增加，进而催生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壮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委员会想要长期发挥系统性的作用，有力支持国际资本流动。然而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货币贬值，使得这个想法不得不暂时放弃。很多人也因此认识到想要增强国际金融稳定，就需要加强广泛合作，推动各个国家监管和监督机制的前后一致性和相通性，于是在 1999 年建立了金融稳定论坛。

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总的资本流动大幅度增长，增长率超过了贸易的增长率。但是全球资本的流动当中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缺陷，比如监管的界限不清晰，甚至是缺乏监督，这也是导致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些缺陷和其他系统性风险，于是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随后根据 G20 峰会决议于 2009 年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了之前的金融稳定论坛。中国也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进一步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改革。G20 的领导人同意通过 WTO 来推动新的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

如今距离第一届 G20 峰会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长期大量和积极的工作，在增强银行业的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资本市场监管的进步相对较小，比如欧盟银行业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建立资本市场联盟。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不断地成长，也就是说那些具有重要系统性的机构越来越存在于目前的监管界限之外。这样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在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

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作为继承巴黎俱乐部的一个共同框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一些脆弱的经济体出现了一系列的违约，说明迄今为止共同框架围绕联合减债、解决债务问题的努力进展甚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摩擦，而且越来越多地反映为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新的金融制裁。 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减速，衰退的风险在逐步上升，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打造一个前后更加一致的、更具合作性的机制，来制定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这样才能够避免保护主义的风险，并且从中期的角度提高全球基本市场的效率。当然，近期依然有可能出现衰退的风险。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让 G20 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取得成功。

从中期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推动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我们需要一个和当前的机制相比更加行之有效的机制。我们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避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因为我们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拓展全球贸易。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积极促进全球支付系统的合作。如果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制裁泛滥，将有可能威胁到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我们过去取得成功的根本之道，并动摇全球增长的根基。

世界经济面临衰退与去全球化风险
贸易保护主义是市场经济之灾

■ 易小准 / 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副总干事

易小准

2022 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行长双双发出警告，提出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的风险，而且衰退的程度可能会比许多人预期的更深。欧洲、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 8%，全球极端气候肆虐，世界挨饿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在 2021 年的 7.7 亿人基础上，继续增加 1300 万人。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滞胀态势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和俄乌冲突走向扩大化、长期化，就有可能引发规模巨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除了经济和贸易危机，人类还面临着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环境危机，以及产业链脱钩断链的危机。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崛起完全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是经济全球化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开始，就逐渐回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从传统的贸易自由化掉头转向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加上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的争斗，进一步推动了去全球化的进程，俄乌冲突将大体上终结世界在过去 30 年所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和粮食短缺将会迫使全球的供应链进一步重构，走向了断链化、本地区化、友岸化，甚至导致各国走向自给自足。

欧美的跨国公司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不得不从原先优先考虑低成本、高效率转而更多考虑供应链安全和价值观的贸易。据 WTO 统计，在 1995 年 -2008 年的全球化高潮期间，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长率高达 9.4%，但是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 2018 年这十年间，这个数字骤降到 1.7%。预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之下，全球贸易额的年均增速还会进一步降低。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亚洲个别经济体，首当其冲地会受到这个趋势的不利影响。

我们要看到，去全球化对于消费者来说，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当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范围内高企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去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本。我不相信经济全球化会退回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因为消费最终是一个经济行为，商业竞争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改变。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消费者仍然会寻找物美价廉的产品，那些被成本推高的企业最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因此被地缘政治驱动的去全球化进程，我相信也会遇到瓶颈。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和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

逆产业分工的市场规律而动，违背了多边贸易规则，滥用安全例外条款，强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会割裂全球市场体系，造成全球供应链紊乱，也会严重扭曲以多边贸易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堪称是市场经济之灾。

总体而言，在国际贸易和跨国产业分工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是难以长期维系的，开放性、非歧视和遵守多边规则是市场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健康运转的重要保障。逆产业分工的市场规律而动，违背了多边贸易规则，滥用安全例外条款，强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会割裂全球市场体系，造成全球供应链紊乱，也会严重扭曲以多边贸易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堪称是市场经济之灾。

中国早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并且在全球贸易和生产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间品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占比达到了 20% 左右。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当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落入泛安全化的陷阱。

我相信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从贸易保护的逆境中突围的关键，路遥知马力，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全稳定和低成本高效率就会使中国牢牢地留在全球供应链之中，我们可以继续与各国开展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

国际贸易数字化、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 姜增伟 /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姜增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重构仍在持续，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加快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步伐，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

一、全球贸易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有关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 38.1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15.6%，占 GDP 的比重为 45.0%。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带动了贸易数字化转型，使传统贸易融入数字化发展大潮并推动电商快速崛起，特别是跨境电商日益成为稳定全球贸易规模、推进贸易转型升级、带动产业链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催生出数字服务贸易等新型贸易的业态。

2021 年，全球跨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超过 5.3 万亿美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则接近 3.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动力和巨大的发展潜能。展望未来，贸易数字化所具有的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拓宽贸易渠道等内在优势将进一步释放，这些将推动贸易数字化的规模和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二、贸易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仍应坚持全球化方向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快了各国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步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本土化发展趋势，非关税贸易壁垒有所增加，资源配置中以效率为主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随着贸易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的信息链条显著缩短，“买全球”、“卖全球”和“产全球”也更加容易实现。在这一条件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遵循各国资源禀赋优势、以市场机制进行布局调整，能够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构步伐，有效增强各国企业的发展韧性、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并给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和改善，使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继续深入迈进。

三、以多边合作引领全球贸易数字化发展

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携手合作。一是要坚持在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框架下，统筹各国与各相关国际组织力量，加强数字贸易等领域的规划磋商，减少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摩擦成本。二是推动有关各方携手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构建“全球化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进一步夯实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三是着眼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加强各国磋商，健全全球经济治理，切实降低和消除贸易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各种壁垒。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是贸易活动的重要支撑，

贸易数字化转型对金融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与金融业相互融合，促进了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贸易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结算、信贷融资等方面的支持，提升了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水平，也助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多年来，国际金融论坛（IFF）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积极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复苏，在提升金融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继续发挥自身独特影响力，打造国际交往新平台，为加速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2022 年 4 月，全球服务贸易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国际性开放的合作平台，联盟秉持“中立、开放、包容、创新”的原则，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服务贸易企业、商协会、专业机构及行业组织等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完善服务贸易规则、加快数字化进程、优化国际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开放、创新、融合发展。我也期待，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与国际金融论坛（IFF）加强合作，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全球贸易面临挑战
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其效不彰

■ 郝福满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

郝福满

在疫情爆发的逆境中，全球贸易确实出现了一些下滑，但是在 2021 年又出现上行，所以整体表现还是不错。中国 2020 年很快地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所以中国的贸易表现尤其好。

整体来说，全球贸易的增加值一直在推动贸易的扩大和有效性提升，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全球的价值链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发展，也建立了全球性的产业链，有效地降低了交通的成本。所有这些效率的增长，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收获了这些发展红利。

世贸组织的益处，特别是中国入世以及之前的一些成员加入世贸组织的益处，所有的这些益处，所有的这些效率提高都在疫情爆发之前充分发挥出来了。

全球贸易在 2020 年上半年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很快就恢复了一部分，尤其是对于制造业的贸易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加入世贸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还签署了一些推动贸易、促进贸易的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我认为，实际上是俄乌冲突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走势，给全球贸易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另外，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对华政策，以及拜登上台后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击，发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过去十年当中，确实有一些美国国内政策是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为重的，拜登本人在国际贸易政策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尤其是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

数据的传输安全等因素肯定会影响对未来贸易的展望，但是整体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有关数据的跨境处理，不仅仅是公民隐私问题或一般性的隐私问题。我们新加坡对于数据的管理以及数字化贸易方面，整体的立场是比较自由化的。我们和澳大利亚达成了一些协议，也希望中国能够参与进来，尤其是在服务贸易方面，同时也会影响到货物贸易。现在这个方面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则，尤其是在世贸规则中并不是特别明朗。对于监管，尤其是国际性安全方面，实际上规则比较宽泛，这就使得一些国家在关于国家安全方面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所以这方面它是比较弱的。

中国一直都有一些特殊的产业政策，现在欧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产业政策。另外，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进行世贸组织规则的协商。实际上世贸组织在这一方面已经是其效不彰，没有办法来发挥它的作用了。因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办法裁决问题、争端和纠纷，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

中国一直都有一些特殊的产业政策，现在欧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产业政策。另外，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进行世贸组织规则的协商。实际上世贸组织在这一方面已经是其效不彰，没有办法来发挥它的作用了。因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办法裁决问题、争端和纠纷，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

全球贸易自疫情爆发以来发展情况尚可，但是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主要看企业到底用什么样的业务模式。我们之前也说到了“中国 +”的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到底该怎么做。每个企业的董事会怎么做决定，尤其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他们要进入中国市场，一定要考虑国际安全、国家安全问题以及企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确实会有一部分企业离开中国到东南亚地区，包括美国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使贸易出现区域化倾向，短期内可能会对于某些区域有利，但是长期来说这对世界经济并不好。

稳出口，保就业，发挥中高端制造业人力成本优势

■ 屈宏斌 /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

中国出口产品的分布是全覆盖的，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中国的出口产品，而且中国的出口不管怎么分类，无论是从出口品种分还是从区域分，相对来说都比较均衡。比如尽管有贸易战，美国仍然是我国三大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欧盟和东盟，其中东盟这几年增长比较快，这三个中国主要出口地区三足鼎立，基本上是中国出口的大盘。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也都是中国出口的市场。

疫情三年，中国的出口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可以说，疫情期间出口是支撑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 2022 年通胀超预期，倒逼全球央行几乎同步大幅加息，加息可能会使过高的通胀慢慢降温，但其代价是全球经济、需求可能都会明显放缓。

现在大家的共识是全球经济相对于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率会有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欧美，而这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很大冲击，因为欧美对中国出口的总需求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东盟 2023 年经济增速也将明显放缓。中国三大出口市场欧盟、美国和东盟经济放缓，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

总而言之，2023 年短期内中国的出口，即需求三驾马车里面最给力的一驾马车会有下行的压力。出口的影响不仅仅是直接通过进出口贸易顺差的减少影响了三大需求，它还有第二轮间接影响。因为制造业有 1.2 亿就业人口，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1/4，如果加上跟贸易、港口相关的服务行业，涉及 1.8 亿就业人口。1.8 亿人口即 40% 的城镇总体就业人口受到影响的话，将会出现第二轮螺旋式经济下行压力。所以一定要有对冲，内需方面，消费也好、投资也好，我们都要去算账，要努力去做。

除了内需以外，还有汇率。2022 年人民币贬值更多是因为美元升值，而非人民币贬值。考虑到出口下行的压力，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即使 2023 年美联储放缓加息，美元有所回调，也应该权衡人民币的升值跟美元变动对中国未来出口的影响。我觉得从出口的角度讲，人民币维持在 7 的水平或者弱一点，至少对出口行业会有一个补贴，所以汇率方面是第二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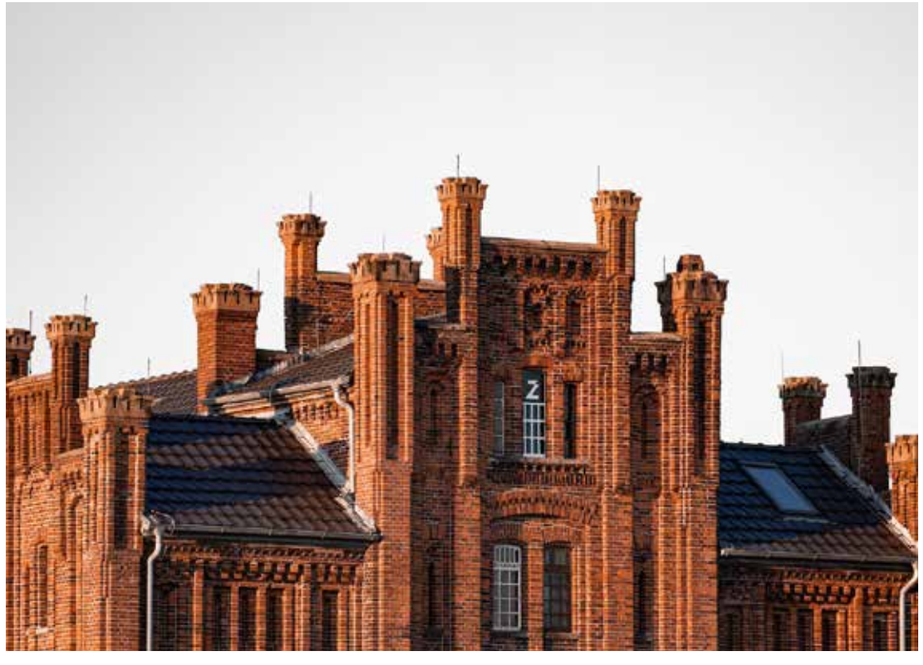
第三个方面是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按说应该对出口行业施行全额退税，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全额退税，是打了折扣的。在出口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考虑全额退税，可以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解作用，但这是短期的。未来几年中国出口还可能面临另一个挑战——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毫无疑问这会对几十年以来，中国努力建立起来的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带来直接冲击。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挑战，应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稳住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未来中国要保住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和市场份额，就要在制造业方面继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就要继续吸纳更多人口进入制造业。过去十多年，由于政策导向问题导致制造业吸纳新增就业率下降，中国制造业减少了 2000 多万就业人口，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4000 多万。第三产业在过去十年已经取代了制造业，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对未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所以建议把重点重新放在制造业。过去十几年，中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我们还把其作为调结构的一个成果。放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看，我认为应改变这种思维，还是要脱虚向实，重归制造业。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一些政策的思维、政策的导向都应该有所调整，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讲，它是劳动生产力的“直升电梯”，服务业只是“扶手电梯”，两者都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制造业提升得更快。所以，我国需要更多的制造业和制造业人口。

放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看，我认为应改变这种思维，还是要脱虚向实，重归制造业。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一些政策的思维、政策的导向都应该有所调整，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讲，它是劳动生产力的“直升电梯”，服务业只是“扶手电梯”，两者都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制造业提升得更快。

鉴于中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在低端制造业已经没有优势，所以应将发展重点转向中高端产业，而且我们在中高端产业也有成本优势，比如我们有大量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我国低端产业的薪资水平现在已经远远高于越南和印度，但是我们的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工资水平还远低于韩国、新加坡、日本和欧美的工资水平，所以我们在中高端产业仍然可以发挥低成本优势。而且，我们有规模优势，中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有 1000 多万，其中 45% 是理工科毕业生，即每年新增四五百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比欧美、印度、日本、韩国的总和还要多。如果说过去 30 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扩张主要依赖于每年 1000 多万农民工的低成本优势，那么未来 5 ~ 10 年将主要依赖每年 1000 多万大学生的相对低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所带来的效益。

总结一下，从长远看越是外部要跟我们脱钩，要把我们踢出所谓的发达国家、西方国家的市场贸易圈，我们越是要跟他们挂钩，因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我们实现自己既定目标的必由之路。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技术转让限制

■ 林桂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

林桂军

我今天讲一下关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技术转让限制的问题。

第一，美国实行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基本动机。从历史来看，美国在高科技出口上实行管制一直有一个不动摇的政策，英文叫“leap ahead keep the behind”，就是向前跑、把竞争对手甩到后面。目前中美在高科技技术转让上的矛盾可能是美国整体大战略下的一个产物，美国要向前跑在世界的最前面，要把全世界所有竞争对手都甩在后边，首先针对的就是中国。

第二，美国高科技政策实施的特征。201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所实行的措施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法案展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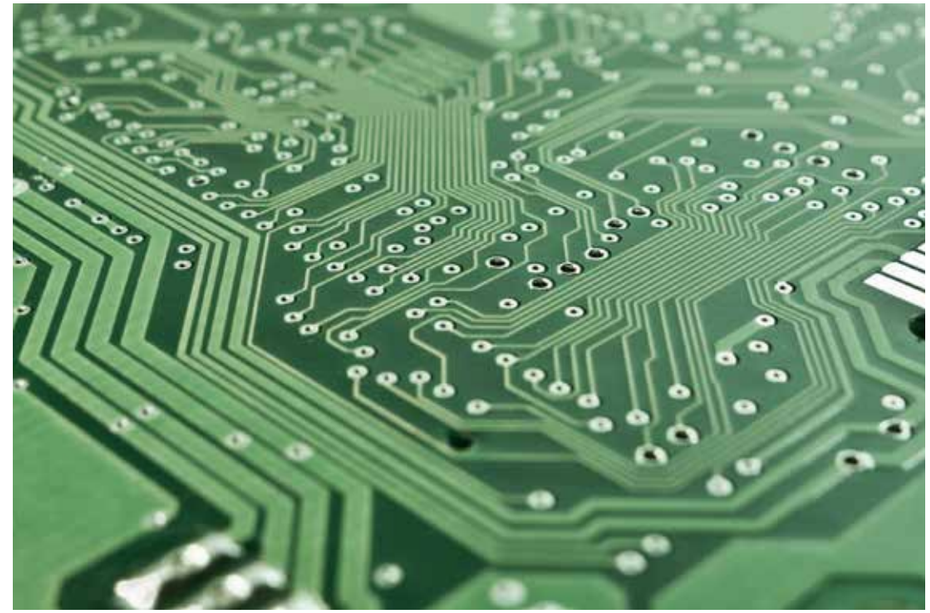
这个法案有什么特征呢？它比起过去美国所采取的政策明显地收紧了对技术出口的限制，而且具有明显针对性，主要的针对目标就是中国。但是针对中国的同时它也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也会逐渐对其他国家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逐渐地看出这一点。2018 年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美国在法律体系里面第一次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国家安全这一个目标，实际上已经拓展到了经济安全的目标。所谓经济安全的目标，就是在竞争中美国一定要获胜，如果输了美国的安全就不复存在。怎么获胜？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战胜中国。

为什么说它把经济安全拓展到了国家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呢？很明显，因为它制定了加强对新型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管制，这个新型技术的清单还没有最终出来，基础技术的清单也还没有制定，下一步就要在新型技术上、在基础技术上对竞争对手实行控制，所以我想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还会进一步深化。

第三点，它针对中国的管制，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1. 瞄准中国的军工企业；2. 瞄准中国的军民融合企业；3. 瞄准电信企业，特别是 5G 领域。美国整个管制体系不是全部拒绝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而是有选择性的，拒绝跟某些中国客户、用户、企业进行贸易，所以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清单，这个清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实体清单。特朗普政府大概实施了 22 项对华出口管制的措施，其中 10 项以上是关于出口清单的。拜登政府大概实施了 16 项对华管制的措施，其中大概六七项都是关于实体清单的。实际上它认为中国的企业是一致的，因而对中国企业实施歧视性的政策。美国出口管制最优惠的政策应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第二类可能是它的一些盟友企业，当然很难划分出来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因为其这些盟友实际上对它整体的政策威胁也是比较大的。

从管制产品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主要围绕着芯片、电信、超级计算机和通信卫星这几大类产品进行。这几类产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军民两用品对华出口上争论的重点。美国卫星产品已经不再跟中国进行交易，因而不在讨论行列里，剩下的就是半导体和电信。超级计算机也是美国一直对中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拜登又在措施里加强了对超级计算机的管制，因而实际上只剩下半导体，或者说半导体和电信这两个领域，特别是中国的 5G 相关技术，是美国过去较长时间以来没有严格管控的领域。

从美国整体的战略来说，它是逐渐地收紧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收紧技术转让，将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外溢效应。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特点是，中国出口相当数量芯片的同时也进口相当数量的芯片，其中最关键的是 HS8542 这个产品，中国每年进口额 3000 多亿美元。而在这 3000 多亿美元中，只有 200 ~ 300 亿美元来自美国，剩下的都来自其他国家。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要针对这个产品出口中国实行管制，毫无疑问需要其他国家配合。同样，如果美国对 HS8542 实行管制，就会造成全球市场 HS8542 这个产品紧张短缺，其他国家的生产商就会进入这个领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存在着机遇。



美国的出口管制具体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制造了一个不确定的前景。这个不确定的前景还包含着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

美国的出口管制具体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制造了一个不确定的前景。这个不确定的前景还包含着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

大湾区

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发展 117
梁锦松，IFF 副理事长、香港财政司前司长

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大湾区共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 119
余利明，国新国际常务副总经理

“科技 + 资本”推动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121
沈明高，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

南沙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 123
林少礼，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总经济师

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发展

■ 梁锦松 / IFF副理事长、香港财政司前司长

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 9 市加上香港和澳门，其经济总量和人口可以比肩欧洲一个比较大的国家，而且广东 9 市与港澳产业经济的功能非常互补，且对外的联系很强。这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非常契合。

香港作为稳居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对构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大家知道“一国两制”政策赋予香港继续沿用英国法律的权利。我个人认为这比较重要，因为就我观察世界上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适用的都是普通法系，在大湾区里这是香港独有的。第二，港币是全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对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人民币在中短期内不可能在资本市场全自由兑换。第三，香港有比较完善且为国际投资者比较熟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较为丰富的金融经验，另外香港拥有较多的国际国内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 9 市加上香港和澳门，其经济总量和人口可以比肩欧洲一个比较大的国家，而且广东 9 市与港澳产业经济的功能非常互补，且对外的联系很强。这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非常契合。

香港特区政府为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已经推出了各种利好政策和计划，我个人深表赞同和支持。它表明中国要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以及国际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推动金融及专业服务向高端、高增值的方向发展。

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方面，我们希望逐步拓展大湾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大湾区内的银行机构可按照双方规定，开展跨境人民币交易、人民币远期外汇业务，以及人民币衍生业务、理财产品交叉代理销售业务。大湾区里的企业可按照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香港的机构投资者按规定在大湾区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香港资本市场，参与投资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以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

在强化大湾区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方面，我们要不断完善深港通和债券通，推动大湾区电子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扩大香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稳固扩大两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跨境交易，不断丰富投资产品类别和投资渠道，建立资金和产品的机制。

在保险业务方面，内地与香港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的业务，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创新型跨境机动车保险和跨境医疗保险产品，为跨境保险客户提供便利化承保、查看、理赔等服务。在机构业务和开放措施方面，符合条件的香港银行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机构，落实内地与香港

CEPA 系列协议，推动香港在金融业等领域实施特别开放措施，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香港投资者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在广东为香港投资者和相关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更好落实 CEPA 框架下对香港的开放措施。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在 CEPA 框架下研究推出进一步开放措施，使香港的专业人士与企业，能在内地更多的领域从业，在投资、营商等方面享受国民待遇。

除此之外，内地与香港也应该探讨如何在新的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方面加强合作，包括虚拟货币及相关服务，如支付、资产管理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发展，我们可以考虑：1. 粤港澳三地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共同成立专家小组，定期讨论及检视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的进展；2. 不同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机构也应该有类似的协会；3. 经常举办论坛，集思广益，增加全社会和国际对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枢纽的关注和支持。

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大湾区共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

■ 余利明 / 国新国际常务副总经理

余利明

关于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大湾区共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大湾区世界级制造中心与世界级港口群互赢共生。

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城市群以世界工厂著称，成为中国制造对接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供应链配套，生产企业服务业高度共聚，带来了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目前大湾区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体系，其中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展，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初步实现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智能、家电、电子信息、绿色能源这些万亿级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大湾区制造业发展的引擎。华为在网络通信和智能终端领域，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大疆科技在民用无人机领域，腾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华大基因在生命科学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引领大湾区产业集群，适应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竞合变化。大湾区港口群中广州、深圳、香港、珠海、东莞、惠州 6 个港口已迈入亿吨世界大港行列，深圳、广州、香港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前十中占据三席之位，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国际航运网络不断完善，大湾区港口群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第二，大湾区港口群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大。

制造产业转移给大湾区港口群带来了市场基础和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在地缘政治需要和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与此同时，大湾区人工成本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变窄，低端产业引发的环境问题难以承受，所有这些客观上促使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以生产要素为竞争优势的规模性制造产业持续转移，甚至被迫流失，越南和东南亚承接了大部分这些中低端制造产业，形成了国际第五次产业大转移。

毋庸讳言，这一次的产业大转移给大湾区港口群带来了直接经济腹地市场基础未来增长的极大不确定性。尽管香港在船舶注册、融资管理、海事保险、海事法律、海事仲裁各方面的航运专业服务能力领先全球，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依然稳固，但在港口腹地产业转移以及周边港口的激烈竞争下，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从 2011 年高峰期 2400 万标准箱，连年下跌至 2021 年 1780 万标准箱。新加坡竞争能力和系统规划，对大湾区港口群未来的发展构成了长期挑战。长期以来，围绕打造全球性枢纽港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新加坡持续创新，积极推进港口大型化、自动化、智能化，注重绿色港口发展和港航生态圈建设，早在 2015 年新加坡就提出 2030 下一代港口战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港口竞争。这个战略以大士港智能港口建设为核心，面积超过 13 平方公里，水深不少于 23 米，通过新一代技术设施的综合应用，打造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港口。建成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士港可以处理集装箱船舶年吞吐量最大将达到 6500 万标箱。借此新加坡可进化为超现代化的智慧物流中心，成为集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和港口生态圈事业为一体的超级深水港综合体。

目前配合制造产业向东南亚、印度转移的这个历史机遇，大士港第一期已经投入使用。而大湾区不管是深圳、广州还是香港，目前缺乏水深 23 米以上的深水港，难以

全天候无条件接纳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与制造业产业转移产出的国际中转货源失之交臂。

大湾区港口因城市界面难以协同，港城矛盾日益突出。面对大湾区体量巨大的港口群，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必然成为战略性议题与长期性任务。香港港口市场尽管下降趋势明显，但是港口功能布局与城市发展不协调冲突仍然持续难解，在疏港交通功能、后方用地安排居次要位置后，聚焦高端航运业务已成为港口与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

深圳凭借自身良好的组织和运行能力，使得港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取得动态平衡，但是随着建设世界级滨水界面的前海方案不断推进，港城协调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

广州深水岸线有限，成本高，也远离主航道，从战略角度看并不具备港口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三，规划大湾区共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势在必行。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战略支撑区域，规划上强化国际航运功能，不仅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提升国家全球资源调配能力的关键所在。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在全世界和中国范围内地理跨度都不算大，在当前和可见的未来，特别是考虑到香港葵涌码头 2047 年租约期满，国家把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来规划，重构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无疑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合力。

为此提出以下抛砖引玉的规划和重构建议：

以港珠澳大桥为界，划分大湾区港口的内湾与外港，在外港规划大湾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综合体，黄金内湾在港珠澳大桥以内 100 公里聚焦港口存量优化调整和港城协调布局，以腾出空间进一步挖掘大湾区资源潜力，实现产业优势互补、转型升级，形成聚合效应。黄金外港在港珠澳大桥以外 50 公里，借鉴新加坡和上海洋山港经验，由国家主导规划大湾区辐射全球的超级航运枢纽，超级航运枢纽经科学论证后可选址桂山岛、万山群岛或者以南海填田方式形成陆运，连通港珠澳大桥，对接大湾区黄金内湾及疏运通道体系。超级航运枢纽面积不少于 20 平方公里，水深不小于 20 米，设计集装箱吞吐量不低于 1 亿标箱，货物吞吐量不低于 10 亿吨，形成自动化、智能化、超现代化集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和港口生态圈事业为一体的超级绿色航运枢纽综合体。

超级航运枢纽由大湾区港口城市共同拥有，行政上以香港自由港模式管制，业务上依托大湾区港口运营商市场化运营。大湾区港口城市共同拥有，避免了地权上划分给单一城市管辖的冲突，在各城市达成利益与权利共识的基础上，能够以股份公司制方式共享超级航运枢纽。行政上以香港自由港模式管制，成熟的市场制度与法商环境、低成本的离岸金融产品与服务、全球顶级城市品牌和影响力，这些香港竞争优势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业务上依托大湾区港口运营商市场化运营，目的是促使大湾区在港口群存量业务与超级航运枢纽增量业务之间有序进行过渡、转化和调整。以双港区资源动态调配，有序进行优化运营，从而在战略上为双港区之间规模调整、港城功能转化布局留下时间和空间。

“科技 + 资本”推动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 沈明高 /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

沈明高

我从“科技 + 资本”推动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面讲几点看法，有三个角度：新动能、新金融、新机会。

二十大报告讲得非常清楚，从国家总体战略来看，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要落实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多途径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所以总体来讲，提质增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战略之一。

首先，在目前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后房地产经济时期已经到来。后房地产经济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持续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这跟过去的趋势状况是相反的，过去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它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 GDP。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新的动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二是制造业升级。从消费角度来讲，关键要解决量的增长问题。目前全球经济放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总需求不足，包括发达国家需求也增长乏力。我们研究了二十国集团 19 个国家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发现许多国家国内消费增长潜力非常大，而中国基本上是 G20 国家中消费占 GDP 比重最低的。也就是说中国消费升级的增量空间非常大，政策的支持空间也非常充足。

从提高增长质量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升级是大方向。我们最近重点对广东产业链（集群产业）的优势做了一些研究。我们按照投入产出比做了一个广东制造业产业链条规模的相对判断，发现广东具有产业链规模优势的产业（从制造业或者从硬科技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汽车产业，此外能源化工也有一定优势。具体从南沙角度来讲，我认为应该思考南沙未来在大湾区的定位，即南沙怎么样参与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发展。

第二，新金融跟传统金融在四个方面有很大不同，体现了新金融的四大核心能力：1. 产业研究能力。从科技 + 资本的角度来看，科技要认识资本，资本要认识科技，金融首先要认识产业。所以，我认为产业研究能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能力。2. 定价能力。由于是创新，是新业态、新模式，定价不同于传统成熟的出口产业，所以新的资产或者新的产品定价能力就非常重要。3. 客户服务能力。相对传统客户服务，未来更重要的是金融链和产业链怎样融合。4. 交易能力。我认为不论是整个大湾区还是具体到南沙，交易的能力都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要推动大湾区实现区内投资和交易的拓展，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境内投资和交易、跨境的投资和交易，关键是要加快区内的互联互通。

从新金融的角度来讲，科创是一个重要方向，我们最近对几个科创竞争力比较强的主要城市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风投科创企业的所谓私募基金，在不同区域相对集中度是比较高的。比如深圳 91.4% 的创投机构集中在南山和福田区，广州差不多集中在黄埔和南沙这两个重要的集聚区。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把南沙打造成一个风投或创投的产业集群，提升其竞争力，是一个重要思考方向。

从提升增长动能来看，要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或产业链的强链、补链，关键就是要提高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各个风投集聚区域研发投入占 GDP 的

比重总体来讲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南沙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未来可以通过“科技＋资本”的形式提升南沙的竞争力，特别是吸引创投机构的入驻。

第三，新动能。新金融或者“科技＋资本”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对此，我们也跟长三角做了比较。在新能源方面，虽然大湾区有自身的优势，但是跟长三角比，大湾区在以下几个领域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从汽车或者新能源汽车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总体还是偏下游的整车组装产业。汽车产业是南沙的一个重要产业，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向新能源、智能化、中游零部件配置方向发展。包括锂电池、储能技术，都是一个新的方向。跟新能源相关的光伏逆变器等，都是南沙应该关注的，可利用技术和广东产业发展特征，发挥南沙的区域优势。

从半导体和高端技术零部件的总和来看，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几个万亿级赛道，包括中高端的电机，还有其他模具、轴承等等，这些在大湾区都有良好的基础，但相对于长三角来讲，这些产业的总体规模不大，相对来讲升级的动力不是很足。如果这些产业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向中高端发展，比如说电机更加高速，往“电机+控制”这个方向发展，也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从智慧养老、生物医药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讲大湾区医药机械比较强，但创新药、医药外包等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结论：现在全国新动能转换势头非常迅猛，南沙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有可能实现后来居上。但要奠定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要创新金融发展模式，要抓住跟产业链相关的机会，充分发挥南沙的地理位置优势。

南沙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

■ 林少礼 /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总经济师

林少礼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南沙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航运、金融科技的创新功能承载区，要求着力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

一是发展特色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绩效增长。立足南沙经济社会特色和产业布局，形成跨境金融、航运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股权投资、期货交易“八大特色”金融板块。全国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以来，实施业务达到 4241 笔，交易金额达到 104 亿美元，6 家企业获批 QFLP 试点，获批额度超过 155 亿元人民币，有效打造绿色金融服务生态城市发展示范样本，累计完成 238 架飞机和 90 艘船舶租赁业务，成为全国融资租赁第三极、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业务基地，落户全国首家全外资期货公司摩根大通期货、全国行业排名前五的华泰期货等 11 家期货机构，逐步完善期货产业生态链。

二是深化粤港澳合作，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凸显。加快与港澳金融规则对接，累计落户港澳的金融企业占比达到 25%，助力 6 家区内企业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金融合作专项工作组。为粤港金融合作、政策试点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启动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联动香港成功落地多项飞机、船舶跨境交易创新业务。打造金融国际交流平台，依托国际金融论坛（IFF）、大湾区科学论坛、新财富资本市场论坛、CNBC 全球科技大会等重大金融及行业交流平台，向世界金融界传播广州声音。

三是建设金融服务重要平台，高端资源集聚效应显著。落地全国首家混合所有制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交易品种——工业硅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将于近期上线交易。实现广州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历史性跨越，并正在联合南沙规划打造期货产业园，打造全国首个国际金融岛及首个核心项目，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已全面封顶，预计 2023 年投入使用。启动明珠金融创新集聚区建设，纳入广州金融功能重点布局版图，落地汇丰全球培训中心、国际人才金融服务中心等相关项目，实现人才可持续发展。

四是打造金融改革策源地，创新金融业务蓬勃发展。以获批跨境金融创新、特色金融发展、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的创新政策试点为契机，加快推动落实金融领域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各项政策措施，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账户、外汇管理改革、国际航运保险税收优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等试点工作，持续激发创新政策试点带动效能。目前累积落地 80 项金融创新成果，近 40 项入选国家、省市金融创新案例或试点。

下一步，南沙将围绕新的定位要求，从开展金融创新政策试点、粤港澳金融合作、特色金融产业体系、重大金融服务平台四方面着重发力，开辟南沙特色金融发展路径，助力南沙加快建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更好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是深入开展金融创新政策试点。加快落实金融领域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用好用实已落地的金融创新政策试点，探索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制度。

二是全面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探索在资本市场、科技金融、

跨境保险、绿色金融等领域扩大与港澳地区的双向开放合作。

三是打造特色金融产业集聚高地。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八大特色金融”，以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为抓手，结合改革试点中放宽跨境投融资措施，加快推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的便利化，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推动气候投融资相关产品和服务创新，打造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示范样本。

四是高水平建设国际化金融服务平台的项目。依托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期货产业园，推动期现联动，用好创新金融支持政策，研究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加强与国际金融论坛（IFF）、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高端金融智库的交流合作，打造金融人才汇集新高地，争取以更高规格举办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

《南沙方案》的出台既是南沙的机遇，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希望上级金融监管部门继续给予南沙金融指导和支持，也希望各位嘉宾寻找合作的契合点，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强化合作、共享资源、共创未来，合力做好粤港澳合作这篇大文章。

专家访谈

在 2022 年 IFF 第 19 届全球年会期间举办的“中国经济新形势：展望、挑战和政策应对”讨论会上，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主持人），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就 2023 年的房地产、人民币汇率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等问题，展开专题和聚焦式对话。

2023 年中国房地产是否能企稳反弹 *126*

2023 年人民币汇率前瞻 *129*

中国 2035 年目标规划 *131*

2023 年中国房地产是否能企稳反弹

主持人：夏　乐，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嘉　宾：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汪　涛，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陆　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丁　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
钟正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夏乐（主持人）：在房地产市场风险暴露之后，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救助房地产市场。大家对于房地产的救助政策有何评价？现在的政策能不能保证房地产实现软着陆，甚而在 2023 年看到房地产反弹？有人说中国目前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重演。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的房地产实现软着陆，从而避免重蹈日本上世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覆辙？

高善文：关于房地产问题我讲两个事实。

第一，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确实给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日本泡沫破裂有两个重要的背景：1. 在房地产泡沫形成，即房价大幅上升的过程中，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日本没有房地产泡沫。但是从 2003 年至今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朝野无数官员和学者都一直在呼吁、在警惕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11 年后，防范或打压房地产泡沫的政策一直都没有停，这与日本房地产泡沫形成的背景有很大差异。

第二，日本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1985 年开始上升，1987 年以后急速攀升，所以在日本房地产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其房地产投资也在大幅度上升。但中国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峰值出现在 2013 年，从 2014 年开始至今一直在下行。尤其是 2019 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比很多国家都低。

夏乐（主持人）：谢谢高首席的精彩回答。汪首席，您怎么看？

汪涛：现在房地产调整幅度应该是近几十年来最深的一次调整。目前季调以后的月度新开工比 2020 年的时候已经跌了一半以上，销售比 2021 年上半年跌了 35% 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已经跌得非常深了，在这种情况下谈软着陆好像有点晚。

至于现在的政策是否能稳定房地产市场，甚至 2023 年出现反弹。我的答案是，2023 年房地产大概率会反弹。因为 2022 年房地产新开工和销售都已经因之前政策收紧以及疫情防控等因素超跌了。“金融 16 条”政策的出台，表示政府已经高度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采取系统性的措施来帮助整个房地产行业。我觉得应从各个方面保证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的流动，比如已经有贷款的要延期，甚至增加贷款，可以通过发债、上市融资、信托等方式。也可以支持一部分预售款，政策性银行、保交房的资金要加量，而且应允许商业银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扩大。

总之，政府应从各个方面出台比较系统的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除了在供给侧方面着力，在房地产的需求侧方面也会有更多政策出台。现在购房按揭利率已经下降了 130 个点左右，我认为还有下降空间；地方政府还可以把首付比例降下来。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也是非常有助于房地产企稳的。

我认为 2023 年 3 ~ 4 月份，销售和新开工面积将开始反弹，环比最低点增长可达 20% 以上。2023 年房地产还不能对整个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但 2022 年房地产对整个经济造成了很大拖累。

房地产的下行是不是中国的明斯基时刻？明斯基时刻实际上是一个信贷收缩和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螺旋形恶性循环。中国有条件阻断这个恶性循环。首先中国的银行不缺流动性，同时监管机构、政府部门都让银行持续贷款的情况下，银行也无法抽贷，所以在今年经济和房地产下行的情况下，中国的信贷仍可以逆势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供应是垄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掌控土地的价格，也就掌控了房地产抵押品的价格，使得它不会大幅度下降，这是在危机时刻使资产价格不会出现过度下跌的一种手段。2015 年那一次房地产调整，银行在之后的 5-6 年中逐步核销了 10 万亿以上的坏账。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因房地产深度调整对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风险，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掌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房地产是软着陆，但是从房地产本身的调整来说，房地产已经过了软着陆的阶段。

夏乐（主持人）：我非常同意汪首席的说法，可能房地产已经过了软着陆那个阶段，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政策，仍然有条件保证整个经济不太受房地产严重拖累。陆首席您有什么观点？

陆挺：房地产的硬着陆从 2021 年第四季度已经很明显了，这次的房地产下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趋势性。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口萎缩，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萎缩；另外一方面跟整个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有关，本来就有下降的趋势，所以指望每年高增长是不现实的。

第二，周期性。从 2015 年到 2018 年中国实行了大规模房地产刺激政策，以货币化、棚改作为主要政策手段，在中国三四五线城市大规模推进房地产发展，形成了一次房地产景气周期。之后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和这轮金融收缩，房地产也将进入下行周期。这个下行周期从 2018、2019 年就已经开始了，2020 年因为疫情冲击下行加速，后来刺激政策向上拉了一把，之后又回归了下行趋势。

第三，疫情冲击。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是雪上加霜，尤其是 2022 年 2、3 月份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很大。

第四，收缩政策。这一波房地产下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融资端猛烈的收缩政策：2020 年第 4 季度推出三道红线，到 2022 年年底又推出两道红线，加起来一共五道红线。

夏乐（主持人）：谢谢陆首席。我想请丁首席再讲一下。

丁爽：从原先一些零碎的救急方式稳定房地产，到“金融 16 条”推出以后变得更加具有系统性，涉及建筑贷款、开发商的贷款，也涉及抵押贷款、诚信贷款各个环节。还有比较重要的组织架构，因为要让行业最终恢复正常，需通过资产重组、收购来解决。以上几个方面再加上“三支箭”——贷款、债券、再融资手段，说明解决房地产问题的紧迫性正在增加，说明房地产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问题，也意味着如果是现有的政策措施不够，还会出台更多政策措施。所以我现在认为也应该警惕出现矫枉过正的状况。

短期内从融资端形成的项目，特别是在建项目会出现比较大的起色，但最终还是要回到需求端，即房屋的销售量能不能上来。短期看，保交楼的问题解决后，就是楼价问题。楼价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如果有潜在需求的购房者看到楼价开始稳定，可能出手购房，从而推动需求端出现比较大的改善。

夏乐（主持人）：最后请钟主席讲讲日本房地产泡沫和中国面临的情况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中国经济、金融意味着什么？

钟正生：首先讲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崩盘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政策端。日本当时房地产崩盘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得过低、过久。从当年的历史记录看，日本房地产已经开始崩盘的时候，日本的决策人士、经济人士好像无动于衷，还在收紧财政政策，在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方面还在不断迈进，完全就是在雪上加霜。而与之相比，中国纾困房地产企业的政策措施顾及方方面面，贷款、债券、再融资三箭齐发，至少在融资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稳定下来是可以期待的。

第二，金融端。日本实行的是“主银行制”（主要往来银行制度），房地产崩盘之后，造成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暴露。对此处置差不多耽搁了 10 年左右，直到 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推出“金融再生计划”才把不良资产问题彻底解决。对中国的启示是，如果要调整房地产，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的风险要有非常清晰的摸底和处置方案，不可无限期拖延。

第三，产业层面。当时日本房地产崩盘与产业空心化是并行的。说白了是因为实体投资回报不行，所以资金涌向暴利房地产行业，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日本房地产崩盘后，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当于以前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崩盘了，疲软的实体产业依然疲软。

中国应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要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必须发掘出新的增长动能。现在对房地产比较好的预估是 2023 年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或有较大收窄，但是如果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不利。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一轮政策之下，中国的房地产不要和中国经济继续形成脱离。

从当年日本房地产崩盘前后政策、金融和产业端情况的分析研究，可以对中国当前房地产调整带来启示。第一，政策上要更加平衡、更加支持。第二，金融端要注意风险暴露问题，如果现在是有利的时间窗口，最好把存量资产做一些优化处置。是否要增加对房地产风险的暴露还需谨慎。第三，产业层面，要发掘出新的增长动能，否则宏观政策会受到道德绑架，毕竟房地产的产业链那么长，相关产业那么多，必须救，那么救到什么程度才可以？

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房地产销售端。2021 年

预测 2022 年一季度销售企稳，二季度投资企稳，然而上海疫情爆发，又预测二季度没有什么戏，三季度销售企稳，四季度投资企稳。一波政策出来之后，没什么反应，四季度销售能否企稳？ 2023 年一季度投资能否企稳？为什么在传导链条中，按揭利率下降，一个季度之后销售企稳回升，再一个季度投资企稳回升没有出现呢？为什么这一轮刺激效果比较差？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仍在恶化，按照 BIS 口径算，中国还本付息和可支配收入比例是 15.7%，比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高，所以中国中产阶级家庭资产负债表并不稳健。二是 2022 年经济、就业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居民预防性储蓄增高。2022 年第四季度居民存款率比前三季度增加 4.72 万亿。三是商品房透支因素，2016-2021 年住宅实际销售面积高于刚需和改善型需求面积共计 16 亿平方米，这可能与前几年棚改区透支有关。最后一个是断供事件频发，对期房如期交付的信心在下降，而最近几年商品房中的期房销售比达八成以上。这些都能解释销售疲软现象。从最近的股市反馈表现看得出来，融资端的恢复加固只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销售端向好，才能把房地产整个链条带起来。销售迟迟没起色，房地产投资也起不来。

我们预测 2023 年降幅收窄，投资的降幅也会收窄，保交楼施工会加速，前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会逐步解决，但房地产真正要起来还是要看房地产销售。我看 2022 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地产销售约 11 亿平方米左右。这是什么概念？简单说，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已经没有投资投机性需求，甚至有些合理的住房需求也被打掉了，所以房地产市场真正企稳还需要时间。如果房企内生现金流迟迟不能恢复的话，目前的纾困政策只能起到暂时止血的作用。房企的库存和债务有可能会进一步积累，只是把风险的时点延后。

2023 年人民币汇率前瞻

主持人：夏　乐，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嘉　宾：丁　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
汪　涛，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陆　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正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夏乐（主持人）：美国 2022 年持续加息给中国汇率带来很大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及其他逆风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在 2022 年下半年破 7。但是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以及一些不确定性消退，人民币出现了反弹。目前的反弹是否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2023 年是否可以逆向破 7，到 6 点多？这种可能性大家是如何评价的？首先请丁首席回答。

丁爽：大家非常关注美联储对加息的态度，美联储虽然可能会放慢加息的步伐，但是在 2022 年 12 月份很可能再次加息 50 个点，然后在 2023 年上半年还会有 1 ~ 2 次加息。这样跟中国政策出现分化，因为即使疫情政策出现调整，但中国经济出现比较强劲的反弹也要到下半年。近期很可能出现疫情的反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所以短期内人民银行的政策将是偏宽松的。所以，短期内美国跟中国利差在上半年还是会扩大。

虽然应该有很多因素来决定汇率的走势，但如果仅从这个因素来说，可能人民币在 2023 年上半年跟美元会出现比较胶着的状况，很难出现单向的走强形势。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在 7 ~ 7.2 这个范围内波动。

但 2023 年下半年，如果中国经济企稳，人民银行加息的可能性还是很小，中国通货膨胀会处在温和的区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太会加息，中美利差就不会对人民币形成压力。

从 GDP 走势看，到 2023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很可能恢复、反弹，而美国至少年初经济会比较弱，同时美国 2023 年经济增长幅度大概率会比 2022 年低。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到 2023 年下半年如果疫情有所改善，房地产将不再成为大的拖累，资本流出的状况会有所改善。这两个因素对市场情绪的影响非常大，也是造成中国 2022 年大部分月份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重要因素。再加上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也是美元本身走势函数，如果美联储的利息触顶，预计之后美元也可能会走弱。所以我们预计 2023 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会有所升值，2023 年第四季度很可能会处于回到 6、低于 7 的水平。

夏乐（主持人）：谢谢丁首席，看来根据您的预测，2023 年人民币汇率逆向破 7 是有望的。汪首席，您对人民币的汇率是怎么看的？

汪涛：2022 年大部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要是受美元的影响，因为 2022 年美联储的加息比较激进，美元一路走高，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比如日元、欧元都是大幅升值。所以，相较于其他国际主要货币而言，人民币虽然贬值但贬值的幅度小很多。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取决于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以及市场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判断，是不是美元已经见底。2022 年 12 月以及 2023 年头两个月，美元可能再度走高。但 2023 年随着疫情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开放，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信心的增强，2023 年下半年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应该有比较大的概率逆向破 7 到 6。总之，2023 年人民币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下半年应该是升值的。

夏乐（主持人）：陆首席，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是否跟前面两位一样乐观？ 2023 年是否会逆向破 7？

陆挺：正向破 7、逆向破 7 都有可能，所以我倒觉得很可能人民币和美元处于一个胶着状态。人民币经过一段时间大幅贬值，从贬值的低点 7.35 回到 7 左右。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处于胶着状态，“7”就像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可能来来回回反复争夺。2023 年美国大概率仍会继续加息，一些比较激进的预测称，可达到 5.5% ~ 5.75% 区间，我们认为加息到 5% 的概率很大。

夏乐（主持人）：前面三位都是外资机构的首席，我想请教一下两位来自国内机构的首席，怎么看人民币明年的走势？

高善文：我觉得人民币反向破 7 没有太多悬念，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 2022 年造成人民币急速贬值

的因素，在明显弱化和改善，而且我认为人民币汇率相对于长期合理的监控水平是存在明显低估的。换句话说，各种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因素都说得通，但是人民币超调了，它明显有从一个超调向合理水平恢复和摆动的需求。人民币汇率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但我认为反向破 7 没什么悬念。值得讨论的是人民币涨幅的路径，以及它会涨到什么水平，比如说 2023 年涨到 6 元多。

夏乐（主持人）：钟首席，您的看法？

钟正生：确实，现在很难预测。2021 年预测 2022 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一路升到 6，美元会直接进入 8 ~ 10 年的走弱周期，没想到 2022 年美元这么强势。所以站在新的时间节点，再去预测 2023 年的汇率，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是我想说的引言，但还是做一下预判，把一些逻辑和视角展示一下。首先我赞同逆向破 7 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的观点。

这主要取决于美元指数，2022 年最高到 114，2023 年全年可能到 100 左右，这是我们目前预测的一个区间。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

一、我们回顾之前的几轮美国经济周期。当美国失业率开始从低点向上反弹，或者说在美国经济衰退或者走弱的压力真正体现的时候，美元指数往往都是走弱或者震荡的，不会进一步走强。所以现在大家预测这一轮美国的失业率会升到多少，我看最近美联储理事说至少升到 5% 以上。在这种状态之下，美元指数很难获得持续或者强势的提升。

二、除了 2022 年有一点变化之外，美元指数过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就是美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差值。通常是美国经济表现强势时，美元指数也走强；当美国经济拖世界经济后腿时，美元指数也走弱。但 2022 年美国经济没有全球经济表现好，为什么美元指数会走强？因为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使全球的避险需求增强并凸显。传统的避险货币，像日元、英镑，避险属性丧失，更加彰显了美元的避险属性。所以我认为 2023 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全球的风险偏好大概率会回归，避险需求大概率会走弱，所以对美元指数的需求支撑作用可能会减弱，当然还要看经济相对表现的基本面。

三、过去三轮的加息大概如此，10 年美债收益率回落差不多一个季度左右的时候，美元指数也是高位回落，我只是说高位回落，不是说一定跌多少，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触底。总体来看，我倾向于 2023 年美元指数很难获得进一步上行的支撑，因为大方向往下走，至于下跌多少，现在很难去预判。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就差不多到头了，甚至可能会反向变成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支撑。

另外补充两点：1. 中国经济平稳修复是人民币汇率的最强支撑。2023 年如果疫情形势好转，中国补偿性消费高于预期，中国的稳增长政策保持连贯性、一致性，总之中国经济表现越来越好，才是对人民币的最强支撑。2. 我们做过这样的分析，人民币超升、超贬往往跟中美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中美关系改善的时候，可能超升，中美关系不确定的时候，可能超贬。现在中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两国都在避免从竞争走向冲突，这也是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之一。

总之，我认为逆向破 7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后面的因素主要是美元，而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好，这才是人民币汇率最最重要的保障因素。

中国 2035 年目标规划

主持人：夏　乐，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嘉　宾：汪　涛，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主持人）二十大再次强调了 2035 年远景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做一个粗略计算，如果从 2020 年到 2035 年要实现人均 GDP 翻番，意味着 15 年内中国经济潜在年均增速需保持在 4.5% ~ 5% 的水平。请问汪涛首席和高首席，这样一个目标跟我们目前的潜在产出水平是否相一致？

汪涛：二十大强调的 2035 年的远景目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体数据，并没有细说。官方文件似乎只有“十四五”规划解释中提到 2035 年有可能实现人均 GDP 翻一番。假设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是 25000 美元，我觉得 2035 年有可能实现名义 GDP 翻倍，如果是实际GDP翻倍，即15年之内实际GDP增速达到年均4.7%左右，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分析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大概有多高。中国面临很多机遇，但是也有很多挑战。

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受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也可以通过户籍改革加大劳动参与率等方式，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资本积累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比如技术的升级换代，产业转向附加价值更高的部门。我们的人均资本占有率还非常低，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过剩产能需要消化，比如房地产经过这么一个大调整，其本身及相关很多行业，未来几年投资都会下降。有些行业的资本折旧率会非常高，一些无效的投资，也会影响未来潜在增长水平。

其次，就是高科技面临着很多封锁。当然，我认为我们国家会加大研发（R&D）的投入，自力更生去做。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无外援和先进技术借鉴差别很大，其对经济的挑战就是投资将更多，成果会更慢更少。这就是创新的成本，否则都会去创新，而不是学习借鉴别人。我们被迫要在更多方面去创新，因而长期来看我们的潜在增速，也就是生产力的提高可能相对会慢一些。

我们的分析是未来的 10 年，潜在增速可能是在 4.4% ~ 4.5% 之间的水平。2030-2035 年，我觉得可能更低一些，在 4% 以下。所以要在 2020-2035 年的 15 年间达到年均 4.7% 的经济增速，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大，但到 2035 年人均收入达到 25000 美元，还是可以实现的。

高善文：我补充几个意见：

第一，现在的官方文件确实没有明确 2035 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具体数据，一些学者推测是 25000 美元，如果有通货膨胀，那就比 25000 美元多得多，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官方确认。

第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是以美元计算，所以计算从现在到 2035 年的经济增长，须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如果人民币每年贬值 2%，那每年经济增长 5% 也不够；如果人民币每年贬值 5%，即使每年经济增长 10% 也勉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20 年，剔除通货膨胀以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复合增速大概是 1.3。假设 2020-2035 年，美元对一篮子主要外币的美元指数（DXY），剔除通货膨胀以后是不变的，都在 100 左右。假如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增速能够继续维持在每年 1.3。如果以上两点都能做到，未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 3.5% 就可以做到。但 2020-2035 年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是否能像过去 20 多年一样继续维持 1% 左右的实际升值，美元指数（DXY）是否能维持在 100 左右，都是不确定的。

关于 2020-2035 年中国 GDP 的潜在增速，专家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也有很多“如果”。如果中国像过去一样，能够重复东亚发达经济体（例如日韩）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肯定是在 4% 以上，也许能够到 4.5%。在此背景下，参考日韩发展经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未来中国是否能够重复东亚发达经济体曾经走过的路径。

未来的世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中美关系及其他影响经济的因素，有正面影响因素也有负面的。这种

情况下，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可能达到，但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特别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化建设等很多层面上，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很多工作。

夏乐（主持人）：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未来十几年，我们能够做到年均 4% 左右持续增长，我相信汇率不会是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的阻碍。当然，期间需要我们做很多努力，做很多踏实的工作。

LUCK

TEAM CHINA

luckin coffee

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官方合作伙伴

潘臻琦

张茹

李梦

金维霞

李月汝

杨舒予

黄思静

李缘

韩旭

杨力维

王思雨

IN

HAND

这一杯

幸运在握

瑞幸咖啡成为中国女篮官方指定咖啡

万联证券

WANLIAN SECURITIES

广州市属唯一全资国有证券公司

累计服务客户超220万户

托管客户资产规模逾2000亿元

场交易量稳居行业前15

发行产品近150只

管理资产总规模超200亿元

债券规模超1000亿元

省债券发行规模稳居市场前10

万联

与您相

千财富

股东、国资、总部、资金、专业

做强财富、做优自营、做大资管、做精投行

CHALI 茶里公司 优质茶品

新一代中国茶

广州茶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里集团”）创立于2013年8月，总部位于广州，**茶里集团是全国领先的茶叶消费品公司之一，是专业的茶饮服务提供商，专注做新一代中国茶**。集团自建供应链，打造茶产业研究中心和精加工深加工生产制造中心，涵盖全自动化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国际茶学院三位一体，是中国茶行业新零售标杆企业，被评为**广州未来独角兽创新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

茶里集团打造新一代快消茶品牌 CHALI，通过标准化的产品理念、高规格的品质要求，将深厚隽永的东方文化和化繁为简的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用健康、时尚、方便、口味丰富的中国好茶，满足了当代年轻人对中国茶饮的新需求，赢得亿万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公司荣誉：

1. 2023年上半年位列**天猫全茶行业TOP1、抖音/京东袋泡茶行业TOP1**；
2. **连续7年天猫双十一花草类目TOP1**；
3. 连续多年获得第一财经&CBNData中国新消费年度增长力TOP50品牌、中国金马奖“中国酒店业最佳袋泡茶”品牌、年度36kr新经济之王最具影响力企业、iSEE创新品牌百强榜等数十个头部奖项；

CHALI品牌代言人 肖战

*“新一代”指CHALI产品在原料使用、工艺制作等方面的更新迭代，“中国茶”指CHALI茶叶原料均来自中国产区。

EHANG | 亿航 EH | Nasdaq Listed

亿航智能 EHang —— 引领空中交通变革

Leading the Air Mobility Revolution

亿航智能 (NASDAQ: EH)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城市空中交通科技企业，致力于让每个人都享受到安全、自动、环保的空中交通。亿航智能为全球多个行业领域客户提供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和解决方案，覆盖空中交通（包括载人交通和物流运输）、智慧城市管理和空中媒体等应用领域。亿航智能2016年发布了全球首款载人级自动驾驶飞行器，引领全球城市空中交通新行业。2019 年 12 月 12 日，亿航智能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首家上市的城市空中交通企业。2023 年 10 月，亿航智能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系统成功取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Type Certificate，"TC"），这也是世界首张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eVTOL"）航空器型号合格认证。

EHang (Nasdaq: EH) is the world' s leading urban air mobility ("UAM") technology platform company. Our mission is to enable safe, autonomous, and eco-friendly air mobilit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EHang provides customers in various industries wit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systems and solutions: air mobility (including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smart city management, and aerial media solutions.EHang unveiled the world's first passenger-carrying UAV in 2016, pioneering the emerging industry of UAM worldwide. On December 12, 2019, EHang 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Nasdaq following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becoming the world' s fir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in the UAM industry. In October 2023, EHang successfully obtained Type Certificate ("TC") for EH216-S passenger-carrying UAV system issued by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AC"), marks the world' s first TC for unmanned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eVTOL").

载人交通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物流运输 Logistics Platform

智慧城市管理 Smart City Management

空中媒体 Aerial Media

世界纷繁读点儿好的。

带你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第一财经 YiMagazine

扫 | 码 | 购 | 买

第一财经 YICAI

SINCE 2003

因信而相伴任

时间，让我们变得更有力量，坚守专业。时间，让我们不断与时俱进，共创价值。

时间拨开纷繁迷雾更见初心，使命依然。时间凝聚起彼此共识与认同，信任依旧。

一财因你　坚韧生长

第一财经 YICAI

广州农商银行
GUANGZHOU RURAL COMMERCIAL BANK

“金米，收获美好生活”

金米乡村金融 / 金米产业金融
金米消费金融 / 金米财富金融

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 · 广州 · 上海 · 香港 · 华盛顿